社会主义与二杆子理论(1):什么是正宗的社会主义？

金唢呐

近日看到一本题名《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论拉丁美洲》的书。主编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际共运的顶尖学者兼党棍的李慎明。主编者声称，"社会主义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时机已经显现"，而且"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他指出的"事实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亚洲，非洲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这也是中国左派学者们的共同特点，稍有风吹草动，就宣告革命高潮又要来临。

由于概念的混乱，使得这些顶尖的专家教授们个个都彰显白痴本色。让诸位见识了杨帆教授的能源对策，关愚谦、张五常的"共产主义"，再一道李慎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白痴理论大餐，算是对的起各位了。也看得出来，白痴的分布完全不受派别、专业、地域的限制，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大社会科学部、人民大学，都是白痴聚集地，而且还在不定时向海内外批发零售。

像老芦前边提到的钱理群教授，就是概念混乱的典型代表，既是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学界泰斗，现在好像又成了新左代言人。他其中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阶段（也就是鱼丈人网友说的红八月）是中外历史上最民主自由的时期，还由此产生了"崇毛情结"。在我看来，他与阿 Q 的区别无非就是阿 Q 进城回来后的感觉是"革命了"、"造反了"，钱泰斗毕竟是学界泰斗，看问题深刻，得出的结论是"民主了"、"自由了"。钱泰斗培养的弟子也很有意思，一个是民主斗士余杰，还有一个是金家父子的超级粉丝、专制辩护士孔庆东，两人都号称"我爱我师，我更爱师理"，都号称忠实继承、全面发展了钱泰斗的思想体系。而且都是鲁迅传人，当代活鲁迅、二鲁迅、小鲁迅，至今都在为社会不再"吃人"而奋斗着。

社会主义品种繁多，曾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有列宁斯大林开创的正宗社会主义，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现在朝鲜都是，尺度掌握宽泛一点的话古巴也勉强算。再有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拉丁美洲查维斯和莫拉莱斯提出的"21 世纪社会主义"（委内瑞拉）和"社群社会主义"（玻利维亚），还有就是现在生猛崛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好像没人能说得清楚，当年姓社姓资的辩了好长时间，后来老邓看没什么辨清的可能，干脆来个"不争论"、"不问姓社姓资"。

我看创建正宗社会主义的前提是用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建一个政党，然后树立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再由这个领袖用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二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二杆子）掌控一切。以后领袖的任何动作，都可以出现"蝴蝶效应"。说到这了，先简单说两句蝴蝶效应。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经过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能带动整个系统的出现巨大的连锁反应。这里面有很多数学模型在里面，而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

最通俗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理论对我这个吃科研饭的意义特别重大，例如，很多微弱的化学刺激，经过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都可以引起机体出现剧烈的反应。

2004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科学家阿克塞尔和巴克就是因为解释了清楚地阐释了嗅觉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而拿走了炸药大王留下的百万刀。具体说就是，微量的气味分子与鼻腔中嗅觉受体结合后，作为化学信号经过传递、分化、整合和放大，转变为电信号，沿着嗅觉神经传至大脑嗅觉皮层某些精神区域，被人们感知。若在兰芝之室则愉悦，若在鲍鱼之肆则郁闷。老芦经常说的看到某人文章便作呕三日，恐怕如果没有这种放大效应，仅凭几个铅字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这种胃肠道反应。

有趣的是，"蝴蝶效应"的理论传到中国后，立刻有爱国科学家说，蝴蝶效应只不过是以实证手段证明了中国 1300 多年前《礼记•经解》："《易》曰：'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从此认定，洋鬼子的这个发现，又比我们晚了一千三百多年。

我非常欣赏孙网友这些说法：
"我们有一套独特的模糊思维和语言艺术，可以把一个东西说成两种（比如资本主义失业和社会主义待业），也可以把两个东西说成一种（比如黑格尔辩证法和老子道德经）。"
"总的来说，综合来说，就是西方是傻大黑粗，就知道傻了吧唧照着真实情况临摹；但中国文化就不一样了，我们追求的永远是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西方人研究那么多年也不过搞了一个大爆炸假说，里面那么多公式、常数、参量，繁琐至极，让人摸不到头脑；但中国人一句'道生一、一生二'就玄而又玄的把宇宙至理概括进去了，读了还令人掩卷沉思，深沉而隽永。"
"具体包括'西医是注重细节的，中医是注重整体的'，'西方哲学失之琐碎，中国哲学具有宏观思维'，'西方科学重分析，中国科学重综合'，'西方文学讲细微描写，中国文学讲渲染意境'，'西洋画写实，中国画写意'，'西方战争讲究武器，中国战争讲究谋略'，'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中国文明注重精神'……"

您小人家洞察力真是了得！

其实最能说明蝴蝶效应的不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领袖在广场轻挥巨手，可以导致一场革命风暴，甚至是'四海湾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像毛领袖在天安门楼子上一挥手，就立刻"世界革命风起云涌，觉醒的人们仰望北京"。对宋彬彬一句"要武嘛"，就让小将们把多少黑五类都送进了阎王殿。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描述过他当时路过天安门看到毛泽东画像时的心情："我有心无心地向天安门投望了一眼。毛主席的画像依然像往常一样，对我微微而笑，庄重而慈祥。他或许没有想到在 1957 年的弹指之间，多少家庭像一颗颗原子核似的破裂，……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中呢！"

我们这代人也是因为领袖上下嘴唇一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由一个小学八年级的学生一下子成了知识青年，开始了"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人生。那时候

还小，想到以后再没家人管束还乐得屁颠屁颠的，以为从此后"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直到在火车上，听到别人吹口琴，旁边还有人附和着小声哼哼那首如果不是年幼离家便永远也不会去碰一下的《共青团员之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歌曲)："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这才多少有些黯然伤神，感到点"事态的严重"。

连老邓的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只是因为"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于是蝴蝶效应便开始出现，"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歌曲《春天的故事》)。

像民主国家的领袖们，不挨臭鸡蛋就不错，甭想还有什么"挥挥手就引起一场风暴"，更别做梦随便"画了一个圈"就能"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欧洲很多所谓铁腕总统，机关算尽，殚精竭虑，不过是将税率提高百分之零点几。日本的首相几乎就是个摆设，七十年代日本多少首相上台时信誓旦旦，"要把成田机场的事情办好"，直到去年我去日本出差，看到的还是条瘸腿跑道。号称政治强人的日本首相小泉，也就是能往靖国神社钻几回，最后连个"邮政民营化"也没能整出个名堂来。这些国家领袖成效甚小，并不是能力差，而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二杆子。

我不是搞什么"社会科学"专业的，以我这个外行看来，鉴别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最主要的就二杆子理论。这二杆子理论首创到底是谁我也拿不准，到网上查了一下，怎么说的都有。有说是"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也有人说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而我记得文革的时候是"永远健康"引用的"万寿无疆"的，原创应该是伟大领袖才对。但不管是谁说的，什么表述方式，究其根源，都是列宁的党建理论：党要靠二杆子把一切都掌控起来。靠着这二杆子打出一片党天下，再靠着这二杆子塑造出一个党社会、党军队、党文化。还是五十年代那句话，苏联就是老大哥！即使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我们除了把洋人、古人的说法换一种表述方式唬人以外，拿不出任何原创的、可操作的东西，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必须承认的事实。

其实社会主义在30年前很容易说清楚，就是党管一切。具体说，在农村，连农民养鸡的鸡屁股也要管起来。当年我下乡时，农村里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家最多只准养三只鸡，一头猪，并且不许在自留地里种经济作物和蔬菜。那时候有句顺口溜：山药蛋子当口粮，鸡屁股眼子当银行，能买二尺的确良。当时在农村把社会主义定义的非常明确：三只鸡是社会主义，再多一只就是资本主义了。

杂谈二杆子(2):二杆子的功效和玩法

金唢呐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现在国内经常组织干部进行"思想解放大讨论"，在党校人们说话都非常随便，甚至连主张开设红灯区的话都能听到。真正做到了所谓畅所欲言，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有两个前提，一是"思想解放无禁区，教育宣传有纪律"，在讨论会上说什么都行，但回去做报告时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来，不许掺杂自己的想法。二是不许涉及与二杆子有关的"改革"，具体说，就是议会民主、三

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新闻自由等这些资产阶级政治文明通行的基本准则绝对不准提。

还得再定义一下这二杆子的概念。枪杆子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后盾和保障，有了枪杆子，党就可以指挥国民做一切事情。首先这枪杆子不仅仅是抵御外来侵略，主要还是约束国民的行为，把国内一切真实存在的和假想的敌人，"打它个灵魂出窍"。而且枪杆子要管一切领域：包括工人怎么做工，农民怎么播种，头发要留多长，裤脚要放多宽，忙时吃什么，闲时吃什么。笔杆子的作用就更大，用小说诗歌电影戏曲美术杂志报纸等一切形式，告诉人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根据需要还可以"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不该让人民知道的事情，一定要坚决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保密工作十分重要，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几乎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唱这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记得当年是藏族歌手才旦珠玛唱的。在宣传队唱这首歌的时候，据说要往鼻腔里塞少许棉花，然后不停的用手指抖动喉咙，唱出来才像原唱歌手的声音，才显得感情真挚，发自肺腑。其中歌里面最真实的一句话就是"母亲只生了我的身"，也就是说，在正宗社会主义制度下，母亲的任务就是完成受精、着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些生理过程，至于孩子生下来以后，应该有什么理想，怎么发展，如何活着，怎样做人，就没你母亲什么事儿了，统统交给党了。党用二杆子把后面的一切都管起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就象妈妈一样把我培养大，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幸福的明天向我招手，四化美景你描画……。党呵党呵亲爱的党呵，你就是我最亲爱的妈妈。"（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殷秀梅原唱）。

用二杆子鉴别真假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封资修国家，或者是一手软一手硬，或者是两手都不硬。不信可以用我这个鉴别方法试一下，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毛中国、现朝鲜等国，都是二杆子国家。看是否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背离了有多远，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鉴定一下二杆子的成色，是 24K 还是 18K。越是二杆子，就越接近列宁斯大林亲自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道理很简单，社会主义能否存在，关键是看是否有这二杆子，别的都是软指标，或者干脆就是扯淡。用"为人民服务"、"两个务必"、"三八作风"这些中性的废话空话、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的东西代替二杆子，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肆意践踏和无耻歪曲。

在各种社会主义中，拉美的社会主义成色最差。在我看来，他们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无非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左翼们，如国内左派引以为同志和战友的委内瑞拉查维斯，虽然看上去要能力有能力，要气魄有气魄，这么个弹丸小国，不要说核武器，连常规武器恐怕也得进口。可就是敢和布什叫板，并且找上门去破口大骂，按宋丹丹的说法，属于"没事找抽型"，按说也够生猛的，论胆识气魄，远远超过老毛。不过叫我说完全是瞎忙活，费了半天劲连个"终生总统"都当不成，"叫人耻笑，算不得好汉"（武松语），离真正的二杆子古巴差了几百光年。老查的致命伤就是差在了这二杆子上：靠选票上台而不是二杆子，而且还是靠选举联盟和执政联盟而上台的，政府由 24 个党派组成，"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据说老查没事还学毛选，其实他不知道毛选根本不用多学：社会主义

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掌握不了二杆子，就干不成社会主义。

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个个都是玩二杆子的高手，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超级杆王、超级杆霸。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是最正宗的社会主义。但这三人二杆子的玩法各有巧妙不同。

斯大林玩二杆子最大的特点是高效、快捷，目的明确，创造了玩二杆子的奇迹。一想起斯大林那张冷酷的脸，我就想起一首澳大利亚歌曲的歌名来，《羊毛剪刀咔嚓响》。斯大林处理起问题来非常简单，就是砍头、流放或者是监狱伺候。斯大林玩二杆子最大的弱点是粗暴冷酷、手段简单、过程枯燥，技术含量低观赏性差，没什么美学价值。完全是凭借个人的"钢铁意志"指挥一群皮夹克（原来的契卡，后来的克格勃）在那"霸王硬上弓"。一通"羊毛剪刀咔嚓响"，就干掉了 99%的政治局委员。

老毛玩二杆子基本功并不扎实，最大的问题是他老人家总也没弄明白玩二杆子的目的是应该干点什么，有时候纯粹是自娱自乐，"为二杆子而二杆子"，明明可以得分的时候还在那里玩花活，所以玩了半天二杆子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结果。但正因为功利性淡薄，他在诸杆王中玩的最花哨、最艺术，最具观赏性，美学价值也最高，至今令人回味无穷。打个篮球的比喻，和斯大林比起来，老毛虽然进球数远不如老斯，甚至有时候连球框在哪都不太清楚，还抽冷子往对方篮框里塞个俩仨的。但老斯都是远投三分球频频得分，没什么空中飞身暴扣、胯下背后传球、空中接力灌篮、盖帽等场面，所以斯大林虽然得分不少，但场面乏味，没留下什么精彩的镜头，甚至令人生厌。像处理托洛斯基，就是派皮夹克追到墨西哥，手操大板斧生劈。老毛则不同，得分虽然不高，但在玩二杆子方法学上贡献不小，留下了大量的经典：像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也就是二杆子拿在群众手里），后发制人，文攻武卫，掺沙子、挖墙角、扔石头，引蛇出洞，先洗澡后道歉（延安整风），社会主义大食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桩桩件件都可以载入二杆子史册。

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金家父子尤其是正日同志二杆子玩得最好，无论是审美价值还是实际效果都近乎完美。只是朝鲜小了些，不好与中国和苏联做横向比较。可以说，金家父子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玩二杆子的方法，把列宁主义提高到了崭新的阶段。二杆子玩到第二代而仍然功力不减的，恐怕普天下唯此一家。

玩二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芦提到的"权威递减律"的威胁，第一代是开国领袖，有绝对权威，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到了后几代都是上一代二杆子修理的对象，很难有什么权威可言。套用文革的一句话就是：如何可持续地玩二杆子，"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列宁死的太早，斯大林没有解决好"。而朝鲜的世袭避免了这一尴尬的局面：小金是老金生命的延续，权威递减不多。而和封建世袭最大的区别是明明是世袭，又偏偏不说是世袭，完全在老一代二杆子的控制下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走上领导岗位。正日同志成为领袖，完全是因为三千里江山四千万人民中只有他最合适，日成满意人民更满意。这样就完全不用担心出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华国锋收拾毛妻毛侄的结果。而且实践证明，虽然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正日同志水平绝不在老一代之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端的是后生可畏！

休息几天再聊。

杂谈二杆子(3):列宁建党学说与二杆子(上)

金唢呐

先回答一下小北网友，虽然是网上胡侃，可我也想先追本溯源，先把老一代玩二杆子的事情说清楚，然后再说说新时期二杆子的特点，所以你让我介绍"21 世纪中国应该如何玩二杆子"，恐怕要等一段时间了。但有网友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完全放弃了二杆子中的笔杆子，这我可不敢苟同，不信可以看看最近关于新浪网站"拉萨事件"网络报道后面近万条的【发表评论】（http://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lt.html?channel=gn&newsid=1-1-15151569&style=0），可能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

再谢谢老芦的考证，这下子总算弄清楚"二杆子"说法的出处了。但这句话不管具体是谁说的，谁先说的，原创成果还是不属于我们。经过上千年儒家思想的禁锢，和数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像"小高炉炼牛屎铁"一类的发明以外，国人已经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创造能力。即使是在我们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二杆子领域，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毛泽东语）。具体说，系统提出和实践二杆子理论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中国共产党的"老子党"（毛泽东语）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

再吐血请求（应该是磕破血，这年头人们的凝血功能差，容易出血）老芦把有关论述"权威递减律"的旧作贴出来，若能整理一下，根据当前国内外风云变幻搞个加强版出来就更好了，顺便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有误。我认为"权威递减律"是老芦的一个重要发现，能够玩好二杆子，一般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国内出现战乱（尤其是对外战争失败或战事不利），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一个政党，确立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领袖，然后才谈得到后面玩二杆子的事情。当今中国不再产生超级杆王、杆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权威递减律"的制约，根本不会出现"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领袖"，使得当今领导人不能、不敢、不会随心所欲地玩二杆子。你就说这枪杆子，如果没有绝对权威怎么镇住下面的军头，弄不好就会擦枪走火，把自己玩下去都有可能。

这确实是个实际问题：第一代领袖活着的时候，手下个个都是小媳妇、马屁精，费劲心思讨好、神化领袖。媳妇熬成婆上台当老大后，让全党也像对前老大一样毕恭毕敬、俯首帖耳，难度确实不小。如何可持续玩二杆子，确实是当今社会主义阵营面临的重要课题。当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华国锋收拾毛妻毛侄，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都为自己树立威信加了分。现在朝鲜和古巴都找到了解决办法，虽然 72 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年龄大了些，但看上去身子骨还硬朗，短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

甚至国际共运中也存在"权威递减律"的问题。当年毛泽东不远万里前去去给斯大林拜寿，斯大林连车站迎客都不去。本来老毛还想和老斯讨论点"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顺便让老毛子见识一下山沟马列主义的厉害。不料想人家采取晾干战术，在旅馆里把毛泽东憋的冲着服务官员嗷嗷叫：我们来干什么来了？吃饭、拉屎、睡觉？

最后只好采取"条陈式谈话"的方式和斯大林沟通（上面有很多术语如"晾干"、"条陈式谈话"是老芦发明的，不是我的原创，特此说明）。

受到"权威递减律"的影响，轮到赫鲁晓夫就不行了，跟老毛年龄差不多，资历好像还要浅，老毛当委员的时候赫鲁晓夫很可能还是个普通党员。所以老毛对赫鲁晓夫一通戏弄，先是仗着自己水性好、中国古典小说看得多，学浪里白条张顺收拾黑旋风李逵，把煤黑子出身的赫鲁晓夫硬往游泳池里面拽；后来又指挥手下干将围攻赫鲁晓夫，玩车轮大战（见杨志华演讲），弄得赫鲁晓夫颜面尽失。以致下台后人们还不依不饶，上演"和尚骂秃子"，被中国佛教掌门人赵朴初"谑而且虐"地痛骂（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306091203293.html ），一个本应慈悲为怀的佛教领袖掺和世俗政治不说，还对他国领导人进行人身侮辱，把一个政治家生生糟蹋成了一个小丑，这恐怕也是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当时连我们小孩子也拿赫鲁晓夫开涮，从来就没称呼过人家名字，张口闭口拿人家生理缺陷说事，从来都是叫赫秃子。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对不起赫妻赫母。

我总觉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甚至比马克思更重要。如果没有列宁，马克思主义不会走出书斋。马老人家一生都是看书写书、办报投稿、阅读思考，对资本主义无情批判和辛辣嘲讽，构建各种哲学、经济学体系，他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一度完全靠亲密战友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炒股票接济，他对共产主义不着边际的"科学预见"，也跟他的生活经历有关："一个人今天去干一件事，明天又去干另一件，早晨打猎，下午钓鱼，晚上喂牛，晚饭后批判，这么作只不过是因为该人一时兴起，而并不需要他变成猎人，渔夫，牛仔或批判家。"（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芦笛译）。他虽然也创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当选为主席，但那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政党区别不大，完全是个松散的沙龙组织。除了成功地诱奸女佣、并瞒天过海让忙于炒股而耽误了终生大事的老光棍恩格斯背黑锅外（来自东德解密档案），没有干成过什么漂亮的事情。如果没有列宁，社会主义永远是个徘徊的幽灵。

而被人成为"实用政治家"列宁同志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与马克思那种只是在大英图书馆磨鞋底的理论家完全不同，列宁同志意志坚定、思想深刻，组织能力强，政治智慧超常，和沙皇政府实际交过手，使社会主义在世界成为基本政治思想体系，最后终于用完整的建党学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政党——布尔什维克，又用二杆子理论创建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使得在欧洲徘徊的幽灵现出了真身。

列宁的建党理论，按官方的说法是下面六条：
一、党是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党必须不断向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二、党必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部队，有铁的纪律；
三、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四、党是工人阶级一切组织中的最高组织形式，党领导一切；
五、党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六、党内必须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其实只要认真看一下，就会知道共产党与历史上其他政党、团体、帮会的根本区别，

也会多少明白点二杆子的运作方式。我就献丑，逐条"剖析"一下：

第一条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断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洗脑，把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纳入无产阶级轨道。因此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观：大字不识一斗的土八路，可能连苏维埃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却能头头是道地给满腹经纶的大儒宣讲高深的苏维埃革命理论，使其心悦诚服。更不用说说服大字不识一升的工人农民造反了。直到今天也仍然一样，尽管社会科学的专家教授还都经常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但中国人对政治理论的兴趣和平均水平，仍然高居榜首，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望其项背。网上也有大量的旨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网站和帖子。

这一建党理论的提出，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划然而别。传统农民起义造反根本不需要理论武装，他们的动力无非有两个，一个是肚子：吃他娘，穿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再一个就是野心：彼可取而代之，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在革命初期，共产党也用肚子和野心这两件法宝，但后面的"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却是列宁所独有的，这也就是共产党员都有远大理想，所以斗争最坚决，打仗最勇敢。小说《红岩》里江姐的那句名言："竹签子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不管具体故事是不是虚构的，她说的确实是事实。

杂谈二杆子(4):列宁建党学说与二杆子(中)

金唢呐

先回答若水网友的问题。可能你没有看我在第二集中的这句话：
"还得再定义一下这二杆子的概念。...首先这枪杆子不仅仅是抵御外来侵略，主要还是约束国民的行为，把国内一切真实存在的和假想的敌人，"打它个灵魂出窍"。而且枪杆子要管一切领域：包括工人怎么做工，农民怎么播种，头发要留多长，裤脚要放多宽，忙时吃什么，闲时吃什么。笔杆子的作用就更大，用小说诗歌电影戏曲美术杂志报纸等一切形式，告诉人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根据需要还可以"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不该让人民知道的事情，一定要坚决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保密工作十分重要，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显然，美国的尖端武器、好莱坞大片虽然生猛，和我说的"二杆子"根本不是一回事。看来，讨论问题之前，"界定概念十分重要，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

还有 light 网友说的钱杆子，那是我后面讲"特色社会主义"要提到的问题，而且我在《芦笛文选读后感》那个系列里面已经说了不少了，你可以去看看。

还接着学习列宁建党学说。

列宁的第二条实际上是说党是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依我看，这是共产党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据说列宁的这一思想是在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分子的斗

争中逐渐形成的。按照马尔托夫等人的观点，"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和同情党的人，都可以自行入党而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履行入党手续。列宁认为这实际上是把党变成一个组织涣散、毫无纪律约束、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松散俱乐部。现在西方的很多政党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选举俱乐部"。据说，有民主积极分子到了海外想加入共和党和民主党，建个东亚支部，"混他个师长旅长的干干"，结果忙活半天就是找不到组织，没地方去履行手续。后来才知道和我们概念里的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

忘记是那个电影了，里面的女主角儿入党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此后俺就是党的人了，俺的身子也是党的"。这句台词完全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就是说，一旦经过考验入党，就再也没有中途退出、转向的余地。像厌倦政治，出家当和尚这种美事，很少发生在共产党内。苏联的托洛茨基即使跑到了墨西哥，可老斯还要派皮夹克抡大板斧给人劈了，实际上这是在执行党的纪律。

说到这儿顺便问一下留日的各位大侠，文革期间日本也学着中国的红卫兵闹学生运动，据说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这两种东西怎么能尿到一个壶里去？是不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至今人们评论起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来还说他"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但日本，好像老托对欧洲某些国家如英国的左派运动也有影响。我认为托洛茨基最大的优势是从来没有执掌过政权，没有污点。到底好使不好使谁也没试过，所以没准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此之外，列宁还提出党组织应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少数职业革命家，这部分人掌握先进的理论知识，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是整个党组织的核心；另一部分则是人数众多的与广大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普通党员，这些人是党组织的主体。这不就是人体进化、器官分工的结果么！小时候唱过个歌谣：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来思考。

列宁在说明这一条时还强调要以党组织为依托，建立各种形式的公开的、半公开的群众性组织。他说，如果"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这点也非常厉害。在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以前，国内外任何反沙皇政府的力量（包括提供第一桶金的国外敌对势力），都是自己的同盟军。在中国，这个"革命家组织"就是所谓"统一战线"，包括各"民主党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人脾大、气粗，个个一身正气、铁骨铮铮。而且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拍案而起，扯旗上街游行。他们自发、自觉或有组织地在国统区和老蒋开展"合法斗争"，让老蒋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管则社会秩序大乱，国将不国，人们对万恶旧社会没什么好印象与此有很大关系。管的话稍一过火就是"XX 惨案"，国内民心丧尽不说，西方自由世界也跟着一起谴责，里外夹攻，让老蒋吃够了苦头。在这点上共产党内外有别，只要是和老蒋别苗头的都是我党的同盟军，不一定非认同我党的主张，这些人可以掌握政权后再处理，先拿过来使用再说。我举一个五七年被收拾的大右派、解放前的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的例子。

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储安平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

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储安平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由于他的《观察》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甚么仗？"（注：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封了他的《观察》杂志，将老储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连这种人共产党都能利用，焉有不胜之理。

第三条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全党服从老大（或曰领袖），在具体表述上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袖"。而所谓民主，就是全体党员要监督老大以下的领导，防止他们背离了老大的路线，或对老大的位子造成威胁。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实际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体现。一旦发现不符合领袖意志的言行，斯大林的做法是皮夹克伺候，中国的做法是"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共产国际也不例外，对于一切敢于不服从老大的，同样是皮夹克伺候。但当时在"阵营"之内，对这一行为看得最为透彻的，显然是游击队员出身的铁托元帅。在斯大林逝世后，在他书桌的抽屉底层，发现一封铁托给他的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请不要再派特务到南斯拉夫来暗杀我了。我已经把你派来干这件事的 7 个人都抓起来了。如果你不停止，那么我将不得不派遣我的人到莫斯科去。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将不必再派第二个人"。敢情铁托也是二杆子高手，敢和老大梗脖子，确实有他的本钱。

其实光是上面三条就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上找不出类似的政党和团体来。有人把共产党比作黑社会，黑社会哪有第一条。黑道帮会最远大的理想不过是想办法多占几个码头，做掉其他山头的老大。而共产党不一样，是一个打不垮、托不烂，最有战斗力的组织，而且叛变的情况也很少。

最近有人向我推荐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说是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 11 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 7 个重要奖项。还获得了美国第 79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本着"听人劝、吃饱饭"处世哲学，5 块买了张盗版光碟看完了。大概意思是讲战斗在柏林墙第一线的东德"斯塔西"情报机关的故事。里面的男主角魏斯乐是个老光棍，"斯塔西"经验丰富监听特工。后来监听作家时良心发现，私下保护了作家。里面的故事情节不细说了，网上有介绍（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0021217.html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网上看看电影，从中也可以多少看出点中苏玩二杆子的区别。

这部片子和美国大片《辛德勒的名单》有些相似，《辛》是说纳粹良心发现救犹太人的故事，这个《窃》是说皮夹克保护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故事。但《辛》是确有其事，干过类似事情的甚至还不止辛德勒一人；而《窃》的结局完全是胡编乱造，以致电影《窃听风暴》拍摄过程中有过一个小插曲，导演想借用一前东德的机关大楼、现在的监狱博物馆实地拍摄，却遭到馆长的拒绝，理由是馆长认为该电影剧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整个东德安全部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像电影中的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

恐怕不仅仅是东德，本人见识有限，除了投奔自由世界，实现"黄鹤一去不复返"外，苏联、中国、朝鲜的专政机关里出现过这种"良心发现"吗？可能这就是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斯大林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杂谈二杆子(5):列宁建党学说与二杆子(下)

金唢呐

现在区里的"热点"似乎是外交和民族问题，我跟不上形势，还继续学习俺的"列宁建党学说"吧。

列宁建党学说的第四条说的是党要领导一切，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力量。列宁的原话是："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整个国家都是必须遵守的"，"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党掌控一切领域，工会、青年团、妇联、民主党派、政协，人大等所有一切组织也都必须在党的领导控制之下。实现党国家、党军队、党文化、党经济，党不但要管生活，还要管思想。从正面说，应付危机、动乱、战争，社会主义是一种最佳的制度，可以迅速组织力量，调动资源，绝不会出现群龙无首，各行其是，各其为政的混乱局面。所以老蒋日日想夜夜盼、在那个年代最需要的、最后也没能在大陆实现的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红宝书"里的第一页第一句话"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来自列宁的建党学说，是正宗的马列主义观点。

这里面中国的特色就是党政不分家。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这样。老芦说中共过去实际上是"枪指挥党"而不是"党指挥枪"，依我看老毛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是针对起义过来的部队或收编的土匪说的，如《杜鹃山》上的柯湘指挥雷刚。而大多数情况是"枪党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现在就更邪乎，很多地方都是书记、经理一人兼，革命重担一肩挑。即使不是一人兼，书记们也有不少是业务干部上来的，有博士学位的也不少，各级党委书记带博士硕士的也有的是。前几天，我正在医院看病号，忽听得走廊乱纷纷，白衣招展空翻影，原来是党办发来的兵。人家走到病床前也是问寒问暖，征求意见，宛如白衣天使来到人间。仔细一问，才知道虽然都穿着白大衣，但都是医院行政部门的干部，党办、宣传、组织、工会、妇

联各部门都有，这叫“政工查房”，每周一次。说是现在很多医院都开始实行了，说目的为了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也有知情人告诉我，现在大医院医医生把患者当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药品回扣拿得太多，行政人员眼红，“汝翁即吾翁，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是不是真是这样，不得而知。

第五条所说“党要始终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我认为也是共产党非常突出的特点。教科书中写的“只有 20 多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取得并巩固国家政权，关键是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确实是事实。前边已经说过，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战乱期间靠枪杆子上台，道理很清楚，共产党必须靠枪杆子来获取政权才能干社会主义。有人说，老毛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什么道理，即使在 20 世纪中叶，世界上的很多政权也不是打出来的。还有人说，这句话不是老毛的原创，至少前边还有个黑旋风李逵，在那晃着大板斧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这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个意思。其实这句话的含义应该是“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社会主义政权”，别的方式产生的政权根本无法干科学社会主义，甚至都无法想像。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就是例子，空有一腔热血，最多就是弄几口油井搞点国有化，骂骂布什，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也没干成。“可惜他独裁梦，可怜他民主身”，不管怎么说老查也是一条汉子，好不让人同情。

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目的是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让群众把脑袋别在裤腰里为自己获取政权去拼命，这和民主国家就为了一张选票去争取选民还是不一样。尤其是中共，偏好人海战术，对群众数量的依赖性更大。

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方法也各有特点。经典的方法就是演讲，希特勒、丘吉尔等西方政治家都擅长演讲。列宁更是动不动上广场演讲，电影里的列宁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秃顶老头，总是一只手放在腋下，一只手在空中来回挥舞，人矬声高，魅力十足。文革时反复看的电影《列宁在 1918》，有个情节就是列宁在莫斯科的一家工厂向工人发表演说时，遭袭击身中两弹，造成重伤。卡斯特罗则是以马拉松式演讲著称，一讲就是多少个小时，屡创世界吉尼斯记录。中国最能讲的是孙中山，据说他这个“孙大炮”的绰号就是因为演讲时动不动就号召用大炮轰击朝廷。

共产党在老毛之前也玩这一套，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都能上广场吼两嗓子，王明也是演讲的好手。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谈到，说老毛长于运筹帷幄，私下谈话，背后搞突然袭击，远不像王明那样雄辩，滔滔不绝。因为老张是搞学生运动出身，也是没事上广场的主儿，对老毛不擅长演讲这点很瞧不上眼。我的印象也是如此，毛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按说这是发表演说的好机会，可只见他老人家猛挥巨手，有时候摘下帽子在空中挥来回去，最多说两句简单的句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的革命进行到底”，从没发表过大段演讲。

其实演讲这种形式对共产党确实不太适合。其他政党夺取政权即使是“武装夺取政权”，也通常是“毕其功于一役”，一仗或几仗下来，占领总统府、电台、机场就算是搞掂，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而当时中共则是利用军阀割据的“三不管”地区大量建根据地，那地方的百姓听不懂什么演讲。后来则是因为日本少佐胡打乱撞，我党利用日本兵力不足、战线过长，采用“牛耕田、马吃草”的方式，鬼子在前边打仗，八

路在后面建立根据地，这种环境也不适合演讲。

再说，中国语言太复杂，听有些领袖的南方方言比听外语还难懂。我在国外就亲眼见过两位南北同胞普通话说不好，只好用外语沟通。宋庆龄和何香凝好像当年也这么干过。就老毛在天安门楼子上那句"中瓜淫民共骇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俺们北方人就根本听不懂，所以可以被人偷换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值得一说的是我党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施予小恩小惠。进老乡院子后先奔水缸，把水挑满，然后抄起扫帚就扫院子。几个回合下来，老大娘就把孩子交给了组织，村里姑娘们也开始在村口十盼红军，想着红军哥哥什么时候再"戒指个下了山"。 如果随身跟着女卫生员拿着听诊器笔划几下效果就更好，像过去经常唱的"金珠妈咪亚咕嘟（藏语：解放军好）"，就是跟部队卫生员有关。若再能像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面说的"妇女同志要学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再好好赞美群众几句，可能半个村的人给你下跪，然后"擒龙随你下大海，打虎随你上高山"。有余力再能帮村里打口井，那效果肯定比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好一万倍。根据我的体会，这些电影戏曲里面宣传的东西，艺术夸张的成分不是太多。老百姓可不懂什么"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以后下乡时到农村体会了一下，农民确实是这样，特看重这点眼前小利益，而且特别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其实其他阶层也差不多，闹学运那阵子，学校都接到了通知，要密切注意学生的暖气片子和饭盒子。那时候我们校长到学生宿舍，一进门就去摸暖气片子，然后转身装模作样地告诉身后的后勤处长，"孩子们都是南方来的，暖气不热冻坏了同学拿你是问"。再不就是食堂转几圈，问问饭硬不硬，菜咸不咸，汤热不热，然后嘱咐食堂炒菜时多放几片肉。过来人都知道，那个时期是食堂伙食最好的时候，最后年轻一点的老师都馋得受不了，装嫩扮酷，冒充学生到学生食堂吃饭。没几个回合学生就感动的开始转变了，纷纷撰文"还是共产党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看来没有谁把民主自由当成什么神圣的理念。

如今的和谐时代这一套只不过改成了喝酒。一到节假日和年底，基层干部一定要和群众喝的找不到北，否则就没有"密切联系群众"，平时再混蛋，只要能这么干几次，群众也能原谅。"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我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该下岗"，确实是如今大陆干部的重要考核指标。老一代外交官何方在《党史笔记》提到的迎接外宾时的夹道欢迎，隆重接待，大摆排场，酒池肉林、"缅甸文工团走时每人送一件毛皮上衣"实际上也是这种做法的延续和升华。不过老外虽然没学过《邹忌讽齐王纳谏》，但人家把这一套看得很清楚，不肯为这点小利改变立场。甚至把几百万吨大米搭上去也照样白搭，该翻脸就翻脸，连眼都不眨一下，让咱们白喂了一帮白眼狼。

我一直想这是不是东方传统有关。因为日本共产党在六十年代最红火的时候也搞这一套，具体说就是下乡帮助日本老农收稻子，然后再宣讲革命道理。不过日共搞的效果远不如中共，至今农村这块阵地还是自民党占着，所谓"农民的稻田，就是自民党的票田"，看来"社员喜开丰收镰"没起什么作用。苏联共产党好像不兴搞这一套，

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开始的镜头就是一群驻扎在农庄的大兵，从不帮着农民挑水扫院子，一天到晚就是酗酒搞女人，"夜夜做新郎，家家都有丈母娘"，当地政府不得已要求派一队"不喝酒、不搞女人"的队伍来，于是来了一队女兵，这才有了后来的故事。至于苏军到了中国东北和柏林，更是禽兽不如。据英国军事历史学家比弗出版的《柏林：1945 年沦陷》，在苏联红军由普鲁士与纳粹德军作战并攻打柏林期间估计共有 200 万名妇女被奸，受害人中包括德国前首相科尔的夫人和她得母亲。好像没怎么听说苏联红军搞什么"走一路、红一线，驻一地、红一片"之类通过送温暖来发动群众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共产党是掌握政权以前"同群众保持联系"最密切的政党，而执政后又最拿人民群众不当回事（有两种情况例外，一种是发生了战争或动乱，再就是要搞群众运动）。在掌握政权以后，共产党确实是一个最容易脱离群众的政党，因为有二杆子，没有竞争选举，不再需要人民的支持。所以不管谁上台，都要人为地去强调"两个务必"。

列宁建党学说的第六条是党内必须开展两条路线斗争。

共产党的最大特点是毛泽东说的，"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对于不服从领袖领导的，不赞成领袖政治主张的，或者领袖看不顺眼的人，解决的办法就是路线斗争，以保持队伍的纯洁。这与其他政党不同，其他政党在政见发生分歧的时候，允许你另立门户，再注册成立个党派，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历史都充满了血腥味。区别就是中国死亡的相对较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折磨致死或者是自杀身亡。这为以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领导，保留了不少革命火种。

而苏联和朝鲜完全是死刑伺候。就拿斯大林来说，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 6 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外 5 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斯大林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后被斧劈）。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 4 万余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大清洗还枪决了 5 名元帅中的 3 人、4 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人、12 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 名军长中的 60 人、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397 名旅长中的 221 人。金日成也不含糊，革命元老中除了极少数是自然死亡外，绝大多数都是死刑结束的生命，"开枪为他送行"。

我认为所谓当年说苏联修正主义背叛了社会主义，最主要就是这一条自斯大林后再没有这种充满血腥味的路线斗争。一个是不想干，被那种血腥场面吓破了胆，或者是丧失了兴趣；而且是不能干，接班人都不再有这种权威，说来说去，又回到了"权威递减律"这道绕不过的坎。

客观说，这种残酷的路线斗争让人人自危，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贪污腐败的作用。如果没有"权威递减律"作怪，我不认为共产党不能反腐败。

杂谈二杆子(6):玫瑰花与赤练蛇

金唢呐

这一段工作特别忙，而且看大家对西藏问题讨论热烈，精彩纷呈，实在不忍心岔开这个话题。现在老河又重提"二杆子"这个话题，我就接着侃几集。既然老河说重点谈笔杆子，我就在枪杆子上多着些笔墨。

说到西藏问题，我顺便插句嘴，好像海内外华人关心的话题不太一样。尽管电视广播每天都有西藏事件的消息和评论，好像国内同胞对这个话题兴趣不大。如果说在网上有金盾工程控制的话，在私下人们说这个话题的也不多，而且即使说起来分歧也不大。还有就是老芦当初评论《货币战争》的时候，我也找来原著准备认真读一读。可刚看到序言就傻眼了，人家是这么写的："十年前，中国潜艇逼退美"尼米兹"号航母，今年 10 月底，中国"宋级"潜艇再次贴近至美军"小鹰号"战斗群五英里。中国在军力暂时无法与美军抗衡的现实情况下，制定出凭借潜艇战术特性遏制美军航母群的相应战略。"我问了周围好几位业余赵括和专业拿破仑，人家都说不知道"中国潜艇逼退美国航母"这回事。倒是一位老政工很感兴趣，连说"以后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把这段加上"，很是对我唱了几个肥诺。这么个国外家喻户晓的事情在国内却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三只老虎。

谈起玩二杆子，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虽然都是玩二杆子高手，却又各有巧妙不同，总起来说，斯大林的玩法简单实用，而毛泽东的艺术价值最高，金正日则是实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不谛为二杆子领域的一棵奇葩。诸领袖各有千秋，一时叫人很难割舍，不好判断高下，还是从源头说起吧。

在列宁建党理论里面，还有一条是列宁不好意思说的，我给补充一下，就是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流血。这种流血包括对外和对内。对外，就是要和党外的对手过几仗，对内就是要砍翻几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特务，否则只凭什么"人格魅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杰出成就"，根本玩不起二杆子。"流血，只有流血，才是树立权威的唯一有效方法"，这是成为共产党领袖的必由之路。记得刘亚洲好像提出过这么个理论，说老邓当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打给国际和国内看的：让世界知道中国的立场，让国内看到改革开放的决心，当时国内意见不一致，一打仗，领导人的威信就起来了，我觉得刘中将说的不无道理。

如果老江在南斯拉夫炸馆事件之后也能豁出几十万生命搏一下，没准现在大街小巷也在传唱"扬州的山啊，扬州的水。扬州的山水分外美，扬州中学有个学生会，学生会有咱江学委"。只可惜老江只惦记着梳头，忘记了这树立威信的不二法门，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使人伤感地想起"孔雀只顾着梳理羽毛，忘记了飞翔"的谚语。退而求其次，体育运动，尤其是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也有类似的效果，这次奥运会，将对当今党威国威领袖威，都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二杆子的玩法和领袖个人的经历和环境有直接关系。和毛泽东整天钻山沟、打土豪不同，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主要就是流放。列宁从上学开始就被流放，以后无论是犯多大的事儿，受到的处罚最多也就是个坐牢和流放。长期和俄罗斯的公检法打交道，列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沙皇的专制是徒有其名，"表面上很独裁很专制，骨子里却是很自由很民主的"，看出了沙皇等一切反动派完全是泥足巨人。按列宁自

己的话说就是沙皇虽然是一堵墙"但这是一堵朽墙，一撞就倒。"

根据列宁本人描绘，他在苏申斯克流放生活就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列太太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就更令人羡慕："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

这哪里是什么流放？哪怕在当代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看来，恐怕也得属于部级干部带薪疗养。"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就这样，列宁一边钓鱼，一边完成了 60 卷《列宁全集》部分内容。《托洛茨基全集》更吓人，竟达 150 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不知里面有多少是流放时杰作。斯大林的流放生活我看到的资料不多，只是看到一位流放者这样的回忆："斯大林落落寡合，不与人往来""动辄大动肝火，虚荣心很强而又不愿与人为善的斯大林，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难处的邻居。""他终日打猎，钓鱼，几乎完全生活在孤独之中。"而且与列宁打猎时爱用枪不同，"斯大林打猎时从不使用猎枪，而是喜欢下捕兽夹子。"

下面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我们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流放地和监狱对他们来说就是大学，而且课外活动丰富，沙皇大量的抓捕流放革命者等于是今天的大学扩招。

据老一辈无产阶级流放家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斯大林同志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

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 1937 年中央 2—3 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现的监狱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恐怕要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了，再也不会出现"从 1901 年 3 月到 1917 年 2 月，斯大林先后 7 次被捕，6 次流放，5 次从流放地逃出。"的现象了。更谈不到"每个星期宰一头羊""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之类的美事。

我后面附了个帖子，记述了领袖对沙皇时期流放生活的温馨回忆。

即使是蹲大狱，也很难说受到了过多少迫害，对这个问题我从小就有疑问。记得上

小学的时候，课本上有一篇记述列宁如何机智勇敢的文章，题目是"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给孩子辅导功课、当陪读，又用孩子的课本温故而知新了一次。内容很简单：在 20 世纪初的某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监狱里。监狱怎么关得住列宁这颗革命的心呢？监狱里有个图书馆，被拘禁的人可以随便借书（估计还有不少马恩著作）。列宁每次去，总要借一大堆书。靠着这个图书馆，列宁在监狱里写了俄国共产党的党纲，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秘密地传了出去，指导外边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的办法是，用牛奶把字写在书上空白的地方，书传到外边，同志们把书拿到火上一烤，字就显出来了。他用面包捏成许多装牛奶的"墨水瓶"，埋头写作的时候，碰到宪兵来检查，就把"墨水瓶"吞进嘴里。有一次，列宁在写给同志们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

当时就把我们这帮饥肠辘辘的孩子馋的直流口水，我们那里是凭着医院的证明才能喝到牛奶，我弟弟 60 年代的时候得了肝炎（据说是和吃伊拉克蜜枣有关，而古巴糖可以治疗），凭着医院证明每天可以喝到半斤牛奶，每次他在喝牛奶的时候我都要拿眼瞪他，并告诉他喝牛奶千万别喝出声来，否则即使肝炎病号也少不了挨打。而在沙皇的监狱里，列宁竟是放开肚皮喝奶，放下面包写文章。难怪课文的结尾这样写道：有一天，列宁的姐姐来探望他，告诉他说："听说案子快结束了，不久你就可以出来了。"列宁笑了笑："早着呢，我的资料还没搜集齐呢！"看来如果不是外边需要列宁去发动起义，列宁很愿把牢底坐穿。

经过多年来的牢狱和流放生活，列宁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同时也使列宁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一个人民的契卡，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契卡，就是后来的克格勃，苏联时期的秘密警察。

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当年列宁的哥哥谋杀沙皇，家人没受到任何牵连。列宁组织推翻"专制独裁的沙皇政府"，也不过是吃几个墨水瓶。而列宁上台后，马上将沙皇满门抄斩，连未成年孩子也未能幸免。更叫人拍案叫绝的是，列宁和斯大林革命理论里面从此还多了一条：契卡主义。

转帖

程映红：列宁幸福的流放生活

在苏联官方的历史教科书中，俄国沙皇政府有数不清的残酷罪行，其中之一是流放革命者。虽然沙皇没有杀过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是把这项艰巨的任务全部留给了斯大林去完成，但不管怎么说，流放到西伯利亚听上去就令人发颤。这个罪行究竟残酷到什么程度，列宁的流放生涯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细节。

1897 年二月，列宁在彼得堡被判处去西伯利亚流放三年。判决下达后，列宁的母亲就向当局要求推迟动身的日期，理由是儿子的身体不好。后来她又要求在路经莫斯科时停留一个星期。她还提出路上的费用全部由列宁家人负责，这样列宁可以吃得好睡得香。她甚至写信给东西伯利亚的总督，要求将儿子流放的地点选在叶尼辛省南部的某个小镇，那里气候对列宁的健康有利。同时，列宁本人也向政府提出了这

些要求。当这些要求被满足后，列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在监狱外自由自在地活动，准备好行李，从容地和亲友话别。

列宁流放的地点在苏申斯克，这里是西伯利亚气候最好的地方之一，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北国江南。除了家人给他寄钱外，沙皇政府还给每个流放者每月 8 个卢布的津贴，列宁根本不用从事伐木或者背纤这些被革命史学典型化了的囚徒的苦役。列宁写信回家描绘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是："除了打猎、钓鱼，就是游泳，大部分时间化在散步上"，"睡觉的时间特别长"，"住房和伙食令人满意"，还常常晒日光浴。他甚至把自己的流放地和家人在瑞士的度假胜地斯匹兹相媲美。在这里他还可以阅读各种政治书籍和杂志，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来往，讨论将来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列宁是 1897 年春季到达苏申斯克的，七月他参加了一个流放同志的婚礼。也许这次婚礼使他动了和志同道合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的念头。克鲁普斯卡娅当时因为同一罪案被流放在南乌拉尔的乌法。他们同时向流放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将克鲁普斯卡娅转到列宁流放的地点结婚，这个要求获得了批准。1898 年五月，列宁的未婚妻来到了他身边，同行的还有他未来的丈母娘。那年七月，婚礼在一个教堂举行，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无神论者，但政府不承认世俗婚姻，所以这对反基督的新人只好接受牧师的祝福。这是个令列宁尴尬、官方正史避而不提的事实。

列宁婚后的生活由两个女人照顾，自然是悠哉游哉。克鲁普斯卡娅有一段文字描绘她丈夫在流放地的起居："苏申斯克的东西便宜极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8 个卢布的'工资'给他提供了一间干净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缝缝补补。午饭和正餐当然是简朴的。他们每个星期给伊里奇宰一头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们还把伊里奇每周供应的肉食倒在饲料槽里，由村里的姑娘给他切成肉排。伊里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养的那头叫赞卡的狗，教它把抛出去的骨头拣回来和其它各种游戏。"

然而两个女人还不能伺候得列宁心满意足，于是出现了第三个女人："那个夏天我们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做家务。妈妈和我在灶前手忙脚乱，我不知把汤打翻了在地板上多少次。十月里，一个叫帕莎的女孩来帮我们了。她 13 岁，瘦得皮包骨头，她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我教她识字，她对墙上妈妈贴的一张纸条奉若神明：'永远，永远不准把茶打翻！'"

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知道他们的伟大导师曾经在流放地雇佣过一个皮包骨头的乡下女童工？又有谁知道克鲁普斯卡娅的扫盲竟然是为了让这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女孩能看懂给她的训示？

大概克鲁普斯卡娅革命后对扫盲和教育的热心和灵感就起源于那一刻吧？

1900 年二月，在幸福的流放中成家并养得结结实实的列宁刑满回到了彼得堡，不久就出国去了西欧。18 年后，他终于有机会报答那个对自己在流放中有求必应的"残酷"的旧政权的头目沙皇尼古拉二世了：他下令给叶卡特林那堡的契卡，将关押在那里的沙皇一家，包括未成年的子女、医生和仆人全部枪决。但直到 1991 年苏联解

体，人们只知道那是叶卡特林那堡"地方"苏维埃和契卡作出的决定。

杂谈二杆子(7):西伯利亚最冷,皮夹克最亲(上)

金唢呐

由于领袖的革命生涯，以及老毛子的国民劣根性如酗酒、野蛮、残忍、冷酷、报复心强等特点，再加上寒冷气候对人心情的影响，决定了斯大林玩二杆子的手段，那就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帮家伙总是穿着皮夹克，以下简称皮夹克），这也成了苏联二杆子的重要标志。这种皮夹克不要说在西方国家，就是在中国，恐怕也找不到同类物。"皮夹克之家"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此后，这一机构换了五六个名称，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但一直不曾变化的，便是所奉行的契卡主义。契卡主义这个词我是在一本书名叫做《摆脱克格勃》的回忆录里看到的，作者瓦季姆•巴卡京是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在。按照巴卡京书中的介绍，我理解契卡主义大概包括这么几个内容：

一、契卡虽然是个司法机构，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个专政机关。它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与现实政权和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以"党和人民"的名义，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和领袖的要求，监视"党和人民"的一举一动，在"党和人民"之中寻找并消灭"敌人"。当然这个机构也有一些针对敌对国家的，像派遣情报员、特工，搞暗杀、颠覆、渗透、破坏之类的活动。我记得 70 年代参考消息上刊登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文章里有克格勃海外活动的系列报道，好像手段以美人计（含美男）为主，女特工统称为"燕子"，因为那时候一味追求低级趣味，只顾的看美人计细节，看燕子们如何俘获了一个又一个的 007，忘记克格勃男特工怎么称呼了，大概不会是"鸭子"吧？老芦趣味广泛，不知您老是否还记得？这部分工作西方皮夹克也有，这里不再多说。

客观说，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遏制贪污腐败的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一套还有兴趣。2008 年 3 月 1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即将就任的新总统梅德韦杰夫、国家杜马讨论如何实现 2020 年国家计划（即所谓的"普京计划"），与会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对该计划提出了异议，他说，如果要兴建 100 套住宅，首先要解决的是官员腐败问题。久加诺夫说："这需要 24 小时追查账单，随时警惕贪污的发生。"普京总统回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中世纪的办法，剁掉那只爪子。","只要这样做，伸出去收钱的爪子就会停下来。"仔细品味两人的对话，还真是有皮夹克味。

二、"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然后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必须把敌人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按中国的说法就是"莫须有"。哪怕是夫妻间对话，也可以作为犯罪证据。当时对"敌人"有着十分离奇的规定："包含号召性的鼓动"，这可以理解为亲人朋友间的私下谈话，私人信件；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言行，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行为。"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着皮夹克的失职。

在最为恐怖的大清洗年代，敌人的定义是阶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几句阶梯诗：

谁今天——
不跟我们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面就有这样的荒诞的场景描写，造纸厂厂长在宣读致斯大林效忠信大会上因为第一个停止了鼓掌被皮夹克送进了监狱。我把它附在后面，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看一下。

三、要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皮夹克们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借助笔杆子的帮助，教育人民，让人民把这种荒诞不经的玩意当作神圣的事业。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为党、为人民尽着神圣的义务。

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线人"。面临着随时可能遭遇"和平演变"的恐惧，战斗在柏林墙第一线的东德东德设立了"斯塔西"（STASI）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皮夹克机构，为东德 1800 万人口中的 600 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被监控，党的眼睛和耳朵（即线民）人数接近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来自家庭的"老婆（公）在看着你"。在柏林墙竖起的 28 年间，平均每天就有 8 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

1990 年两德统一，"斯塔西"的档案陆续解密，对研究人员和媒体开放，也对全体公民开放。据说，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足达 1000 公里长。申请阅读解密资料的手续简单，年满 18 岁的公民持个人身份证即可查阅自己、近亲（包括已去世者）的档案。阅读风暴由此掀开。人们在浩瀚的资料里愕然发现自己的很多同事、朋友都是"斯塔西"的告密者，甚至夫妻双方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着对方，失望之余，双双自杀。整个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这也使得《窃听风暴》这样的电影得以问世。《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的妻子就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 254 页相关记录。这样体验生活的演员、这样的影片如果再不获大奖，恐怕上帝都不干。

虽然文革期间也有老婆揭发丈夫（如刘少奇前妻王前），儿子痛打老子（如陈凯歌），但那与斯大林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不是专政机构的安排，而是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文革时期很多高干家的警卫保姆秘书揭发控诉主子，属于响应号召揭竿而起，而不是事先安插的线人。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做法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斯大林的做法目标明确，监视谁不监视谁，监视什么，线人举报了什么，给监视对象造成多大伤害，一切都清清楚楚。日后处理（追究、平反）起来非常容易，所有东西都清清楚楚写在档案里，根本不存在"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问题。不像中国，连文革期间的大

红大紫的章含之都满含热泪，以文革迫害对象的身份声讨四人帮。仗着文笔好，一本《厚厚的大红门》，竟也能书写历史，流芳百世。

诸位也别嫌我啰嗦，索性再说个发生在体育明星身上的故事。

德国花样滑冰明星施托伊尔（Ingo Steuer）就是这其中的一员。施托伊尔父亲是冰球运动员，母亲是田径运动员，他自幼表现出来的超人的弹跳和旋转能力很快就被人发现。5 岁时被送进了国家滑冰训练基地，11 岁时，"斯塔西"开始暗中观察他的行为。15 岁入选国家队。18 岁获得了世界青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双人滑冠军。这一年也就是 1984 年，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也是他政治生活中的转折点——这一年，正好是电影《窃听风暴》故事开始的年代，也恰好与奥威尔的著名小说的标题——《一九八四》契合。按照现存"斯塔西"档案记载，这一年的 12 月 10 日，星期一，几个安全部的官员找到他，问："你愿意加入到国家安全部的行列吗？"按照施托伊尔后来的回忆，他们算好了，施托伊尔的父母都不在家，先是夸奖他，这让施托伊尔受宠若惊，因为他的童年很是郁闷，在学校里几乎是个边缘人。在他成人之际，党竟然派人上门拜访，施托伊尔很是兴奋，觉得有了组织归属感。几乎没怎么犹豫，施托伊尔就同意了。

到了 1985 年的 1 月 25 日，他给国家安全部寄去了他的决心书："在对敌斗争中，我将随时利用一切手段完成重要的工作。"从此，他有了一个化名"托斯顿"（Torsten）——这是安全部的规矩，进去的所有线人都有化名。现存的档案显示，施托伊尔一共上交了 84 份小报告，得到了 4400 元东德马克的报酬。两德统一后，他的运动生涯逐渐达到巅峰：1995 年，欧洲冠军；1997 年，世界冠军、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冠军；1998 年，他在经历了一次膝盖手术和一次车祸之后，依然获得了长野冬奥会的第三名，成了万众瞩目的冰上王子，后来又是声名显赫的教练员。

然而，2006 年都灵冬奥会前夕，德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宣布，鉴于施托伊尔在东德安全部的线人生涯，取消他的国家队教练资格，不得随队前往都灵。施托伊尔告到了柏林州法院。法院宣布国家奥委会的决定无效，理由是："国家奥委会的决定缺乏法律依据。"宣布裁决的法官同时强调："这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一切都已成为历史。"在法律面前，施托伊尔取得了胜利；但在社会舆论面前，他仍然面临着质疑和指责。有人说他三个月就得到 4400 马克的报酬，是线人中不多见的几个挣大钱的人物之一。挣大钱的线人，怎么可能不贡献有价值的小报告呢？施托伊尔拒绝这样的指责："第一，那时的我还是个 18 岁的孩子，对将来一无所知：第二，如果拒绝和安全部合作，我就不可能再从事体育运动——它是我的生命，我将不会再有什么前途；第三，我做线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造成严重后果，我没有告发过任何人，只是应付差事而已。"针对别人说他拿了四千多马克报酬，他发誓，他没有用小报告换取过一分钱。 任务只是监视。

其实，安全部的官员看中施托伊尔，就是为了让他监视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花样滑冰的巨星卡塔琳娜•维特（Katarina Witt）。由于她过于星光熠熠，西德曾以优裕的物质条件相利诱。东德政府为防止她叛逃，决定在她身边安插一个线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卡塔琳娜告诉记者，她早在 15 年前已经阅读了"斯塔西"搜集整理的她的档案，那时她就知道施托伊尔是许许多多监视她的线人之一。但她强调，这事已经了

结。现在她希望的，是这些档案永远躺在档案馆里，蒙尘发霉，不再被人提起。记者有些惊讶："难道你不恨施托伊尔？"卡塔琳娜的回答是："如果他泄露了某人的逃亡计划，如果他把欲逃亡的 10 个人送进了监狱，那我会恨他。据我所知，施托伊尔没有干过这种事。"她还透露了施托伊尔小报告的一个段落："我们开车去格腊（Gera）的马戏团，卡塔琳娜开着拉达车，以每小时 110 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撒野。我们必须停下来，因为我们颠得要吐了，我请求她，别再像小孩子一样胡闹了。"卡塔琳娜甚至为施托伊尔解释："当时他很年轻，也很幼稚。在前东德，我们每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钟型玻璃盖的奶酪盒子里。这一切都成了过去，那就让过去的事情保持原来的样子吧！"现在施托伊尔依然做他的教练，而且依然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明星教练，他现在的弟子 Aljona Sawtschenko 和 Robin Szolkowy 刚刚获得了 2007 年欧洲冠军，继续延续着施托伊尔当年的花样滑冰双人滑传奇。

这才是真正的"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把事情说清楚，该受惩罚的受惩罚，该受良心谴责的自己去反省，没事的人该干什么去干什么。

对比一下中国，从头到尾一笔糊涂账。连斗争对象是谁都分不清。文革时期，经常出现这样的壮观景象：两派革命群众打得死去活来，都声称自己站在革命路线一边，都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像六七年一月三日发生在南京江苏饭店的那场大规模武斗（一三事件），武斗的双方都是在为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而战斗。武斗的一方是南京工人赤卫队，是仿红色时期的工农赤卫队命名的，赤卫队员们认为江苏省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下属机构，另一方是南大南工南体的红卫兵大学生，凭着敏锐的革命洞察力，认定江苏省委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决定擒贼先擒王，攻入江苏饭店。于是赤卫队守，大学生攻，攻方的口号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守方赤卫队员们则狂呼"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赤卫队是打不垮的"。最后，红卫兵靠消防用的高压水龙头拿下了赤卫队。

大学生造反英雄们回到学校后，"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学校里由老共产党员组成的老保组织也给端了。起初老共产党员们还组织全市大游行，高呼"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是打不垮的"之类的口号，红卫兵们拿出当年赤卫队收拾土豪劣绅的手段，诸如戴上高帽子、剃着阴阳头、用鞋带在耳朵上挂个破鞋、敲个破脸盆高喊"我是老保"之类的花样，最后还是统统把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老共产党员们彻底拿下了。

而越是人们需要毛主席拨迷雾指航向的时候，毛老人家越是迟迟不发话，在那儿翻来覆去说"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宇宙语让大家猜谜。记得当时最新指示发下来后，人们翻来覆去地看，试着从字缝里找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哪儿。每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莎士比亚的三大悲剧、三大喜剧纯粹是徒有虚名，场面小人物少不说，情节内涵和艺术张力也很有限，远远比不上这场由伟大领袖亲自策划、编剧、导演并领衔主演的这场悲喜剧。以至于我 70 年代末在大学学英语是看到"more A than B"的句型，马上就想到了这样的句子：与其说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倒不如说是位艺术大师。

四、……
先休息几天

《古拉格群岛》里的一个荒诞的场景描写

摘自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上册，群众出版社，1996 年 12 月第 2 版，第 69-70 页。田大畏 陈汉章译，田大畏校，

请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省）正在进行。主持会的接替不久前入狱的前任的新区委书记。在会议结束时通过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说，全体起立（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大家也都一跃而起）。在这个小礼堂里"掌声雷动，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依然是掌声雷动，依然是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欢呼。但是手掌已经发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经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但是连那些真心诚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经感到这种状况蠢不可耐了。然而，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那个站在台上刚宣读过效忠信的区委书记本可这样做。但他是刚上台的，他是来接替入狱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啊！要知道在这里，在会场里，也有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站在那里鼓掌，他们注视着谁将第一个住手。。。。。。于是在这个不知名的小礼堂里，在领袖不知道的情况下，掌声持续了六分钟！七分钟，八分钟。。。。。。。他们完蛋了！他们活不成了！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直到心脏破裂倒在地下！在会场后排，在人堆里，还可以稍稍耍点沿着，拍得少些，不那么使劲，不那么狂热_____但是在主席台上，在显眼的地方怎么办呢？！本地造纸厂的厂长，一个独立不羁的紧张的人，站在主席台上，明知道这个局面的全部虚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绝境，但也在鼓着掌！___九分钟！十分钟！他愁眉苦脸地望着区委书记，但那个人却不敢停下来。发疯了！大家都 发疯了！区的头头们怀着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觑，但脸上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他们将继续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担架把他们抬出去！甚至到那时候，剩下来的人也不会动摇！。。。。。。但造纸厂厂长在第十一分钟上恢复平常的办事的神态，在主席团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于是_____啊，奇迹发生了！全场那种欲罢不能的难以形容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大家同时在同一击掌声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来。他们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该从转轮上跳出来！。。。。。

然而，也就是这样发现独立王国的分子，也就是这样把他们摘除。造纸厂厂长于当夜被捕。完全以别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给他们搞上了个十年。但是，当他在第二 0 六页（最后一页侦查笔录）上签了名以后，侦查员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这就是达尔文的物种天择。这就是用蠢事搞疲劳战术。

杂谈二杆子(:西伯利亚最冷,皮夹克最亲(下)

金唢呐

先向诸位网友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跟帖时总受到警告：请不要重复发帖。我哪有功夫干重复发帖这种事？
那天"字母"来闹，有个主贴是专门针对"样板戏专家金唢呐"的，里面还有个李玉和"沐猴而冠"的图片。我当时看了以后就想在跟帖要求芦特首保留这个帖子，而且想声明

一下：凡是针对我的帖子，只要不涉及本人亲属、不漏点（含第二性征）、不提排泄物（包括气、液、固三态），都可以保留。想想这孩子，忙活半天，也怪可怜的。是不是在国内用代理服务器上网的都是这样的结果，"新版海川欺我用代理，公然挥刀删帖去"，还是因为我老眼昏花，操作上出了什么问题？

接着说二杆子的事儿。上次说到了契卡的第三条。

四、设立契卡，最初作为保卫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临时镇压机关有它一定的道理。问题是苏联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已经坐稳了老大的位置，苏维埃政权也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倒不一定，但存在的往往有它的理由。我认为原因就是这种体制，根本没有解决矛盾的机制。

从党内来说，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党内必须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列宁没有好意思说的，就是还有党内的权力之争。社会上则是有阶级斗争，按照斯大林说的，"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专政者。专政越深，反抗越烈。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得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加强"的结论。在一个专制国家里，因为没有民主协商、妥协让步的机制，就只有通过"消灭"、"改造"的手段来解决，矛盾的一方不存在了，矛盾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说到这里也顺便说一下，毛泽东所说的阶级斗争学说，即社会主义将长期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完全是斯大林的翻版，毫无原创性可言。就如同毛主席的光辉哲学《矛盾论》、《实践论》里几乎每一句话都可以从洋导师那里找到出处，甚至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艾思奇的通俗哲学小册子里面的二手货一样。但是在具体做法上，他老人家确实有创新。在当时的苏联和中国，有一种奇特的民主平等：就是在领袖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职位多高、资格多老，昨天你整我，今天我斗你，"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互相监视，而且有义务告密。每一个人都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一个人。就所处的奴隶地位来说，所有奴隶都是平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恶魔》)。无论彭大将军还是红军之父，也不管你是否违反了法律，转眼之间都可能是阶下囚、穷光蛋，甚至连性命也保不住，这种"平等"在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是不会有的，在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也没有，只要不犯错误，高干就永远是高干，甚至后代都是高干。这也是工农群众至今人们仍然在怀念的毛时代的平等，从本质上来讲，这是一种"奴隶平等"。

斯大林认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再发动一批不穿皮夹克的人民群众（也就是线人），以党和人民的名义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活动，将一切颠覆破坏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的"萌芽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使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所谓二杆子里的枪杆子，实际上就是个人专政。对于这种制度的性质，自称是"我是和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亲密同事。……我是斯大林的背叛政策和强盗政策的见证人。"的赫鲁晓夫说的最深刻。在这位斯大林的亲密同事和毛泽东的曾经对手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两者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斯大林和毛都要加强他们个人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个个人对无产阶级、对党、对自己的同事的专政。你要么在领袖的权威面前低头屈服，要么就会遭到和其他一切'敌人'同样的命运。(《最后的遗言》P426—428)""自从我退休以后，毛又想出了另一个口号——'文化革命'。""在中国，他们可以把这叫作'文化革命'，但在我国，我们曾称之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30 年代大清洗时期斯大林提的口号——原注)。这两者是差不多的，半斤八两。"

只要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搞独裁。对此，毛主席有过明确的指示：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这里的"或"和英文 or 是一个意思，当"也就是"解。但具体的做法完全是因人而异，因民族而异。中国的做法给世界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印证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之类的艺术规律，也反证我所说的：和斯大林相比，毛的做法更具艺术性，是二杆子领域的唯美学派。即使在苏联，如果列宁活着，或许也不是这么个搞法。这点赫鲁晓夫也有洞察："当然领袖惩罚自己的牺牲品有不同的方法。斯大林惯于用逮捕、枪决和谴责为人民的敌人等做法来达到目的。而在沙皇时期，法庭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搞过所谓'文明的惩罚'。"，"毛的做法与沙皇的做法相似：他把他的对手放到广场上去示众，头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市民们在被俘者周围跳着粗野的舞蹈。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本来就是野蛮人，但他们受毛泽东的驱使，变得野蛮了。(《最后的遗言》P427)"

赫鲁晓夫把伟大领袖和沙皇并列，完全是对伟大领袖的肆意侮辱，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囚禁与流放期间的写下了的《怎么办？》（1862 一 1863）和《序幕》（1867 一 1869）这两个反动大部头，就是我至今这个自由人所不敢想象的。更何况那点"文明惩罚"的小儿科玩意根本不是老毛屑于玩的东西，他老人家更不会去干让列宁吃羊肉吃倒了胃口的蠢事，而沙皇却是正是这样的蠢人。实际上在中国，毛泽东就是拿着枪杆子运动群众。无头大苍蝇王带领一帮无头小苍蝇胡打瞎撞，到头来是乱了自己，笑翻了敌人，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新中国。

斯大林和毛泽东之所以有这种差别，我看首先是领袖的革命和革命前生涯不同，个人品质性格爱好不同，还有就是国情不同所致。

苏共中共领袖们的革命生涯截然不同。记得中共当年评十大元帅要看是否参加过三大起义，评大将要看是否爬过雪山草地，再往下面就是要看所谓"抗日战争吃过糠，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而老毛子不讲这一套，一讲资历就是坐牢几次、流放几次、逃跑几次。十月革命成功其实很简单，根本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惊心动魄。那场被称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占冬宫起义，用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当天通告的说法，"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斯大林就没怎么参加，"说什么流放地安哨布岗，我看它只不过纸壁蒿墙，眼见得莫斯科遥遥在望，此一去捣敌巢擒贼擒王!"即便起义发起者也没想到这么容易。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实际情况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不过发射了一炮信号弹，。因此，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从

他们的个人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就是：不是我们太狡猾，而是沙皇太稀松。尤其是公检法，简直就是个福利机构。

真正"震撼世界的 X 天"还是几个月后，次年 1 月，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强令解散立宪会议，要求"一切权力交苏维埃"，这个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国，引起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愤怒。连左翼作家高尔基都悲愤地说，布尔什维克用"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份子为之奋斗的美梦"！在往后，将沙皇全家满门抄斩，砍翻托洛茨基，处死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两次大清洗、三次大饥荒，那才是真正的震惊世界。当然，人家可不是为了"锻炼群众"，而是实实在在弄出个工业化强国，打出个社会主义阵营，让社会主义的力量第一次超过了资本主义。当然，皮夹克还同时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皮夹克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机"的运作，国家不再具有活力，社会僵化，给我的感觉 70 年代的苏联，连空气都是凝固的，不知道我这么认为是不是上了《参考消息》的当。

在斗争中，列宁、斯大林从来不施小恩小惠这一套，我认为这与民族性有关。老毛子冷血、残暴，话不多，抽烟斗喝烧酒，打老婆，而且好色。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响应斯大林"血债要用血来偿还"的号召，一路打过去没少糟蹋妇女。据资料显示在德国，老毛子干了一百万，波兰是一百三十万。我感觉好像寒冷地区的人们都有这特点，我接触的北欧人也是这样，三棒子砸不出个屁来，一天到晚喝闷酒。即使北欧拍的 A 片也不像日本有那么多的讲究，那样细腻，清一色的霸王硬上弓，即所谓粗犷、豪放。更没有毛润之、章含之那么多花样。像苏联皮夹克处死人时最喜欢用的"近距离后脑勺"方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苏共领袖们从自己的革命生涯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周宰一只羊，吃羊肉吃倒了胃口"、"牛奶随便喝"、"终日钓鱼打猎"之类的省部级待遇尚且不能打动自己，问寒问暖、帮着俄罗斯农民挑水扫院子就能奏效？老毛子还有一个特点，永远不屈服，报复心还特强。因此契卡一成立，它的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就要求有不经审判直接枪毙人的权力："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用不着做什么侦察或暗探的工作......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 捷尔任斯基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态度，也与他被流放和监禁的经历有关。对政治事件的调查，他要求一开始就利用特情关系打入敌人的内部卧底的办法来进行。告密者、"线人"、密探，是侦察的主要工具。

如果让我评论今天的普京政权的话，首先应该说他搞得确实是资本主义，实行了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多元化、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这些资产阶级政治文明通行的基本准则，对于过去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持否定态度，没有自称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不搞挂羊头卖狗肉这一套。普京本人也亲自前往莫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并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普京还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皮夹克的作用，搞"具有皮夹克色彩的资本主义"。2004 年 9 月 11 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该雕像的主人就是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的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彻底告别苏联痕迹的重大举动之一，1991 年的"8•19"事件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欢呼雀跃中推倒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同莫斯科街头拆除的其他雕像一起被放置在莫斯科的中央美术馆旁边的公园里，任凭风吹雨打，似乎已被人彻底遗忘。可是现在仅仅相隔 13 年却又再次请他"出山"，就是因为当年在捷尔任斯基的直接领导下，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扫除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清除了内战的创伤，尤其是在救助孤儿、重建铁路、恢复经济等方面，"契卡"确实功不可没。

普京总统当政以来，俄社会形势趋于稳定，经济连年呈增长态势。可是，俄罗斯社会治安却不敢恭维，犯罪案件不断上升，恶性杀人案、政治谋杀案、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居然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接连发生了两架客机同时坠毁、莫斯科地铁车站自杀爆炸以及北奥塞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人质劫持事件，俄罗斯人开始人心惶惶，尤其生活中没有安全保障而且看不到改善的迹象令他们十分不满和愤慨，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捷尔任斯基这样的铁腕人物也就属于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俄罗斯人眼里，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曾经令那些贪赃枉法的人胆寒，今天俄罗斯恰恰需要这样的象征。

普京自己至今仍为自己曾经在克格勃工作过引以为豪。在别斯兰人质解救行动结束之后，普京在面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统一而强大的苏联的解体使得俄罗斯失去了快速有效对付突发灾难、尤其是恐怖行动的能力。面对恐怖主义、尤其是国际恐怖主义对俄罗斯的日益严峻挑战，普京已经没有更多的高招，他现在急需像捷尔任斯基一样的铁腕手段来安抚民心并且整顿社会。

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就像我们痛恨四人帮而怀念毛主席、痛恨资本主义而喜欢欧美一样，他们虽然彻底告别了社会主义时代，却怀念皮夹克的威力。对他们来说，西伯利亚最冷，皮夹克最亲。

杂谈二杆子(9):三岁看大,五岁看老

金唢呐

老芦在分析毛泽东成长历程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小毛和中毛受到了刺激，所以老毛掌权后才会对专政对象出狠手。不仅如此，连"一个也不饶恕"、"痛打落水狗"鲁迅也是这样，由于祖父参与科举舞弊被下了大狱，家庭败落，遭人耻笑侮辱，使得鲁迅受到了强烈刺激，形成了"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阴暗心理。我觉得老芦说的非常有道理。不仅是老毛，凡是日后上台出狠招下重手的家伙，像希特勒、斯大林大都是在他们的青少年受到过恶性刺激，以致上台后出现过度反应，他们的成长环境，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日后二杆子的玩法。

一、毛泽东受到的恶性刺激：

1、毛新宇在他的回忆文章（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回忆的，出生几年，连爷爷的面都没见过）里谈到，他的曾祖父毛顺生偏偏是要孩子极不顺，毛泽东前边两个都没保住，等小毛生下来以后，顺生老爹并没有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而是把前边两个夭折的孩子的账都算在了"克兄"的小毛身上。据新宇说，富农顺生爷自己隔三差五的要吃个鸡蛋和肉，每逢初一和十五，都要给长工吃鸡蛋而不给肉，而对小毛"既不给肉也不给鸡蛋"。而且顺生老爹脾气暴性情倔强，动不动抄起棍棒论短长。有一次小毛又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顺生老爹再揍小毛的时候，小人家"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本来是人的生物本能，后来居然也成了军事思想）"，最后追到无路可逃的时候，小毛就指着后边的水塘对老爹说，如果再打，我就下去"润之"。顺生老爹怕孩子玩真的，只好服软。新宇孙总结说，从这件事，小毛看出了只有斗争、反抗才有出路，妥协、退让只有死路一条。

下面是几十年以后，赫鲁晓夫的回忆：

"当出席会议的 80 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发表了一次演说，其要点如下：'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三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他讲的最后那句话比我这里复述的要粗鲁。他用了一个猥亵的说法，但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说的了。我坐在孙逸仙的遗孀旁边。她听了毛的这种挑逗性的话，失声大笑起来。毛也笑了.......但是毛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对于这样一个演说，谁也没有精神准备。"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说他的六亿人口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 1200 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最后的遗言》P394）"

可以看得出来，帝国主义在毛泽东眼里完全就是顺生老爹。

2、上学时受到富家子弟的奚落；
3、在北大遭遇傅斯年和其它大腕学者的蔑视，口虽不言，目笑存之；
4、苏区遇到莫斯科海归派的嘲笑和挤兑，人造黄油遇到了纯度不高真黄油。
以上这些内容芦笛先生文章里都有，写的比我精彩深刻的多，就不在这显眼了。

二、希特勒受到的恶性刺激是"国家仇、民族恨"
1、作为普鲁士军人希特勒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惨败，作为一个"强国"的国民，亲眼目睹了德国在那份旨在惩罚、削弱和侮辱德国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感受了英法列强对德国的羞辱。

与中国的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情况不同，那时的中国是：男人一杆烟枪、女人一双小脚，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漫山遍野的阿 Q 小 D，在亚洲除日本外尽成殖民地的情况下，老佛爷能把这个破桶箍住不散也就够不容易的了。而德国可是"积富积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光德国人西门子制成发电机从而形成了

电力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应用，以及德国人本茨制造了第一辆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这两条里程碑式的贡献，就足以"当惊世界殊"。据统计，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德国一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就这么一个世界超级强国，被英法如此修理，是可忍孰不可忍！

2、作为流浪汉，目睹了那些衣着鲜亮犹太富商们出入银行、高级酒吧、歌舞厅，"我们创造了社会财富他们享受，我们受尽压迫剥削却养肥寄生虫"。进而得出结论，德国不国，都是犹太人搞的，犹太人不亡，德国就要亡。

所以希特勒没有阶级仇，只有民族恨。亲不亲，民族分。所以上台后要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制造出种族灭绝的大惨案。而在纳粹侵占法国后，希特勒发表胜利演讲的地方专门选择了法国的一战胜利的雕塑旁边：一把刺刀插在鹰（德国象征）的胸膛里。算是替全体日耳曼人出了"凡尔赛条约"这口恶气。

三、斯大林受到的恶性刺激：
1、和小毛一样，小斯也是经常挨揍。只是与韶山偏杠子顺生老爹不同，老斯是个鞋匠，没事喝两盅，醉酒后拿小厮撒气。给我的印象那时老毛子们的生活就像一首俄罗斯歌曲唱的："生活像泥河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喝酒烧焦我的心头。""但见父亲打着儿子，丈夫敲他们老婆。"这种人撒起酒疯来，很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且"投水润之"之类的小花招也难奏效，恐怕等不到小厮在池塘边开口威胁，老斯后边一脚就把他踹进水里去了。所以，斯大林上台后手段极其粗暴简单，根本不讲什么道理，完全是对付醉汉的做法。像处死高层干部还审讯一下，处死不听话的农民和战俘，根本没那么多废话，都是"近距离后脑勺"模式解决。这个词最初我是在一篇日本老兵的回忆录里看到的：关东军投降后，他们那个连队的 400 人一度和苏联红军相处很好，可有一天，老毛子发现剩下的面包只够 150 人用的，就从战俘中挑出 250 人，让他们背过身去，拔出枪来对着后脑勺点名。然后把剩下的 150 人带回西伯利亚伐木头。

后来，在介绍"卡廷森林惨案"又看到的这种说法。1939 年二战伊始，德国纳粹曾经和苏联红军是盟军，希特勒攻进波兰，苏联配合纳粹的行动，从另一头入侵波兰，纳粹党卫军和苏联红军军官的手握在一起，就好象哥俩一样，"亲兄弟明算账"，微笑着瓜分俘虏来的波兰战俘：军官归苏联，士兵归德国。苏联把俘虏来的波兰军官分别关押在苏联境内的几个战俘营和监狱里，直至 1940 年 4 月这些战俘神秘消失。1943 年 4 月 13 日，纳粹在卡廷森林发现了埋葬波兰军官的万人坑，认为是斯大林所为。4 月 15 日，苏联发表公报，对此予以断然否定，宣称这些波兰战俘在德军入侵苏联之后落入德军之手，是被德军所杀的。纳粹又出示证据说，"对准后脑勺近距离射杀"的手法是典型的苏联皮夹克手法，为普鲁士军人所不齿。此后，苏联和德国均组织调查团前往卡廷实地调查，但都没有明确的结果。搞"文过饰非，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这一套，戈培尔根本不是塔斯社的对手，再加上后来希特勒战败，一盆子屎都扣在了纳粹头上，人们几乎没有怀疑除了纳粹外另有真凶，苏联成功逃脱世界人民的目光，将一个枪杀数万人的血腥大屠杀隐瞒长达五十年之久。直到 1991 年戈尔巴乔夫移交政权时，邀请叶利钦共同阅读总统密档第一卷，卡廷森林事件遂正式浮出水面，1992 年 10 月，叶利钦将三份密档的副本交给波兰总统瓦文萨，结束了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谎言。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两个说出事

实真相的夫子，也因此成了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被国人怒斥为搞垮社会主义的两个秃子。

关于屠杀者的动机有两个说法，一是波兰在一战之后入侵苏联，占领大批苏联领土，并屠杀了苏联五万战俘，老毛子报复心强，一直铭记在心，卡廷森林事件是对波兰的报复。二战前波兰是典型的"小姐身子丫环命"，小国做着大国梦，一天到晚光想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先是利用凡尔赛条约，仗着有英法美撑腰，迫使德国向波兰割让一大块被称为"波兰走廊"的领土，德国的领土因此被一分为二，东普鲁士省和本土间被波兰走廊隔开。后来又占了老毛子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地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里有涉及），中国 918 事件后波兰又是欧洲头一个公开支持日本，承认满洲国的国家。结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叫苏德两个大国杀的差点亡国灭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68 年又跟着苏军入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苏东波事件后又远距离抱自由女神的大腿，勇当反俄罗斯的排头兵。

卡廷森林事件另一种说法是苏联官方正式文件中提到的，波兰战俘是一个大包袱：一方面，苏联在紧张的备战中为其要消耗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兰战俘可能随时反抗苏联的监禁。所以决定卸下包袱，轻装上阵。1940 年，3 月 5 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贝利亚专门就对 2 万多余名以波兰军官为主的战俘和犯人实施枪决一事写出报告交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审批，随即获得批准。

不管哪一种说法我认为都符合斯大林的性格，都让人不寒而栗。

有时我就想，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的招数收拾起中国人来屡屡奏效，而让斯大林玩弄于股掌之上却毫无办法。比如说在莫斯科，斯大林愣是把毛泽东一行人晾干在旅馆里，气的毛泽东发了好几次脾气。恐怕搁老蒋早就坐不住了，忙不迭地要去问寒问暖。可斯大林根本不尿这一套，你再敢闹就把你扣下，安个什么国际间谍的罪名枪毙了都有可能。所以最后老毛只好采用"条陈谈判术"来和斯大林周旋。

2、作为残疾人受到的歧视。
按照官方资料记载，斯大林身上有两处残疾。一是 1917 年"无何沙皇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西线行。"斯大林因为"左臂干瘦"，被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认为他不适于服兵役而刷下。这"左臂干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因为从没有见过斯帅穿 T 恤的照片，不过根据我的理解，和我们一般概念里的"干瘦"应该不是一个概念。大概和新丰折臂有一拼，否则在那个战争时期，怎么能逃避兵役，落得个"一肢虽废一身全"的结果。

我记得当初为逃避下乡，大家都在找理由。我当时不仅"左臂干瘦"，而且右臂、下肢和躯干都干瘦，是全身性干瘦，最后还不照样下乡了。我们班最后提出申请的一个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也就是通常说的拐子。还一个是因外伤把眼球摘了一个，换了个假眼球。有混人糟蹋人家说是换了个狗眼，而且经常在后面骂人家是"瞎了你的狗眼"。还有一个自称是尿床，也就是医学上说的遗尿症，这一下可难住了有关干部。后来听说有人提出个方案，要他在办公室睡几天，探探虚实。反对者则说不用试，肯定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绝不会有第二种结果。而且，届时恐怕就不止是遗尿了，就像复辟了资本主义一样，地富反坏右会一起跑出来。最后这个孩子还是下乡了，

不过没和我们在一起，去了离城市只有 2 公里的郊区。

斯大林的另一处残疾是在脚趾，左脚的"第二和第三趾是连趾"怎么个连法我也不知道，一种可能是两个脚趾长在了一起，右脚是比翼鸟，左脚是连理枝。再一种可能是在第二和三脚趾之间长了个鸭蹼样的东西，"一条金色的飘带，把二趾和三趾连起来"。不管怎么说，这些事情都记在宪兵队的档案里，那些同牢狱友（有些还是刑事犯）估计也知道。再加上他五岁左右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却留下了后遗症，所以宪兵队后来在"特征"一栏里写着："麻脸，有瘢痕。"为这些，斯大林恐怕没少被取笑，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

斯大林的经历，不仅是他后来成了虐待狂、怀疑狂和迫害狂，也对他坚忍不拔的性格形成有很大作用。斯大林利用皮夹克的手段，确实干了几宗"大手笔"，而且在一定特殊时期，也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国力空前强大，愣是凭着自己一己之力，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的一片大好形势下，用了 17 年的时间、费尽吃奶的力气才将一个弹丸小岛台湾挤出联合国的"辉煌成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斯大林叫人敬佩的地方也实在太多太多了，正象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 1959 年 12 月 21 日斯大林 80 诞辰之际（当时斯大林逝世已经 6 年）在下院发表演说时说："对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她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她的是天才而且坚韧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他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斯大林身上是如此巨大，以至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领导人中，他仿佛是无与伦比的......他（斯大林）接受的是还在使用木犁的俄罗斯，而他留下的却是装备了原子武器的俄罗斯。"要说斯大林的毛病，我看就是一条：毫无人性。

杂谈二杆子(10):纳粹德国是二杆子国家吗?

金唢呐

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类似物。像唐德刚之辈，由于缺乏对这种制度的切身体会而留下的先天缺陷，所以才会一谈毛泽东，就要和历史上的"暴君"秦始皇相比，对毛中国社会的分析，动不动就提"秦政法"，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在卖弄历史知识，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说句狂妄的话，我对唐德刚这位闻名海峡两岸的大历史学家还真不看得上，起码中国现代史这一块，像他那样夹叙夹议的漫谈历史，我觉得大陆很多专业甚至非专业人士也能唬一气。至于史学界都夸他文笔如何了得，可我读后的感觉只是加斯特-嗖-嗖（just so so），按现在小青年常用的语汇就是"一般般"。

社会主义制度是天才的革命工艺师列宁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创立的全新社会制度，是我前边提到的列宁建党学说的延伸。在这点上毛主席的概念非常清楚，张嘴闭嘴就是马列主义，很少单独提马克思主义。我想他老人家从长期的二杆子实践中看出来了，如果没有革命工艺师列宁，不可能"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恐怕马克思主义最多只是"一个幽灵，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大英

图书馆徘徊着，全世界的书呆子们都在注视着这个幽灵"，仅此而已。没有列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会走出书斋，这样影响世界，把周天搅得寒彻。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红宝书的第一页第一段，写的清清楚楚："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是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说中国背叛了社会主义，就是因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玩意儿早就让十三亿中国人民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现在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被中国左派们寄予厚望，哪怕在议会中多占了几个席位，也会让他们着实兴奋一阵子。前几年我们听报告，报告人属于中国新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是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与追求，不管它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所遇到的各种挫折、困难、甚至是暂时的失利，但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还兴奋地告诉大家，有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又重新上台执政了，害得整个会场一片肃静，听众屏住呼吸，就跟电影《列宁在 1918》中布尔什维克和工人兄弟们在广场上等着听瓦西里同志说列宁的病情一样，等着听他的下文，若能出来一句份量类似"列宁同志已经不咳嗽了"的话来，弄不好会场就成了沸腾的海洋。

结果很让人失望，卖了半天关子他只说了个"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例子。摩尔多瓦只是独联体欧洲三国中领土仅为 3.38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 430 多万的弹丸小国。比北京的海淀区可能还小一点。据他介绍说，进入 21 世纪后，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两次议会选举（2001 年和 2005 年）中获胜从而连续成为执政党，成为苏联解体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重新执政的国家。后面他怎么说的我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样子很兴奋，慷慨激昂加手舞足蹈，嘴角还泛出些白沫来。摩尔多瓦虽小，但"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后来的演讲中频繁出现"历史潮流"、"发展趋势"、"必然规律"这些主题词，又让人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所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好像社会主义又要席卷世界一样。

其实中国左派们忘记了一条，这些西方国家的左派政党或共产党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对于列宁和斯大林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并不想建立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西方左派和中国左派的重要区别之一。至于对毛共，那些打游击的共产党还推崇，而走议会道路的，像躲避瘟疫一样和毛共划清界限。我在国外就看过某国共产党的竞选拉票传单，其中大量篇幅是解释本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区别，意思是请选民放心，本党上台绝不会搞老毛那一套。

当今世界，任何共产党或左派政党上台，不管欧洲亚洲非洲美洲，都不再可能建立起一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X 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甚至包括前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也包括中国。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话说，如果发生了二杆子复辟，我料定它们是短命的。任何共产党或左派政党上台，能做的无非是计划经济的成分多一点，福利多一点，隔三岔五的再对美国叫叫板，仅此而已。以后世界上，恐怕再也不会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二

杆子国家了，所以我特别不愿意看到北朝鲜政权发生改变，毕竟是仅存的一个二杆子物种了。

前边已经说过，本系列里所说的"二杆子"来源于林副主席和人民日报社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要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要靠这两杆子"。这里所说的枪杆子，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警察军队，应该怎么定义我也拿不准，我觉得还是林副主席那话说的到位，就是"镇压之权"。林彪是湖北人，他的原话好像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九头鸟"zheng""zhen"不分，估计还包括"ying""yin"、"shi""si"，说起这些词来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发音，才会讲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样的句子。这在俺们这疙瘩，肯定会被人讥笑为大舌头的。

至于这笔杆子，也不能就等同现在的新闻媒体和娱乐宣传机构，在二杆子国度里，笔杆子的功能是刻刀，把"人脑当成红玛瑙"，根据需要，"党爱怎雕便怎雕"。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后二杆子时代"，简单说就是：有二杆子，不惟二杆子，重在经济建设（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文革有句话：有成份论，不惟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连这次贵州瓮县暴乱，政府既没有出动军队镇压，也没有一味抹黑"暴徒"，编出什么反革命暴乱故事，追查背后黑手，只是弄些俯卧撑之类的来娱乐网民，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社会进步。

严格说，甚至主张铁血政策的希特勒独裁政权、国家社会主义也算不得是真正的二杆子。即使在二战期间的纳粹德国的高压统治，也不过是战时体制，跟我这里说的二杆子不完全是一回事。从描写二战的片子可以看得出来，像《辛德勒名单》、《钢琴师》都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那种背叛党国的普鲁士军人或商人确实存在不说，而且在纳粹军队内部也存在着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还实施了暗杀计划，差点把希特勒炸飞，只是因为炸弹的威力不够希特勒才捡了一条命。而且暗杀希特勒的组织还不止一家，到后来盟军的重要任务就是阻止暗杀希特勒。这在真正的二杆子国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林立果所谓的暗杀 B-52 根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一般，无任何可操作性。连林副自己出去活动都要受控制，周总理还要过问："是天上动动还是地上动动？"他林立果这么个毛头崽子还能接近毛主席？汪东兴和 8341 部队可是吃素的？

还有一件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写进中学教科书的季米特洛夫的法庭演讲。根据官方材料记载，1933 年 2 月 27 日，希特勒党徒焚烧了当时的德国国会大厦后稼祸于共产党人，随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抓几个反党分子还需要绕这么大的弯子，按大陆对台工作委员会发言人的说法，"怎么承认自己是罪犯就这么难？"从他们的文件中找几句反党言论不就可以结案了吗。接下来的事情更叫人不可思议，纳粹政府居然还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在德国莱比锡法庭对季米特洛夫进行了所谓的审判。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不像是接受审判，倒像是做政治报告，首先分析德国的政治局势，讲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接着季米特洛夫和李玉和、柯湘一样，把法庭当战场，拨迷雾、迎曙光，斥豺狼，让革命真理传四方，毫不留情地揭露德国法西斯的阴谋，并且愤怒痛斥了工人阶级中的堕落分子。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自己充当律师，为自己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最后向法庭提议作出宣告无罪的决定。

季米特洛夫的所作所为，按我们现在处理拆迁钉子户的说法，基本上属于大闹法庭。有趣的是，鉴于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成功演讲和全世界各国的压力，纳粹德国法庭只好宣布无罪释放老季。几十年来季米特洛夫的演讲稿还四处流传，写进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鼓舞了无数海内外老中青年。这样的国家也能称为二杆子国家？配么？他们懂得"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么？上面的我说的内容都在革命传统教育的宣传材料里，大家看看有没有半点夸张。诸位可能会说那是希特勒刚上台，可我们镇压反革命不也是刚上台么？斯大林刚上台又干了些什么？

有可比性的是，在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时候，莫斯科大审判也是公开进行的。而且还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不但貌似公正，还极富人情味。西方人看到了只有二杆子国家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被告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字字血声声泪，把自己描述成十恶不赦的魔鬼，激起法庭内外仇恨满腔，并且被告们一致向法庭强烈要求枪毙自己，告诫法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敌人虽已投降最好还是让他灭亡。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最诚挚的语言衷心赞美斯大林同志，表示若有来生的话，还要跟着斯大林干革命。

最后让西方世界看出破绽的是被告戈尔茨曼在控诉自己的罪恶时供认，他于 1932 年 11 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密谋推翻红色政权。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 1917 年就被拆除。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这在斯大林实在算不了什么，以后换个皮夹克头子就是了。

像季米特洛夫德国莱比锡大闹法庭的那种好事，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戈尔茨曼们能指望么？在毛时代的中国更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刘少奇恐怕连法庭在哪儿都不知道，能把骨灰保留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杂谈二杆子(11):杆子王是怎样炼成的?(上)

金唢呐

我在前面说过，实现用二杆子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首先必须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则还要用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起一个政党，这样才能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二杆子国家。当然，从理论上讲，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并以其他的"主义"、"学说"为指导思想，实现二杆子统治，理论上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从来还没有先例，连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最多也只能是个准二杆子。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把支部建在连队、车间、班组、生产队上，而且其目的就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二杆子的另一种表述）。

其实，就算实现了前边两条，也不一定就能建成一个二杆子政权。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杆子王就是决定的因素。所谓杆子王，即是大权独揽、可以为所欲为的世俗领袖，同时还必须是供人崇拜敬仰的精神领袖。世上独裁者不少，而杆子王，就跟传说中的藏獒一样，是"十犬一獒"，不是所有的"藏獒"都能称之为獒的。据说要把十

只藏獒的后代放在地窖里不给吃喝，让它们在一起撕咬，最后存活下来的才是“獒”。真正的杆子王也是这样，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就一定是杆子王。这需要有天赋，有兴趣，有环境，还需要后天的锻炼。朱德资格再老、周恩来再能干也成不了杆子王，最多就是个重臣名相。

独裁者不一定是杆子王。这些独裁者不过控制了政府部门，或少数知识分子。封建社会政治最黑暗的明末，东林党阉党不过是在朝廷内部如内阁、吏部、都察院及科（六科）、道（十三道）各部门争来斗去，跟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没任何关系。而这种利用二杆子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不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人们总认为封建社会的皇帝权力至高无上，可以为所欲为，动辄就焚书坑儒、剥皮灌草，凭着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就可以乱抓乱杀一气，其实这只是个别例子。大部分情况下皇帝都是瞻前顾后，生怕落下个“杀士”的恶名。

《退斋笔记》说了这样一桩史事。宋神宗对西夏用兵失利，恼怒之下准备杀一个误事的转运使。这时候宰相蔡确提醒他“祖宗以来从未有杀士人事”，神宗沉吟良久，说：“那就刺面，发配远恶州军！”但执政章惇认为：那还不如把他杀了。神宗问何故，章说：“士可杀，不可辱。”因为脸颊刺字是对犯人永久性的侮辱，对其精神与心理都是一种巨创与摧残，梁山好汉很多都是因为脸上刺字而逼上梁山造反的。神宗悻悻道：“快意事一件也做不得”。

九五之尊的皇帝要杀一个延误军机、罪证确凿的转运使竟然成了“快意事”，而且这么简单的“快意事”竟然自“祖宗以来”“一件也做不得”！

环顾全球，真正称得上杆子王的，只有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至于孰优孰劣，我想在后面稍加比较。不过，我不大同意老芦的“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杆子王的说法。我觉得那是乡土观念作怪，“杆子是自己的好，民主是别人的亲”。“中国几千年”我没什么意见，若说世界几百年，前辈斯大林就摆在那儿。不说治国，就是说玩二杆子，人家不但用二杆子控制着苏联的几十个民族几十朵花，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践行了二杆子理论，控制着包括当时中国在内的那么多的卫星国，除了铁托这个例外（当时南斯拉夫是受西方支持），把这个社会主义阵营治理得服服帖帖，经营得井井有条。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个“斯大林模式”还维持了近五十年。毛泽东连个越南、阿尔巴尼亚都搞不定，根本不能与斯大林比，只不过是玩出了花样，玩出了些民族特点而已。当然，从二杆子的美学价值上讲，老芦的说法也不错。

依愚所见，独裁者要成为杆子王，还必须要具备下列条件：

1、有杆子王的魄力。这就是下定决心，不怕别人牺牲，排除万难，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杆子王都是有超常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同时还要视人命如草芥。像发生在苏联、中国和朝鲜的大饥荒，一下子就死掉 5-10%的人口，基本上都是统治者人为造成的，在杆子王眼里根本不是个事儿。毛主席的名言“核战争死掉一半人，剩下的照样搞建设”，就是典型的杆子王的魄力。杆子王的最大本事，也是与历史上其他暴君的区别，

还不是死人多少的问题。而是尽管大量死人，但国家仍然稳定，国民仍然感到幸福，还会众口一词地唱"千好万好不如二杆子好，爹亲娘亲不如杆子王亲"。

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把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的其他 5 位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但后被斧批）。而且大清洗几乎整个消灭了苏联红军的军官阶层，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 4 万余人被清洗，其中 1.5 万人被枪决。大清洗枪决了 5 名元帅中的 3 人、4 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人、12 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 名军长中的 60 人、199 名师长中的 136 人、397 名旅长中的 221 人。

所以在别人看来，斯大林自毁长城，苏联军队完了。希特勒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发动侵苏战争时曾宣称："我只要在苏联这个破房子的门上踹一脚，它就会垮掉。"他相信，经历过大清洗的苏联早已人心涣散，被大清洗大伤元气的苏军不堪一击，斯大林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

希特勒的判断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二战中，在不存在伪政权情形下，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惟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惟有苏联。一个行政上高度统一的主权国家发生这样的事，史上罕见。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希特勒的判断则完全是错的。他低估了社会主义的杆子王，也根本不明白社会主义的二杆子威力。即使在众多将领被清洗，诸多人民叛变的情况下，杆子王仍然能够用二杆子把其余的暂时还没有砍掉脑袋、非德军占领区国民调动起来，让他们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前进！

60 年代初中国大饥荒的时候，几千万人饿死，传说老蒋要趁机反攻大陆，和中共开战。幸亏老蒋没这么干，否则的话，那些饿得全身浮肿的、饿得东倒西歪的、营养不良得肝炎的，甚至包括镇反肃反的家属、北大荒劳改的右派、拔白旗拔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都会像那些高喊着："为了斯大林，前进！"的老毛子们一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老蒋赶回台湾岛。

据说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定律，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激烈"。这句话已经被老芦经过验算而证伪了，因为条件限制，存在着被压迫者"不能"、"不敢"反抗的问题。我想若改成"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想反抗"，则大致不错。可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把这定律彻底推翻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看到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谁都的承认，毛主席威信最高的时候，就是人民最倒霉的文革时代。

杂谈二杆子(12):杆子王是怎样炼成的?(中)

金唢呐

2、有杆子王的脸皮。敢于和善于吹牛撒谎。

所谓"杆子王的脸皮"，毛主席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就是"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这里的"功劳"，甚至包括随着社会发展所出现的一些必然变化，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年代的变化，最典型的就是新社会的"人均寿命延长"。而"别人"，视不同时期和事件可以分别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内外阶级敌人、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实在没有对象，那就是老天爷。在这个问题上，"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我认为金家父子功力最扎实。

就拿所谓"打击侵略者"来说。
斯大林对于二战确实起了关键的作用，"苏联红军打败了纳粹"基本上是事实，无非是有些夸张、宣传有些过头而已。毕竟二战中美国对苏联的物质支持，西线战场的开辟也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毛主席《论持久战》理论的指引下，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等着摘桃子"、"国民党假抗战真反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尽管数量有限，毕竟八路军确实还打过些鬼子，在敌后和开辟大片根据地，不打仗是不大可能的。
至于金日成领导人民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则完全是瞎编。抗日战争期间金日成根本就不在朝鲜，韩战则完全是苏联的武器、中国的军队拿下来的，跟老金没任何关系。人家就是敢这么胡说八道，甚至还编出了金日成用步枪打落美国飞机的神话，写进小学的教科书。

3、有玩二杆子的兴趣。玩二杆子要玩到痴迷的程度。
这就和聂卫平下棋、张大千画画一样，给钱干，不给钱在家里照样干。很多情况下，人们根本分析不出来杆子王为什么要常人不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对杆子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比如为什么斯大林要搞那么大规模的大清洗，砍掉无数忠诚的左膀右臂；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么做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是什么，恐怕是一个永恒的、永远没有结论的研究课题。至于为什么老毛在胆小谨慎的周恩来的弥留之际还要"批林批孔批周公"，把人家吓得尿裤子，这林、孔、周之间除了都是黄种人以外到底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谁也不可能说清楚，不深入研究杆子王的心理，仅做利害分析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有的完全是杆子王走火入魔的结果。

4、有玩二杆子的资本。杆子王没一个窝囊蛋，都建立了自己的"丰功伟绩"。
像斯大林把一个"使用木犁的俄罗斯"，变成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二战中对消灭纳粹法西斯的贡献；毛泽东打败蒋介石，解放初消灭黄赌毒、贪污腐败，在朝鲜战场和美国的较量；金日成尽管上台是靠谎言，可收复南方却是实实在在靠人家自己打的，如果没有联合国的武装干预，南韩早已收入囊中。

我实在不明白克林顿、小布什这些青皮们有什么可叫人崇拜的。这些民主国家的领袖，除了讨好选民，会吹吹萨克斯管，实在是没什么其他本事。要说他们比江泽民、胡锦涛们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倒也还有些道理，可跟这些人物和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的能力比较起来，恐怕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道理很简单，他们治国靠的是

集体智慧和制度的保证，而杆子王们完全是靠个人的能力。我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朝韩领导人第一次见面的纪录片，金正日谈笑风生，收放自如，幽默大方，而金大中呆若木鸡，完全是被金正日牵着鼻子走。韩国媒体当时批评说，和金正日比较起来，金大中就像一个老年痴呆患者。

所有的杆子王，几乎都是著作等身，斯大林全集是十几卷；毛选是五卷、毛泽东文集又干了八卷；金日成全集 41 卷；金正日全集 75 卷；而且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教育、卫生、文艺、科学、自然，毛泽东还加上诗词书法，金正日更了得，《血海》、《阿里郎》都是自己亲自搞出来的。1980 年 11 月 20 日在审判江青时，《红灯记》的原编导阿甲出庭作证，他怒斥江青说："江青，你看看我是谁? 我是没被你整死的阿甲! 你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迫害文艺界人士，我本身就是见证。你......你算个什么东西! "阿甲手指江青质问道："《红灯记》是你搞的吗？呸，无耻之尤！"阿甲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但江青并非白痴，并非外行，她毕竟还是上过舞台、拍过电影、演过京剧的演员，还算是懂行的。人家确实提了不少建议，而且是人家抓出来的。而《血海》，据说完全就是金正日编剧导演的，连这声"呸"都没处说去。

5、有玩二杆子的土壤。这就是环境封闭，国民民智未开。按老芦惯用的语言，就是有一国白痴做后盾。没有大量的阿 Q 小 D 祥林嫂那样的国民，就没有二杆子。这就是二杆子社会主义只会发生在东方落后国家，而绝不会发生在西方。即使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了东欧国家，也从未发生过苏联和中国那样的政治运动，倒是民主运动时有发生，所以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准二杆子国家。顺便说一下，俄国虽然从地理位置上说是属于西方，但极其野蛮落后，不信诸位就看一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俄国农村。和中国不同是俄国的军事实力不弱，而且俄国的贵族阶层和文化精英水平不低，和清末那帮王爷完全是两回事。

还有就是所有的二杆子国家都必须是封闭状态。毛泽东有句名言：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凡是那些因为主观不愿或客观不能实行封闭的国家，不能实现洗脑，绝不能搞成二杆子国家。在我们学校，"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研讨会开了无数次，搞政治思想工作的家伙们经常说的一句抱怨话就是，现在政治思想工作没法干，千言万语，一个美国大片就全毁完了。

杂谈二杆子(13):杆子王是怎样炼成的?(下)

金唢呐

6、有杆子王的感觉。杆子王们冥冥之中认为自己是民族的救星，人民的父亲。必须把自己凌驾于党、国家和人民之上。
我认为这种感觉非常重要，没有这种感觉，便是少了杆子王的霸气。朱德、周恩来再能干也成不了杆子王。这里面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希特勒。要说成为杆子王的资本，没有人能超过希特勒。

希特勒确确实实对人类社会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谁也不能否认，希特勒也确确实实是个"世界几百年，德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治国天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经济瘫痪情况下，这个我们看上去神经兮兮的家伙，仅仅用了 6 年的时间，就挣脱了《凡尔塞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对德国的束缚，使德国的军事、经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军事强国。

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意志第二帝国宣布战败，德意志第二帝国土崩瓦解，战败的德国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陆军被限制在 10 万人内，海军不过 1.5 万，而且丧失 1/8 的国土与全部海外殖民地，包括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也拱手让给了日本。被英法列强修理也就算了，一些德国看不上眼的"劣等民族"也趁火打劫。像我前边说过的半封建国家波兰仗着有英法美撑腰，迫使德国向波兰割让一大块被称为"波兰走廊"的领土，为此德国的领土被一分为二，东普鲁士省和本土间被波兰走廊隔开。位于走廊出海口的但泽市（现名格但斯克）定为自由市，行政事务由国际联盟管理，关税由波兰控制，德国人挣点血汗钱都被波兰贵族拿走了。波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后来遭到了德国的报复，它二战中的处境远比其他被德国征服的国家如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要惨得多。在战争期间光是针对波兰的纪录片就有好几部，初期制作的长纪录片中较为著名的有赫尔曼•戈林的《战火的洗礼》（Baptism of Fire，1940），还有弗利兹•希普拉的《进攻波兰》（Campaign in Poland，1940），这些影片把德军的破坏行为描写成"天诛的神剑"，表达出了"报应的时刻即将逼近罪孽深重的国民"这样的信息。通过电影德国告诉波兰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一战和二战的战争赔款不同，相对而言战争赔款的数目大的惊人，远远超出了战败国的支付能力，跟杨白劳靠卖豆腐挣钱还高利贷的难度差不多，所以德国经济很快就陷于破产的境地。而战胜国政府却死活不肯减免债务，也不肯变通，像在中国一样搞点"协和医院"、"莱茵大学"、"凡尔赛赔款留学生"，把德国人逼得跟杨白劳似的直要喝卤水。德国人只好靠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这种割肉补疮的自杀性政策来苦苦应付，马克在几个月内就变成了废纸，失业率节节攀升，上百万失业大军在街上游荡。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 600 万，几乎一半人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骚乱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而希特勒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经济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从 1933 到 1935，仅仅 3 年的时间，希特勒就把德国一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 100%，而德国国民的失业率降到零。除了蹲监狱的那些犹太人和反对派以外，人人都有工作。更加惊人的是，希特勒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让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厂长买得起的东西，工人同样买得起。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1935 年 1 月 13 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 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 1936 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和中国不同的是，德国完全靠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至今还被国人津津乐道的中

国 50 年代初的"黄金发展时期"，基本上是靠苏联老大哥财力、物力和智力完成的，"自力更生"完全是谎言。五年计划是按照人家提供的蓝本制定的不说，成点规模的企业（如长春一汽）、电站（如三门峡）、桥梁（武汉长江大桥）都是人家留下的，根据苏联公开的资料，甚至连原子弹都是人家给打下的基础，实物模型还在展览。除了一堆专炼牛屎铁的小高炉以外，我们自己恐怕也就是干了个大庆油田，这还是美孚公司几十年前就发现的东西。最近这改革开放 30 年的经济腾飞就更清楚，是全国上下使出浑身解数，让中国像真空泵、吸尘器一样，把全世界的外资统统吸到了中国。

再从"武略"上来看，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恐怕今后也不会有这样一位元首，在短时间内获得如此之多的成功：22 天征服波兰，4 小时征服丹麦，23 天征服挪威，5 天征服荷兰，18 天征服比利时，39 天征服法国，12 天征服南斯拉夫，21 天征服希腊，11 天征服克里特岛，不足 2 年便横扫欧洲如卷席。即使是拿破仑、俾斯麦、彼得大帝也较之相形见绌。

但不管希特勒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他也成不了杆子王。希特勒看起来很狂妄，那只是对外族，实际上在德意志民族面前他很谦卑，而且他本人对日耳曼民族的挚爱和崇拜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心中时刻想着德意志，唯独没有他自己。希特勒从来没有那种"民族的救星，人民的父亲"的感觉，他最狂妄的一句话不过是"我的母亲为德国人民生下了一位伟大的儿子"，只是把自己当做"共和国长子"，家庭衰落了，我这个长子应该把振兴家族的任务和责任承担起来，但希特勒永远也不会像老子收拾儿子那样对待德意志人民。

7、还需要有杆子王的天赋和经验。

杆子王还要有天赋和后天的磨练。就像猎人训练老鹰（术语为"熬鹰"）一样，得熬出来才行，否则老鹰不会为猎人逮兔子。同样是"武装夺取政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胡志明、铁托甚至卡斯特罗都称不上杆子王，有的是兴趣不够，有的是客观条件不具备，还有的是能力不行。像华国锋再怎么"熬"，也熬不成杆子王。

杆子王们对形势的判断都很准确，而且对于人性的弱点看得非常透彻。对于杆子王认识的最大误区就是认为只要豁得出去，谁都能做杆子王。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小伙子魄力可嘉，但水平实在是不敢恭维。在政权还没有巩固，正是需要搞统一战线，大张旗鼓宣传建立"人民民主柬埔寨"的时候，这小子却只因读了几本斯大林、毛主席的书，就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大开杀戒，搞文革"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那一套，凡是戴眼镜的就要收拾，结果所以到头来乱了自己，成了二杆子界的笑柄。像这种生瓜蛋子在二杆子界并不少见，中国的王明、张国焘都差不多，这些人以为只要有魄力、下得去手就行，殊不知这里面的学问博大精深，光是"有理有利有节"、"分清敌我友"、"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谁唱黑脸谁唱红脸"就值得修炼终生。

这其实与做小姐差不多。人们总认为只要豁出去、拉下脸皮，像林副统帅谈论打仗时说的"进暗房铃一响，老娘下定决心，今天就躺在丝床上了"（林副的原话是"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只要客人来了，宽衣解带，就

可顾客盈门。时间长了，名字传出去就可以成为青楼名妓。其实不然，同样是"豁出去"，小凤仙就可以傍上将军蔡锷，"将军拔剑南山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留名青史；可那些街头流莺，却遭人唾骂，连个街头混混都敢欺负。这里面除了与身段、长相有关外，知识、修养、谈吐，甚至跟艺术造诣、床上功夫都有关系啊。

杂谈二杆子(14):乱世盼强权(上)

金唢呐

前边我说过，杆子王们之所以能称王称霸，导演出一幕幕悲喜剧来，除了个人的因素外，还需要有脚下的一片沃土，这就是有大量民智未开的国民。后来又想了一下，觉得还与国民的民族性有关，一般来说，前苏联、前中国和今朝鲜这些二杆子国家，都有"服从"的天性：俄国是个半农奴社会，朝鲜则一直是殖民地，中国不管是孔孟之道也好，封建礼教也好，核心都是"服从"：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不得越轨半步。似乎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国家，才能真正成为二杆子国家，否则怎么折腾味道也不会很纯正。

比如说，像南美、非洲的一些国家，虽然有足够数量的愚民，但他们的民族性格狂放不羁、个性张扬、激情浪漫，即使碰上个"世界几百年、X 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杆子王，也很难像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那样用二杆子把人民控制的服服帖帖。东欧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都没有达到二杆子的水准。最多不过就是东德那种"线民政治"："老大哥在看着你"、"老大妈在看着你"、"老婆（公）在看着你"。古巴虽然我没有去过，但古巴人民享有的自由肯定要远远多于毛时代的中国。起码人民还有一部分文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这次奥运会男子 110 米跨栏，那个大出风头的古巴小子"萝卜丝（罗伯斯勒）"，脖子上挂着金光灿灿的项链，比我们家属院那些拴狗的链子还粗，链子的一头还坠着十字架。而且"萝卜丝"拿到金牌后还对中国体育记者说，我想把这块金牌献给卡斯特罗，但更想献给我的母亲。并且说了一大堆"爹亲娘亲更比卡斯特罗亲"的道理，这在毛中国根本就不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纳粹德国虽然是独裁专制国家，希特勒实行的也是高压统治，但与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所经营二杆子社会主义对人民的控制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这与德国人讲"服从"而不那么愚昧有关。从德国历史看，本来德国在欧州没有什么地位，靠着俾斯麦的铁血手段统一成了一个大国，造成德国民众对专制手段的顺从。德国虽然也有过类似文艺复兴运动的"狂飙突进运动"，但国民对普世价值或者绝对正义之类并没有形成集体性信仰。另外，在德国也缺乏自然法学派的基础，而流行实证主义法学，德国近代化的开端，也是靠政府强力推进，特别强调专制力量的作用。但毕竟德国国民素质高，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有的是，诺贝尔奖年年得，而且是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真要是用二杆子控制起来一定会很吃力。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也像我们的毛主席一样，动辄向德国大学发表最高指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均摘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这种搞笑言论，恐怕非把德意志帝国的大学教授

们乐翻天不可，各种抑郁症患者集体痊愈出院，"一个小丑进城，胜过一打医生"。

前面我写出了《社会主义与二杆子(10):纳粹德国是二杆子国家吗(上)》，原来还想写(中)、(下)，中篇我刚写了个开头，想说一下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二杆子的区别一是纳粹德国控制的不彻底性，二是控制对象的外向性，三是控制过程的人民自发性。没想到老芦在跟帖中"稳准狠"地说出了这三条：

"纳粹和共党国家都是人为设计的新兴国家，在历史上无先例可循。不可否认，纳粹抄袭了列宁的许多设计，包括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宣传部，等等，但纳粹的极权程度远逊于共产制度。他们没有垄断一切生产资源，不实行公有制，以政府领导经济而不从事经济，没有军委，也没有组织部，以元首指挥军队但不以党领军，对人民的组织与压榨远不如斯大林，所以其劳改经济的主要劳力只能是外国人而非本国人民（除了犹太人)。纳粹运动的人民性质更比共产运动的彻底，从纳粹党的档案中发现，党在基层中的组织很小，一个城市也就寥寥几人，秘密警察也是这样，人民的忠诚主要是靠自发表现，由积极分子监视邻居，但这是自发的，并非组织布置。换言之，纳粹得到人民的拥护更多出于人民的自豪感与天然的纪律性，而共党国家必须依靠欺骗与恐怖。"

老芦说我是他的前世兄弟看来还真有一定道理，只是无论学识、才气、洞察力还是分析认识问题的深刻程度，我都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只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偶有巧合而已。既然我想说的老芦已经说了，我只好将"《社会主义与二杆子(10):纳粹德国是二杆子国家吗(上)》"中的"(上)"悄悄抹去，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是属于别人打落水的，再接着说这个题目就有"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之嫌。而且我啰嗦半天还未必能像老芦说得这般清楚，只好另想了个"杆子王"的题目先发挥一通，好在也有感觉，好歹对付了大几千字。

现在慢慢也体会到当年穷棒子造反的心情了，盼只盼他芦老人家早日患上老年性痴呆（玩笑开过头了，抱歉!)，否则我等永无出头之日。其实我看那些和老芦打架的，有是因为老芦的原因，他老人家脾气不好，说话太重，出口伤了人家；还有些是因为观点不同，彼此差距太大。但那些干骂大街的，都是一帮智力穷棒子、知识穷棒子，什么东西也写不出来，只想着打智豪分脑髓，打文豪分知识。上次老河问老芦他什么地方惹那帮人了，老芦回答说是观点不同，我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老河感兴趣的，多是些宗教、文化、思维方面的话题，涉及现实政治的很少，即使有，也比较温和，断不至于招人如此忌恨。实际上就是贫下中智们看着老河有事没事在芦区转悠，无名怒火心头起，对我也是一样，每次我一打开站内信箱，里面就有骂街的玩意儿，祖宗三代都叫人给数落了个够不说，还威胁说要像同盟会元老张继痛打保皇党一样痛殴我一顿，也不知在这种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发出这种威胁有什么意义。其实智力穷棒子翻身也很简单，多读几本书就是了。

不过，尽管老芦稳准狠地说出了三条，我还是想把纳粹德国的独裁特点说一说，和社会主义二杆子做个比较。苏联和中国都是把旧政权彻底砸烂，然后把国家封闭起来，以二杆子为手段，按照杆子王的设计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而希特勒虽然也搞过"啤酒馆政变"，那不过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根本算不得什么暴力革命。

希特勒的最终上台，靠的还是合法的竞选。依我看，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宪法的漏洞走向了独裁，也正是由于宪法对希特勒还有些约束，所以他不太可能成为为所欲为的杆子王。而且在第三帝国初期阶段，希特勒主要还是抓经济搞外交，没怎么玩二杆子，实行暴政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战后有人这样评价他："元首在 1938 年之前是伟人，1938—1940 年之间是暴君，1940 之后则是个彻底的疯子。"这句话不无道理。

我前边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上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大多是发生了对外战争，战争打得不太顺利的时候共产党发展壮大，并最终夺取政权。"战争引起革命"，紧接着便是"革命制止战争"。由于极权体制能够迅速地把所有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所以的二杆子政权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并得到人民的拥护。"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些过程在法国、德国和俄国都先后出现了，但真正建立起二杆子政权的只有半农奴制的俄国。

近代开"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先河的应该是法国。敌军兵临城下，也有内部造反的，但那多是迎接敌军的，在将来的新政府里分上一杯羹，并不是想自己另起炉灶建立新政府。也有的是起哄跟着沾点便宜，趁机偷税漏税，属于"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但法国大革命却玩出了新花样。

我的感觉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帮浪漫文人在咖啡馆里边喝边聊（按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文学化政治思维"），聊出了灵感就找面包师、裁缝、收银员去造反，砍下脑袋挂在路灯上示众，然后面包师回去接着和面发酵，裁缝接着量体裁衣。对现有政权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砸烂，"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外国军队兵临城下，不负责任的革命家们不去帮助政府抵抗外敌，而是先后干净利落地推翻自己的反动政府，消灭反动军队，组织毫无战场经验的面包师、裁缝、收银员去跟侵略者拼命，制造出无数烈士，留下无数艺术作品，让无数中国人鞠躬落泪，可就是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政权出来。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现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出现，像俄国的十月革命，德国的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后使各国经济濒于崩溃，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革命形势日趋成熟，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革命、造反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们普遍认识到，外敌入侵时不必一致对外，而是大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设法推翻本国政府。只是俄国由于有了列宁这样的天才革命工艺师，情况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再也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闹剧，而是通过"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最后建立起地道的二杆子政权。

杂谈二杆子(15):乱世盼强权(中)

金唢呐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俄国和德国人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德国人放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入境实现"革命制止战争"。列宁回国后不负众望，马上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

国内战争”的口号，号召俄国人民掉转枪口，干掉本国反动政府和反动军队。于是“战争引起革命”，1917 年爆发了二月革命，俄国沙皇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宣布退位，虽属被逼无奈，但也是主动让位，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以及流血事件的发生，俄罗斯帝国和平过渡到议会民主国家，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资产阶级政府的气魄有限，不能“审时度势”结束战争，还是不能给人民带来面包与和平，于是战争再次引起革命，爆发“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掌权，社会主义二杆子政权终于诞生。1918 年 3 月列宁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魄力，以俄罗斯损失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质量最好土地的代价，和德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实现了“革命制止战争”。

当时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态度是，布哈林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接受德国掠夺性和约条件和约，主张“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进行对德战争。若如此，法国式的闹剧恐将重新上演，当然也可能由于广阔的俄罗斯原野加上寒冷的冬天最后把德国人拖垮；而托洛斯基则主张“不战不和”：苏俄应宣布停战、复员军队，但不签订兼并性和约，实行不战不和。后来托洛斯基罪名之一就是没有读列宁的书，听列宁的话，按照列宁的指示签和约，结果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重大损失。托洛斯基在德国 1 月 28 日向苏俄提出立即接受和约条件的最后通牒时，当场声明苏俄宣布停止战争、复员军队，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随后退出谈判。这完全用得上当年座山雕劝老九的一句话“老九，快把袖标带上，怎么耍起小孩子脾气来了。”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列宁决定公开为缔结和约而斗争，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拒绝和约就是把苏共、把苏维埃政权推上冒险和生存受到威胁的道路上。尽管以后德方又提出新的、更苛刻的要求，并限定 48 小时内接受，仍然没有吓倒列宁。为此，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托洛斯基继续反对签订和约，并声称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列宁在会议中先后作了 8 次发言，力排众议。他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那么 3 个星期之后你们就得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在列宁坚定不移的态度下，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他的建议。1918 年 3 月 5 日，苏俄接受了德国的要求，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革命制止战争”最终得以实现，红色二杆子政权也在俄国站住了脚。

列宁的做法揭示了一个真理，经过多年战乱之后，人心思安，人们普遍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不管是什么人（阿猫还是阿狗）、什么党派，信奉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只要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定局面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列宁是个例子，往近处说，塔利班当年上台也是个例子；往远处说，清兵入关也是个例子；都是沾了内战的光。

现在看来，后来布哈林被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审判中戏弄，托洛斯基被斧劈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到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些革命家们的成色就看出区别来了。像布哈林，也就是对付个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真理报》主编、《消息报》主编还能胜任。正像伟大领袖所批评的那样：“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真正的杆子王来（原话是“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像布哈林、托洛斯基这样的“动摇”、“暧昧”之辈只能当经济学家、军事家，而根本不配做杆子王，只配让杆子王收拾，或者像周恩来一样，在杆子王手下当个听差的（林彪对

周恩来的评价，说周像个听差的)。当年上政治课，说巴黎公社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缺少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的指导，现在看来并没说错。好像总结巴黎公社的失败时经常说领导层软弱：公社战士缺少足够武器，巴黎军火库有 28 万枝步枪不敢去拿；公社缺少经费而不敢去动法兰西银行数十亿法郎的资金，所以导致了起义失败。如果有列宁同志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根本就不会成为问题。

接着说纳粹德国的事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消耗战，最后陷入了"流血僵局"，等于是各国把动脉、静脉打开放血，看谁先倒下。德国由于被包围在欧洲腹地、没有殖民地的支援并且两线作战，经济恶化，最先感到战争的窒息。1917 年冬天许多德国城市已靠大量采食野菜过冬，许多市民死于饥饿。为打破这一僵局，以德军统帅部于 1918 年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春季攻势。春季攻势不仅没有达到其军事及政治目的，反而耗尽了德国的最后一点资源和所有的预备部队。11 月 3 日，德国爆发了 11 月革命，"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程序开始启动。所以关于德国一战失败有个"匕首传说"(又称"刀刺在背传说")，称德国陆军在战场上未被战胜，陆军是在停火后被德国革命"从背后暗算"的。但德国最后的结局却与俄国的建立二杆子政权不同，人家是"走向共和"。

德国的情况和中国北洋时期有些类似，在希特勒纳粹独裁出现之前也有个"走向共和"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建立了个魏玛共和国，可以说是德国人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政权的一次努力。但最后的结果却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民主不得人心。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民主政权外不能排除外侮，内不能解决内患，最后人民还是选择了一个高效的独裁政权，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德国人民选择了希特勒是历史的必然。我想，如果中国 80 年代的学生运动持续闹下去，学生动辄广场示威游行，中国想不再出个红太阳都难。不要说别人，就是学生家长们也不干。起码当时我接触的学生家长，都希望有人出来赶快结束这种局面，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教室里老老实实上课去。

从近代史上转型国家的经历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最基本的法治积累，没有遵守契约的习惯，没有个人自由的沉淀，没有谈判妥协的传统，而通过街头政治来实现民主化，"毕其功于一役"，这样的国家一般都会经历一次或者多次政体上民主化的反复，弄不好还会流血动荡。像现在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至今仍然还在"军人政权"和"民主政权"之间反复。中国北洋军阀时代，绝对是中国史上最自由的一个时期，当时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等多项自由指标均名列前茅。但政权更换频繁，军阀之间战争不断，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同胞苦难更加深重。后来国人对南北统一不再抱有希望，不相信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南方，也不相信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北方，提出了"X 人治 X，高度自治"（如"湘人治湘"、"甘人治甘"、"浙人治浙"）等口号，章太炎归纳成"联省自治"，为追求安定和平的生活，竟然置国家分裂（按现在的标准)而不顾。以后"联省自治"不成，人民选择了相对"革命彻底"的蒋介石独裁。但蒋介石始终不能彻底消灭异己，结束混乱，于是人民又选择了"革命更彻底"的毛泽东。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老蒋还是老毛都是一球样。从我党的宣传材料来看，当然是民心向着共产党。但三年内战期间，但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自发起义（尽管在当时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人心背向并不是很明确（这样认识妥否，请拍砖)。其实无论是谁，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生活，老百姓都会发自内心的歌唱"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魏玛共和国还是干了不少事情：先是为德国争取到了大量的投资贷款，以后又说服了西方全部撤除驻军，部份地解除对德国的军事限制，放宽赔偿债务，并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希特勒上台前的 1932 年的洛桑善后财政会议，在魏玛共和国支付了 531 亿金马克以后，国际裁军会议的终止了所有战争赔款，让德国大大减轻了未来的财务支出负担和通货膨胀压力，为希特勒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基础。

但总体来看，德国人民对这个民主政体及其政党并无好感，魏玛共和国的 14 年统治对于德国人来说完全是一场丧权辱国的灾难。在魏玛共和国的宪政体制下，党派林立，国会、内阁更替频繁，工人失业，农民减收，社会秩序一团糟，人民生活水准比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大大下降。开始的几年，魏玛共和国不得不忙于处理左翼和右翼相继发动的叛乱和 1923 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经历了短暂的平稳期后，魏玛共和国脆弱的经济又在 192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濒临破产的边缘，德国人民生活非常艰难，这为德国极端右翼势力的兴起提供了良机。

杂谈二杆子(16):乱世盼强权(下)

金唢呐

据说这"魏玛共和国"还跟美国在一战后开始实行全球"民主输出"战略有关。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不允许德国恢复以前的立宪君主制，想把德意志帝国改造成典型的民主国家，甚至比美国本身还民主。

1918 年，德国战败了，沦落到了被协约国任意摆布的地步。这时，各协约国对怎样处理德国的态度是不同的，美英法各家怀里都揣着一把小算盘。法国由于是德国的近邻，在历史上曾多次被德国入侵，普法战争大败，被德国修理过，因此坚决主张削弱德国；英国虽然对此不反对，但却不愿意看到一个衰落的德国，他们的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平衡；至于美国，他们与德国远隔大西洋，又有英法在欧洲看着德国，所以并没有切身的威胁。但是，美国人意识到，一个拥有 8000 万人口及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仅仅靠土地或军事限制，不可能制止它的复兴，也绝对无法保证日后欧洲的安全，避免战争只有把德国建成一个民主国家。所以，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要把德国改造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结果才造成了魏玛共和国这一个失败的作品。二战以后，美国吸取了教训，根据他国具体国情，并不强制他国实行民主，比如允许韩国独裁的军人政权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日本允许保留天皇，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同时，为了防止战后出现混乱局面而产生独裁专制政权，对输出民主国驻扎军队，不仅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做为超越输出国宪法的一支重要威摄力量，以防止像纳粹、国际共运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现在如果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我想结果不会是什么人民民主新纪元，恐怕是先出现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杀得血流成河，然后是"国家要独裁，人民要奴役，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从德国的情况看，确实是希特勒的独裁政府一上台，德国的问题都统统解决了。在希特勒执政的第一年，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就立竿见影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的做法也和我党在解放初期一样，"该杀的杀，该抓的抓"。区别是希特勒采用不违反《魏玛宪法》的手段取缔了反对党和工会，利用的是《魏玛宪法》中的紧急专政权。事实上，这种权利的民主国家都普遍存在，即允许权利者在紧急状态下实行有限独裁。以后驱逐犹太大亨，和我们没收资本家财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是"大快人心事，取消工会反对党"。旧工会连起码的就业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争取不到，更遑论能在工人中间有什么威信。而希特勒把少数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的结果，是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减少了扯皮，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完全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在希特勒的专制体制下，工人充分就业，经济发展神速，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各种混乱局面结束。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结果说明了当初德国人民选择纳粹党独裁，是为了求稳定、求发展，有他的道理的。

尽管当时德国还有"魏玛宪法"，从纸面上来看，据说这是二十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之一，"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第三帝国的兴亡》)，从字面上看这部宪法使德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完全可以与美国比较，但最终共和国还是搞不下去。人民看到是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混乱。

对照一下中国的情形，中国在民主政治的虽然落后于英美法等老牌民主国家，但好歹也在 1912 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制定了《临时约法》等宪法，老芦曾撰长文说明《临时约法》自身的缺陷，其实就算是有了一部完善的宪法，中国照样会大乱，原因是各方谁都没有想过遵守宪法，各种政治力量无法统合在宪法框架内，最后结果还是靠枪杆子解决问题，由于枪杆子力量分散，所以就是没完没了的政变兵变，而且都说自己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重建共和。若失败，原因都归结为革命不彻底。

就说一件小事，当年袁世凯为使清朝皇帝和平退位，由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优待条例》，最后清朝宣统皇帝宣告自行"逊位"。《优待条例》中说好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变"、"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并"暂居清宫，原有私产由民国保护"等等，规定的非常具体，可操作性也非常强，条例本身也没什么漏洞。可"基督将军"冯玉祥一进北京，别人不敢惹，收拾这群皇帝娘娘太监们可是不手软，胡乱对付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然后北平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就开始倒计时：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在当时，冯玉祥、鹿钟麟之举受到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不说，直到今天，不管是史书还是文艺作品，还把这当成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先进事迹。后来，"流寇将军"孙殿英受此启发，率工兵营掘开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坟墓，得了便宜不说，还卖乖："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别看军棍

武夫们没什么文化，意思却表达的非常完整，关键词一个也没漏下。

碰到这么个局面，这干鸟人，上层都是玉祥、殿英，下层都是阿 Q、小 D，还搞什么民主共和，还是彻底革命，搞独裁专制算了！

当时世界上很多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都对法西斯独裁专制政府的辉煌成就羡慕不已。在中国，人们不再醉心争当"中国华盛顿"。老蒋在希特勒上台前，是以墨索里尼为师。1931 年冬，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他对他的亲信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以后成立了复兴社，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现在日本东京好像还有个"力行会馆"，我的一个学生就住在那里，不知道和"力行哲学"有没有关系）。被人称为"法西斯秘密组织"，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设立了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 15 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拉出一副要独裁的架势来。

后来蒋介石听说了希特勒的先进事迹后，派戴季陶去德国考察，听了戴季陶考察汇报后老蒋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我是一国最高领导人，应当学习希特勒。"后来蒋介石命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后来提出的宣传口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与德国纳粹的口号几乎是同出一辙。

由于蒋介石的提倡，30 年代法西斯主义曾在中国盛行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曾公开推崇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当时无论是什么政治派别，都认为"走德国人或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扶植起来的，而国民党只是受了些苏共的影响，又学了点德意独裁的皮毛。

我看过老蒋下属对老蒋的一段评论，说老蒋性格上有个弱点，就是办什么事情都爱"凑合"，最后导致了失败。我细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从学习上，老蒋也是"以俄、德为师"对德国、俄国的东西都学过，但都不过些学了些皮毛，没有把精髓学过来。对待自己的政治、军事对手也是一样，从共产党、民主党派到党内军内的捣乱分子，老蒋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但只不过是浅尝辄止，满足于"消灭一点，舒服一点"，从来没有一次"痛打落水狗"、"追穷寇"，让对手"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过。国民党到头来还是个大杂烩，从来没有做到过"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真正做到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还是那句话，在战乱年代，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党派，信奉什么思想、什么主义，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只要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定局面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只要能给老百姓带来和平和稳定的生活，老百姓都会发自内心的歌唱"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杂谈二杆子(17):二杆子威力(上)

金唢呐

我认为，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按照列宁的设计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二杆子控制一切资源，尤其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这也是和其他专制制度的区别）。实现这种控制的前提一是政权必须靠枪杆子获得，二是有民智未开、贫困、顺从的国民，三是有称职的杆子王，这杆子王不仅要具备所需要的一切能力，而且还必须是"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四是国家必须处于封闭状态。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老人家是在说"玩二杆子的条件就具备了"。

这种利用二杆子对国家和人民的控制不仅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二杆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二杆子强大的冲击波真是"什么也挡不住的，完全挡不住的。"没有什么摧不毁、拉不垮的铜墙铁壁，也很难看到什么硬汉，一写到这我就想起列宁那句话啦：打他个灵魂出窍。

我经常听到说某某人在文革中怎样保持革命气节，与造反派顽强斗争，在群众运动面前表现出铮铮铁骨。根据我的观察，这些人大都是吹牛，属于鲁迅说的那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文革期间我目睹了无数的批斗会，那些挂黑牌、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见得实在是太多了，从来是对造反派唯唯是诺，哪怕声调高些，一顿板带抽下去立刻就会降下来。甚至包括那些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蹲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军人老党员，无一例外，最后统统服软。

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我终于明白了共产党员也是由"极普通的材料制成的"，在那种群众运动面前，根本看不到什么"铮铮铁骨"。经过文革而能够活下来，都是低三下四、忍辱偷生的结果。就像有人说我们现在活着的汉人都是怕死鬼的后代一样：清朝实行的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有骨气的人早就被人砍头了，那些鼓吹大汉族主义的谁也别充什么硬汉。

我们家属院有位领导干部，文革中定为叛徒、三反分子。他属于老革命，作战负过伤，还曾经让鬼子抓去打过一顿，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疤。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表现还很硬气，每逢造反派要打他的时候，他的经典动作就是扯开衣服露出伤疤，"这一套老子经历的多了，有种就冲这打"。

半年后我在家属院门口碰见他，他正和一帮牛鬼蛇神正在修路，旁边有造反派监督。按照我们那儿造反派定下的规矩，在开工前（包括中间休息后再工作）先要唱一首《黑帮歌》，那歌词是这样的："我是黑帮，我是黑帮。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向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其中的那两句"我有罪！我有罪！"不是唱，而是喊。而且要有动作，就是自己抽自己的嘴巴子，不偏不倚，貌似公允，两个腮帮子一边抽一下。

他们修路的具体活是打夯，一边打夯一边还要喊号子，通常都是毛主席语录：
一不怕苦，嘿呦嘿呦；二不怕死，嘿呦嘿呦；
下定决心，嘿呦嘿呦；不怕牺牲，嘿呦嘿呦；排除万难，嘿呦嘿呦；争取胜利，嘿呦嘿呦。

还有就是自我批判、悔过自新的话：
坦白从宽，嘿呦嘿呦；抗拒从严，嘿呦嘿呦；低头认罪，嘿呦嘿呦；痛改前非，嘿呦嘿呦；老实交代，嘿

吆嘿吆；重新做人，嘿吆嘿吆。

我想，若文革中老邓在江西劳动的时候也要这么喊号子的话，一定会是"永不翻案，嘿吆嘿吆；靠不住啊，嘿吆嘿吆。"

想想看吧，这场景对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应该多么有吸引力啊。所以有机会我就和同伴一起去看，尤其要看他们抽嘴巴子那段，如果同伴中谁没去，一定还要回来给他形容一番，补上这一课："你们可看见过今天的黑帮抽嘴巴子么？"，"咳，好看。黑帮抽嘴巴子。唉，好看好看，……"看了几次以后我和小伙伴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个《黑帮歌》唱的声音最洪亮，嘴巴抽的最清脆，对造反派最低三下四的就是那个"这一套老子经历的多了，有种就冲这打"的老干部。

我看到过一篇陈丹青谈鲁迅和民国文人的文章。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里面有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褚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惊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 1979 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

这时我回头看看鲁迅先生：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陈丹青：我谈大先生——2005 年 6 月 5 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

我不知道陈丹青说的是哪些照片，我找到一张大汉奸褚民谊受审的照片，真是像陈丹青说的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非常不买账"、"我就是这样！"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爱咋地咋地，老子就是谁也不尿！"。我回忆起在文革批斗会上看到的那些面孔，台上挨斗的走资派坐的是喷气式：革命小将把他们双手反剪在背后，还要把头按下去，再抓着头发把脸直面台下。回想起那些面孔来，不光是扭曲变形，而且绝对是"人尽可尿"。台下革命小将则是群情激奋，慷慨激昂，膀胱充盈，"党说尿谁就尿谁，党说咋尿便咋尿"。还有一些出身不好的，随时有可能下次被揪上台的，则是诚惶诚恐，浑身筛糠，随时准备挨尿。把过去那个年代的张张面孔在脑海里过一遍，确实想不起看到过像鲁迅、褚民谊这样的神态。后来在老干部平反、恢复职务的大会上，经常可以看到些激动得痛哭流涕的面孔，但怎么看都是"刚被尿完"。

说起来，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张"谁也不尿"的面孔，就是咱们红司令；现在北朝鲜也只有一张"谁也不尿"的面孔，就是金正日。

文革 30 多年后的今天，虽然也隐约可以看到一些"谁也不尿"面孔，像王朔、陈凯歌、姜文等，但给我的感

觉不是那种文人气质，而是故做"谁也不尿"状，里外透着点北京胡同里那些张口闭口"操你二大爷"胡同串子的痞子气。而刘晓庆的面相，也没有"置之度外"、"斯文通脱"的感觉，只是让人觉得刁女厉害、惹不起，使人想起晓庆母亲的那句名言：晓庆从小就要强，处处争强好胜，吃屎都要吃屎尖。

民国时期"谁也不尿"的文人很多。还有个国学大师章太炎，号称"章疯子"，在当时也是个谁也不尿的主儿。"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引自鲁迅《章太炎先生二三事》。

1913 年冬，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袁世凯的本意是警告这个口没遮拦的文人，别再胡言乱语，给早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再添乱。孰料章太炎根本不买老袁的账，愈逼愈疯。"章疯子"在住所墙壁上狂书"袁贼"，以杖痛击，并美其名曰"鞭尸"。又扒下树皮，也写上"袁贼"字样，然后丢入火堆烧掉，高兴地大呼"袁贼烧死矣"！他在狱中每餐必饮酒，每饮必以花生佐食，吃时去蒂道："杀了'袁皇帝'的头！"面对各种威胁脸不变色心不跳，而袁世凯惮于背负杀害"民国弥衡"的恶名，最终只能忍气吞声，自慰不必与一疯子较真了事，把个工于心计的大总统折腾得疲惫不堪。"九•一八"事变后，章太炎又怒骂蒋介石丧权辱国，称"且令全国养兵近二百万，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矣！"蒋介石闻知也怀了一包气，但想想当初连袁世凯都拿他没治，自己又何必充当黄祖的角色呢？"章疯子"于是又可以继续疯下去。

章太炎还一个绰号是"章神经"，这个称呼来自他下面的一段话：

章太炎自道："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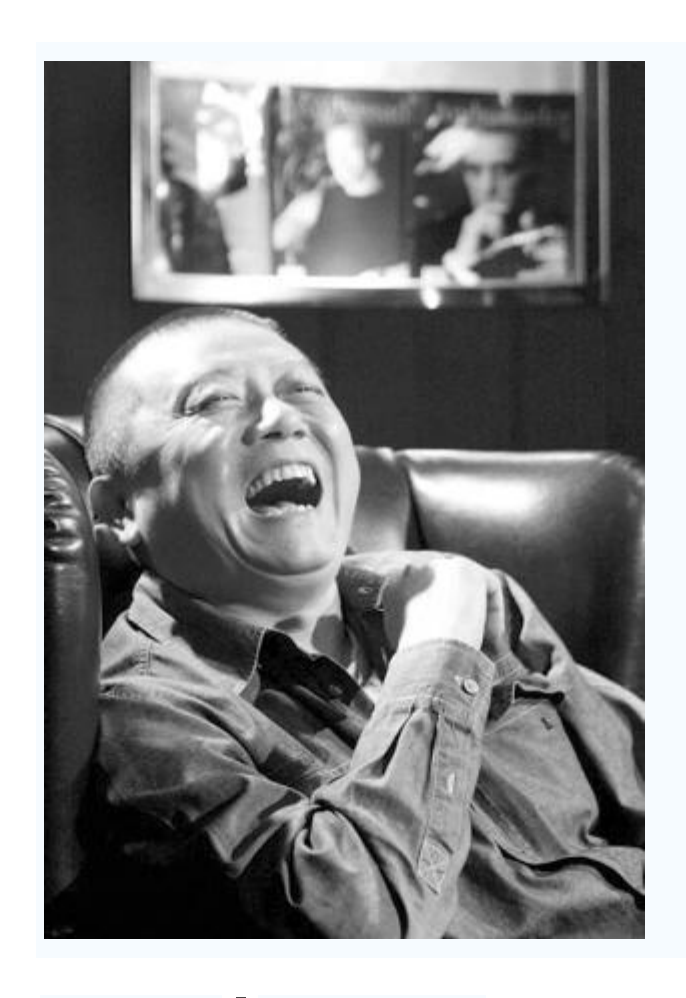
而在我看来，老章不过是碰上了这些怕当黄祖、怕背负杀害"民国弥衡"总统，其实只要二杆子一出现，甚至不用"富贵利禄当面现形"，各种"神经病"都会自愈。在《三十六计》里面，老章这一招叫"假痴不癫"。70 年代后期，盛传小说《红岩》中的疯老头华子良原型人物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入狱（其实重庆地下党在文革前已经被李井泉收拾的差不多了），大家听说后都异口同声地问，这回他在监狱里还装疯吗？

再借他 100 个胆儿，他也不敢！

大汉奸褚民谊受审的照片



王朔谁也不尿



杂谈二杆子(18):二杆子威力(中)

金唢呐

二杆子除了具有穿透力强的特点以外，另一个特点就是渗透范围之广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极权社会。二杆子可以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把世间一切都管起来。二杆子能够也必须掌控一切，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没有人能够躲得过。就连未开化的赫哲族在吆喝"阿朗赫赫尼那"的同时，也不忘说明"赫哲人走上幸福路，人民的江山万万年"；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佤族也要打起鼓、敲起锣，也照样知道"共产党光辉照边疆"、"毛主席号召记心窝"，绝对不会出现封建专制社会那种"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世外桃源。与传统封建社会不同的是二杆子不是控制少数人，而是控制全体国民。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真正做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只有二杆子，才可以荡涤一切角落里的不合领袖心意的"污泥浊水"。

在传统社会，革命最彻底、一个也不放过的当属满清。政权建立后汉人必须剃发垂辫易服，表示归顺大清。据说这样做为了使汉人习满族风俗，以人格侮辱的方式使汉族精神萎缩，丧失自尊、自信，打掉汉人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使全体汉人服从命令听指挥，做到"满人指示我照办，满人挥手我前进"。当时的政策是"留头不留发、

留发不留头”，只要长脑袋的都要被收拾。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做到不让一个人逃脱，还是有死角，允许少部分人保留自己的服装和发式。如“生投死不投”、“俗投僧不投”、“男投女不投”等。“俗投僧不投”是说在家俗人必须接受大清的领导，但出家人归佛祖的管，可以不投降，所以，这给很多明末反清义士留足了面子，他们选择了出家，不必剃发垂辫易服，直到现在出家人所穿的衣服，还是明朝的款式。说到这我提醒一句，现在的那些志在复兴汉族文化和威严的大汉族主义者（按老芦的话说就是土法西斯），如果要证明自己不是满人奴才的后代的话，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找出自己祖先在满清三百年统治期间，代代都是花和尚的证据来，否则怕是难以服人。

“男投女不投”是鞑子重男轻女，认为女子不会造反，只要把男子降服就可以了。即使女子造反破坏力也有限，量你们这些三寸金莲的汉族娘们儿也蹦不了多高，所以新娘子穿戴的凤冠霞披仍是明朝服装，显示男投女不投。再一个就是“生投死不投”，活人必须投降，死人可以自便，所以人死入殓的時候，还可以用明朝的服裝，不用清朝服裝。其实不光是死人，人在临死前上法场的路上就可以喊口号骂街，可着劲撒欢。阿 Q 自不必说，还有个电影《老少爷们儿上法场》说的是清末同治年间曾国藩办的那场“天津教案”的故事，“豪侠”大胡子放火烧了天主教堂，天津知府四处凑够了十八位凶手，最后十八位“壮士”在赴刑场的路上，抱拳作揖，又唱又闹，很多文艺作品都有类似的描述，看来是确有其事。

而在毛时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开始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的，根本没什么“生投死不投”，连康有为这种和当代政治八竿子打不着的死人墓穴都要打开鞭尸。康有为的墓在青岛，“文革”中被抛骨扬场，“革命群众”把康有为的森森颅骨和苍苍白发拴上绳子游街示众（有网友推测老芦是青岛人，敢问可有幸一睹南海先生尊容？），据说革命小将们拖着骨头游街时还鞭挞老康的颅骨，一边还默诵列宁语录：打他个灵魂出窍。游完街，老康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以后这“保皇派祖师爷的狗头”是不是被彻底砸烂就不得而知了。现在我也不明白文革期间的保皇派和清末的康梁有什么共同之处，我能看出的只是国人的概念混乱和想像力丰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概念混乱同时又想像力丰富，我认为在同此凉热的寰球，我们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概念比我们更混乱、想像力更丰富的民族有的是，但只有中华民族兼收并蓄，再加上我们的胆识和魄力，所以各种人间奇迹都只能在中国创造出来。按照刘晓庆的句式就是：概念混乱难，想像力丰富更难，概念混乱、想像力丰富同时又具有胆识和魄力更是难上加难，难于走蜀道上青天！

说起文物破坏来，文革期间大概受破坏最严重的动物雕塑就是那些张牙舞爪的石头狮子了。至今很多名胜古迹入口处的石头狮子，不少还都是缺胳膊短腿。百兽中为什么独独跟狮子过不去，恐怕不光是封建迷信，因为古代留下的任何动物雕塑都有迷信色彩，可文革中驮石碑的乌龟王八，命运就要好得多。我想是不是因为狮子的形象挑战了毛主席那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杆子国家是不允许有任何人挑战领袖的权威的，甚至动物也不行。毛主席本人恐怕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在讲话写文章时提到最多的就是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把纸老虎、死老虎当做真老虎来打”、“老虎刺激吃人，不刺激也要吃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这个人有些虎气”。甚至保健医李志绥在检查出他患有牙龈炎，劝他以后刷牙时，毛还反问：为什么老虎不刷牙？把李大夫问的一时说不出话来。意思是老虎从不刷牙，牙

口比我们刷牙的人类都好，撕咬全不费功夫，我干嘛要去找这个麻烦。所以据李志绥说，毛最后也没养成刷牙的习惯，还是用吃茶叶的方法清洁口腔，倒也没有影响大被同眠。这些事情是不是表明，毛在潜意识里把老虎也当成了自己挑战的对象？受李志绥回忆录的启发，类似的招数我也试过：太太嫌我一天到晚总是闷在屋里，劝我出去走走，晒晒太阳，说是对身体有好处。我马上回她一句：耗子成天躲在洞里，身体不是也很好嘛，也从来不闹风湿、老寒腿什么的。噎得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得意之余又沮丧起来，我虽然思路与老毛相同，可下意识说的却是耗子。

最了解毛主席的莫过于好总理，文革期间周恩来对“革命师生”有这样一段话：“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后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后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这在文革中是众人耳熟能详的总理指示，红卫兵小将疯狂砸狮子绝对与此有关，但不知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周总理就是文革中呕心沥血，保护老干部、抢救文物，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段总理指示。

看来国人的选择性遗忘也是世界一流的，只记贼吃肉，不记贼挨打，或根据需要只记挨打、不记吃肉（对旧社会就是这么记忆的）。由于具备了这样的优秀品质，任何创伤都不会给我们这个民族造成长期的痛苦。即使是文革这么一场浩劫，就整体而言，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害者，都没有留下什么痛苦的记忆。最近发生的“山西溃坝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闹哄一阵子，撤个省长、市长也就过去了，这对中华民族来说，端的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绝不会在这些小事上纠缠，又会向以往一样，极为迅速地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前进了。我们这样一个总是在精神上处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的民族，想不经济腾飞都难。另外，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海皮（happy）的民族的原因吧。

像清朝那样“俗投僧不投”、出家当和尚做尼姑在毛中国更是不能想像。有一次和一个港客聊天，谈到了文革，他像阿木林一般操着鸟语问我，文革期间挨斗的那些人为什么不选择辞职拂袖而去，再不行就出家，差点让我们把肠子都笑出来。在二杆子国家不要说俗人出家，喇嘛和尚尼姑神父自己还没处躲。在苏联，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遗愿，天才的革命工艺师非常清楚，宣传阵地布尔什维克不去占领，东正教神父修女们就要去占领。斯大林继承列宁同志的遗志，在 1930 年代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破坏，后来发现仍有宗教暗中活动，在以后大清洗期间，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有 16.5 万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的 10.6 万人被枪决。至于中国，老毛追求的是艺术效果，和尚闹革命，尼姑求解放，喇嘛斗私批修，阿訇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事情多了去了。那些头牌大的、道行深的，交给了红卫兵小将，至今海外藏独分子向西方展示的还是这些照片。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红卫兵勒令东北哈尔滨和尚们举着“什么佛经 全是放屁”的大横幅在寺院门前示众的那张照片。

说起文革“破四旧”那些事来，可说的太多了，现在我已经完全丧失了兴趣，我只是不明白，今天那些一边拜孔庙，一边拜老毛怀念文革的左派们（代表人物如孔庆东，最自豪的就是自己同时是孔子学说和毛泽东思想的传人），到底人家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思想确实是如水银泻地一样传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而且深入人心。我记得

在我当年下乡的地方，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村里有个80多岁的老太太，文革开始后就总拿着树枝在地上画蛇。别人就问她你这是干什么，老太太回答说我听了村里的大喇叭广播，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不识字，我也不会画牛、鬼，只好就天天在地上画蛇，意思是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的牛鬼蛇神！据说听者无不动容，甚至有人表示要把这个故事想办法告诉毛主席他老人家"故事传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心欢喜，夸咱们蛇儿画得好，夸咱们觉悟属第一"，没准又一次"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再写出什么至今还能让毛左们兴奋的好诗来。还一个可能是毛主席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因为据毛左们说毛主席的眼泪赛黄金，只为这些穷苦人洒落。我们下乡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半植物人状态了，没过多长时间就故去了，也没看到她老人家画的刘少奇是什么模样，很是遗憾。

最近买了套"红太阳系列"的光盘，光是看红太阳颂歌的目录就使人震惊，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歌颂红太阳的歌曲，藏族、维族、壮族、蒙古族、朝鲜族这些人口多点的民族自不必说，连苗族、彝族、傣族这些深山老林的小民族也照样不含糊，而且那些曲子一个比一个好听。从文艺形式上看，评弹、大鼓、梆子、弦子、坠子、老调、相声、快板书、戏曲应有尽有，从白山黑水到傣村苗寨，幸福的伽椰琴，热情的达普鼓，欢快的冬不拉，悠扬的马头琴一起演奏，哈达、壮锦、酥油茶、青稞酒一起敬献，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所有的二杆子国家把主要精力都是放在对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上。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民众要自我表白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另一方面又把本国国民当成潜在的"国家公敌"，无论工农兵学商。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可以自由呼吸"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都要受到来自领袖的监控，而且每个人都有义务和责任按照领袖的意愿监督、收拾别人，又可从中得到巨大的满足。不同的是，中国搞的是群众运动，苏联搞的是线民政治。

就拿当年处于和资本主义对抗最前线的东德来说，这个国家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家庭小社会，社会大家庭，家里面还有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而中国则是全民皆兵的模式，"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需要具体指定什么线人，毛主席时刻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文革的时候，我听到有个造反派怒斥一个黑帮（是走资派还是叛徒特务记不清楚了），意思是你别以为你一个人干的那些事情别人不知道，革命群众早晚会给你揭发出来。你看见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没有，你不管从哪个方向看，都能感觉到毛主席在看着你，所以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罪行，你干过什么毛主席都知道！后来人家还告诉我，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那张毛主席肖像很神奇，不像一般的人物画像眼睛只看一个方向，而是你不管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会发现老人家在和你"王八看绿豆——眼对眼（此处歪用）"。后来我专门骑着自行车从长安街走了一趟，一路上都在拧着脖子看毛像，还差点跟人家撞车。以后又在天安门广场转了好几圈，发现人家说的一点不错，你不管走到哪儿，也甩不掉这个专看绿豆的王八，即使在几乎贴着城墙的地方，老人家还在用余光看着你，一时间吓得我脖子里直冒冷汗。

以后凡是去看画展，都要和里面的人物肖像对视一番，然后换个位置，看看是不是在什么方向画像上的人物都在盯着你，结果发现不少画像都是这样，上面的"毛主席像真神奇"的说法完全是扯淡。至于怎样画才能出来这样的效果，还请诸位行家里手赐教。

杂谈二杆子(19):二杆子威力(下)

金唢呐

二杆子厉害之处还在于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更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文革期间有个极为流行的口号"灵魂深处闹革命"，实际上就是把各种对政权潜在的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把任何不符合领袖意愿的东西清除掉，这是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所做不到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介绍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有着十分离奇的规定：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当天报纸思想热度的思想，都是对政权的"颠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强的，就是削弱！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颠覆！"知情不报——等于是自己干的！"

其实"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句话是前苏联二杆子的做事原则。当年捷尔任斯基创建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后来的 KGB。因为"契卡"成立之初，老捷不知从哪儿淘换出一大堆皮衣，从此，皮夹克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向列宁要的条件就是不经审判就有权枪决犯人，该出手时能随意出手，看谁不顺眼都可以用"近距离后脑勺方式"解决问题，目标就是把契卡变成不受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当时老捷考核下属的标准就是：把反抗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一旦监督对象进入了司法程序就是契卡的失职。他们还对思想活跃、容易出萌芽的知识分子特别提防，1922 年，专门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

就连契卡（后来的克格勃）的头子自己也不能幸免，很多都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在历届特务头子里面，只有创始人捷尔任斯基，被人称为"穿皮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因为死得早（1926 年），而被"我们仁慈的父亲"斯大林放过。他的后任像亚哥达、叶若夫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罪名而被斯大林枪毙，贝利亚则是死在了赫鲁晓夫手里。即使是捷尔任斯基下场也好不到哪去，人死账不烂，1937 年，他的全部亲属和秘书都因"波兰间谍"案被捕，这个"波兰间谍"案共有 18000 人被捕，并且，全部都招供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最后捷尔任斯基的秘书被斯大林枪决。

中国也不例外，老毛把国家主席、元帅将军、知识分子，凡是他认为对政权有威胁的，统统都消灭在了萌芽状态。他老人家的最大创意，是把皮夹克变成了革命群众，把肉体消灭变成肉体虐待加思想改造。文革期间，更是把这套发展到了顶峰，当时有个口号叫"群众专政万岁"。看着谁不顺眼，先一顿臭揍，关进牛棚再说，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后来又提出不但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连生命的瞬间都不放过。国民要时时刻刻要检讨自己有没有什么非分之想，有什么对不住毛主席老人家的地方。

二杆子国家的国民甚至没有选择沉默的自由。"你无权保持沉默，你的沉默将成为批判罪证"。反右时就有这样的情况，我本人就认识一个右派，此人不像一般右派那样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而是老实窝囊，说话结巴，一脑袋浆糊，三个碌碡也压不出一个屁来，遑论响屁。57 年大鸣大放时，既没有贴大字报，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向党组织提意见，可当时各单位都有指标，把那些受不住诱惑，被引蛇出洞的人们定了右派后帽子还富裕一顶，剩下的只有那些慷慨激昂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还有就是两个没发言的：一个是因孩子生病中途请假退场了，还有就是这位三个碌碡也压不出一个屁来的窝囊蛋，结果被扣上一顶右派帽子，去劳改基地团伯洼养了 22 年的猪。直到今天人们还不相信他也是右派，常有人在后面戳戳点点：就他那德行，也配当右派？

文革的时候也是一样，开会不发言本身就是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人人过关"，就是人人都要接受审查，人人都要发言表态，所谓"逍遥派"也只是相对那些活跃分子而言。苏联的情况也不例外，斯大林时代有个非常有名的诗人叫马雅可夫斯基，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大概最能反映那个时期的情况：

谁今天不跟我们，
 同声歌唱
 谁就是，
 反对
 我们！

顺便说一句，这种诗歌的形式叫"阶梯诗"，诗行排列的形式跟楼梯差不多，所以也称"楼梯诗"。据说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它首创于法国未来派诗人阿波里奈，20 年代由马雅可夫斯基改造成俄语"重音诗体"的排列形式，据说特适用于题材重大、时空跨度大、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最著名的就是长诗《列宁》，其中一句是：

今天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明天
 我要在地图上
擦掉所有的王国。

阶级的头脑，
阶级的事业，
阶级的力量，
阶级的光荣——
这就是党。

老大哥一边倒的 50 年代，阶梯诗移植我国，东施们纷纷效颦，歌德诗人贺敬之写的《雷锋之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东风万里》等，都是中国式的阶梯诗。

据说阶梯诗"通过独特的排列形式，突出强调了每个词的内容，使之获得最大的表现力，以加强诗的节奏感，显示丰富的情感层次。"依我看阶梯诗特别适合拍马屁，能够把关键的那一声重重地拍出来，清脆而响亮，让需要知道的人留下个深刻的印象。

说到这里，我记得前几天看到鱼丈人和小小衲网友说到文革中因为喊错口号而招来牢狱之灾的贴子，使我想起当年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听说的一件事，还跟阶梯诗有关。我插队旁边的公社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在知识青年的欢迎会上，带头喊口号的知青，无师自通地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改成了阶梯诗。这段语录原文是：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改成阶梯诗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贫农，
便是否认革命。
若打击贫农，
便是打击革命。

在开大会实际喊口号的时候为了更响亮一些，就把"若"、"便是"这些词都省略了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并没有省略，只是重音在后面，所以远远听去，便成了"否认贫农"、"否认革命"、"打击贫农""打击革命"这些反动口号响彻云霄。后来被追查下来，喊口号的人给整的七荤八素，好在人家根红苗正，没几个月就给放了出来。前两年还听说有人遇到了当年喊口号的人，情况和蒯大富有些相似，是商品经济大潮的弄潮儿，混得挺风光，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还深深地怀念过去那个纯真无邪的文革时代。

顺便说一下，对于我这样一个非思想家坯子来说，指望我就"二杆子如何发挥作用"这样一个话题说出些什么系统、深刻的东西来，大概是不可能的。我主要想把我经历过的事情、看到的资料整理出来（也就是老河说的"历史细节"），佐以连篇废话，顺便也谈谈我的分析和感想。而且据我所知，这类讨论极权是理论性文章很多，好像把我要说的、能想到的人家都说完了。像胡适在30年代转述的、伊司曼总结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征就非常经典，我附在下面，供参考。

伊司曼总结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重要特征：
一、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
二、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
三、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
五、"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
七、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
八、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九、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
十、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

十一、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
十二、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十三、政府计划的罪恶。
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
十五、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
十六、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十七、不择手段的鼓励人口增加。
十八、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 命"的口号，到处滥用。
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二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

杂谈二杆子(20):二杆子确有令人怀念之处(上)

金唢呐

前几天在国内凯迪网站看到一个《人文语录》的帖子，编者把他认可的警句格言列出了几百条。里面既有林肯、爱因斯坦这样的名家，也有胡平这种民主大腕，"虚妄"网人芦笛的一段话也被收在了里面：如果说世上有真正的智慧，那就是强压住反感，去仔细琢磨难听话里有无道理。

后来我问老芦是在哪儿说的，想把前后文调出来"窥窥"（上海话，看看的意思），从字缝里再看出点什么名堂来，可惜他老人家出现了老年痴呆早期症状，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还拿什么"超人"之类的话来糊弄我，很是叫人不爽。我想，老芦这里说的并不是"智慧"的定义，而是说这种做法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按照这个思路，我也说说怎样做才是一个正派的独知。正派的独知，就是要强按住满腔怒火，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愿意看的、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然后要像《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那样，"咬住仇、咬住恨，咬住仇恨强咽下"，抛弃个人好恶，客观冷静地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做出功利判断。

强调一下，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取样也很重要，像前一段时间网友转述的国内大牌董教授所说的"古人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和我所说的"毛时代北方农民揩腚用不起纸，只能用土坷垃、石块、高粱秸、玉米叶，或墙上干蹭"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要说五千年（源自孙中山黄帝陵祭词："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期间没有人"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恐怕也不是事实，甚至比这洗的更频繁也，起码云南的傣族里面有一分支，几乎是天天洗，人称"水傣"。我和董教授的区别只是在于他说的是特例，而我说的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绝大部分北方农村都是这样。当然，如果有人问我要照片的话我还是傻眼。

就拿毛时代的二杆子社会来说，不管你是否喜欢，都应该承认以下三个事实：

1、它确确实实在中国存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给国家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且贻害无穷；
2、没有人真正愿意回到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人们已经受够了；
3、还有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而且二杆子社会也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

尤其是文革前的二杆子社会，令人怀念的地方更多。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很可能会进入类似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认为华国锋下台最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实力、谋略不够，而是他根本无法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遑论"七八年来一次"。不仅是老华，任何人都不行。而苏联的情况就不同，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不再大规模的杀人整人，别的没什么变化。一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一支歌曲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我对左派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文革，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的说法举双手赞成。确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 TMD 好！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徘徊（当然，今天社会也不能说是一片光明）。

第二、三条看起来矛盾，其实很好理解。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活着真没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有时候还不是嘴上说说，还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人们都用行动选择了生存。我周围的农村出身的朋友也很怀念他们贫困的家乡：弯弯的小河，古老的水车，悠闲的水牛，阿娇的情歌……。可真要有人给他们把户口办回去，那可是非出人命不可！二杆子社会不如今天是全面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后带来的精神上的自由和物质上的富裕是谁也不愿意放弃的东西。但并不是说过去的二杆子社会一无是处，从主观感觉上讲，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在二杆子社会某些时段活的开心、省心、顺心，尤其是在不搞政治运动、没有大饥荒的日子里。

毛时代日子过得开心是因为国家处于封闭、人民处于愚昧的状态，法国文豪福楼拜总结的"幸福三要素：愚蠢，自私，健康。愚蠢一丢，幸福全无。"（To be stupid, selfish, and have good health are three requirements for happiness, though if stupidity is lacking, all is lost. Gustave Flaubert），真是至理明言。那句西方谚语"上帝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改成"上帝使人幸福，必先使其愚昧"、"上帝使人痛苦，必先使其开化"也完全适用。打开国门后出现的混乱，就是因为发现我们什么都不行，不但不如西方，连谁家在弹丸之地香港台湾有个亲戚都要高人一头，各种痛苦、烦恼便接踵而来。现在我们之所以要"把孔子抬出来"，动不动搬出四大发明，就是想通过和洋鬼子 PK 一下各自的老祖宗，也许还可以找回点尊严，增加些幸福指数。

增加国人幸福指数的主要方法，还是党把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控制在手里，告诉国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正在受苦受难，让国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跟今天朝鲜的民众差不多）。越是发达的国家，人民越是不幸。回忆起来，我这种观念的形成完全是宣传机构的洗脑造成的，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经常登台表演的大合唱《美国黑孩子小杰克》，这是我们学校的保留节目，经常唱、反复唱，所以歌词和旋律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歌曲基本上是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反复拷问美国孩子是怎样生活：

合唱问："小杰克，小杰克，美国黑孩子小杰克，请你告诉我你怎样生活？"

小杰克悲情至略呈哭腔地答："我今年已整七岁，还不能去上学，为了活命当童工，整天受折磨。"

合唱问："小杰克，小杰克，美国黑孩子小杰克，请你告诉我你怎样生活？"

小杰克悲愤回答："妈妈织布还挨冻，爸爸种田还挨饿，在老板的皮鞭下，不工作就没法活！"
……

扮演小杰克的小同学满脸涂成黑色，站在最前面，唱得凄惨悲伤。我们后面的合唱雄壮有力，体现了对他的同情和声援。能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下上学读书，没有战争的摧残，没有地主的大棒、资本家的皮鞭，生为中国人真是太幸福了："East, west, home is best"。不知为什么现在红色经典没有把这首歌收录进来，我们从来就是这样，谎言被戳穿居然就跟没事人儿一样，然后接着撒谎，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可持续撒谎。这种撒谎与其说是技术，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

如果到朝鲜走一趟就会发现那里的人民很幸福，男孩子还个个充满阳刚之气。据说他们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抵制来自中国的不良影响，他们的方法和我们也差不多，转播中国的节目只播焦点访谈，什么假烟假酒毒大米黑心棉，经常播、反复播，让全体朝鲜人民都知道，这回三鹿牛奶估计也跑不了，所以朝鲜人民一点不痛苦，还觉得中国人可怜。看来幸福的社会主义家庭都是一个模式，不幸却有各式各样。

林语堂说过："中国有那么一群人，本身是社会的最下层，其利益天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领导阶级意识。这在地球上是绝对再也找不出来这么弱智的生物了！"二杆子对付这种弱智生物最见效的方法，就是热情地歌唱、赞美，毛搞政治运动从来就是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弱智的生物就是时令的九个指头。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实际上就是学会不断地变换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后来文革引起天怒人怨，就是老毛玩过头了，受到伤害的人太多，没有几个人是属于九个指头。伟大领袖自己说的一点也不错，在自己蹬腿之前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事干绝"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要不然，你让后人怎么办？

杂谈二杆子(21):二杆子确有令人怀念之处(中)

金唢呐

前一段时间这里开展"幸福标准大讨论"，最后很多人都认为"人的幸福都是比较而言的，所谓幸福就是看到有人比我还悲惨。否则，那里还有幸福？"最为经典。我认为把"看到"改为"觉得"、"有人"改为"别人"可能要更好一些。就毛中国而言，完全处于封闭状态，全部信息都来自官方宣传，西方国家的人民都是"妈妈织布还挨冻，爸爸种田还挨饿"、从 7 岁开始就"为了活命当童工，整天受折磨"，幸福感肯定会油然而

生。苏联人和我们一样，也是个封闭国家。那句歌词"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是《祖国进行曲》号称苏联的第二国歌的两句歌词，也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完全是胡扯，有那么多有形无形的柏林墙挡着，你们怎么会知道"别的国家"是怎样呼吸的。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认定自己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Most folks are about as happy as they make up their minds to be. Abraham Lincoln，亚伯拉罕•林肯)"于是我们二杆子国家的公民，就成了世界上最开心、最幸福的一群。

也可能是专业的原因吧，我对于"封闭状态"特别看重，因为如果不在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很多实验根本没法做。所以我特别同意这种说法：原来中国人民很海皮，只是因为 19 世纪洋鬼子强迫咱们打开了国门，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才出现这么大的动乱。老毛为中国人民把大门又重新关上，所以又为人民找回了幸福。网友所说的看完芦文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工作没干劲，学习没兴趣，越来越孤独，日常生活一塌糊涂，连性欲都下降了不少"，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估计就是过去还可以自我欺骗、自我麻痹、自我安慰，现在清醒了，什么都知道了，痛苦烦恼也就越来越多。这也是尼采要自杀，谁也拦不住。

现在在医学伦理学上，医生应不应该把癌症病人的病情告知本人，也还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总起来说，西方国家主张告诉本人，一方面有个知情权的问题，还有就是对患者本人告知实情，可以取得患者的积极配合，有助于疾病的有效治疗。还可以让患者安排自己剩余的时间，该旅游旅游，想还愿的去还愿。而中国医生大部分不主张告诉病人，他们说的也有道理。对患者本人告知实情，将会给患者猛烈的心理冲击，导致患者对生活失去信心。很多病人本来活蹦乱跳的，一检查出癌症马上打蔫，几个月就蹬腿。但如果不告诉病人，又怕担责任，而且治疗起来又有很多实际困难。又输液又照射，楞说没有瘤子，恐怕没人会相信。所以现在医院的具体做法是避重就轻，把病情选择性地告诉患者本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癌症是可以被征服的！然后转过头来把病情全盘告诉家属：大概只能活三个月了，现在医学就是这个水平，我们也没什么办法。再由家属决定是否应该告诉病人，该怎么告诉病人。细想一下，这也不失为符合中国国情告知方法。

社会问题也是一样，丑恶的事情存在不怕，只要没有经主流媒体公开就不会引起什么"反响"。前一段本坛人们讨论活体肾脏移植的事情，我没想到反应会这么强烈。多少年来，死刑犯在临死前拿掉肾脏，或者是枪声刚响就几个白大衣冲上去，有的摘肾，有的挖心，然后救护车或者警车响着警笛开回医院，马上给病人进行器官移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已经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本算不得什么新闻。而且是互惠互利，往往患者家属和死刑犯家属私下交易，数额在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之间不等。过去几十年，死刑犯一直是中国脏器移植的主要来源，几乎所有的医生患者都知道，不过是没上报纸就是了，从来没有引起过什么风波。

毛时代日子过得开心的另一个原因是那时候业余时间少，下班以后还要有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即使星期天休息，也被洗衣服（搓板）、和煤泥、拆洗棉被、买冬储大白菜的家务事占得满满的，没有什么时间胡思乱想。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人为什么要工作，就是为了享受休息时的愉悦。确实是，那时候抑郁症的发病率极低，个个乐不可支，不躁狂就不错。在部队上呆过的人都知道，带兵最大的诀窍是不能让

战士们闲着，"无事生非"，要不断找点花样让大头兵们忙得找不到北，一闲下来一准出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有句名言："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洋鬼子布莱克（William Blake，British Romantic Writer and Painter and Illustrator, 1757-1827）也有类似的说法：The busy bee has no time for sorrow（辛勤的蜜蜂永没有时间悲哀！）。

在二杆子社会，一切都由领袖管起来，党叫干啥就干啥，农民不用操心是种粮还是种菜，工人不用担心产品是否有销路，知识分子不用发愁能不能上课发论文，学生不用担心毕业分配，更没有双向选择，乱七八糟的事儿也少，所以日子过得省心，尤其对于脑沟回浅、浆糊含量高的人更是这样。记得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每次回我原来上班那个工厂，工人们都干得热火朝天，都没时间搭理我。因为当时什么都缺，只要生产出来东西，不管质量、样式如何，都有销路，往往是东西还没出来，就有人订货了。后来就不行了，产品堆在库房里卖不出去，奖金工资不能按时发，听到的都是工人们的破口大骂。再过些时候，连骂声都听不到了，车间里安静的很，工人们个个精神恍惚，闷头打扑克下棋，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能干点什么，明天的日子应该如何打发。

中国河南有个共产主义的南街村，是左愤眼里的圣地麦加。村里拜毛泽东为神，家家户户悬挂毛主席像，出门必须佩戴毛主席像章，每天要学习老三篇，早请示晚汇报。分配上采取供给制，只给 300 元的工资（后来是否增加不知道），定期发放电视机、家具、大米、白面、酱油、咸盐、醋、锅碗瓢盆，但不准买录像机和 DVD，否则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屡教不改、情节严重的还要被抓去开批判会、游街（现在不知有没有松动）。令人气短的是即使搞这种共产主义乌托邦，也没有欧洲日本那种境界，靠得是四亿元的银行政治贷款来维持。去年南街村的村长死了，在办公室发现了上千万的存折，还有几个生前二奶抱着孩子来分遗产，很是冷了左愤们的心。

记者问南街村里的年轻人：为什么你们要选择这里，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好吗？不是。图挣钱多吗？不是。是为了什么理想抱负吗？也不是。就是图个省心！这地界就适合没什么想法、兴趣、爱好的人工作生活，是准白痴们的天堂。

前年装修新房，为家里客厅吊灯和太太干了一架。想当年毛时代消灭市场，照明电器只有灯泡和灯棍。一般是厕所厨房安灯泡，其他屋子安灯棍。这次我们买灯具去的地方是一家大的"灯具城"，毫不夸张说，里面有成千上万种灯具，看着什么都好，什么都想买，结果转了两个半天也没有把个客厅的吊顶灯买回来。直到现在，想起这事儿还生气，抬头望见吊顶灯，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时代缺吃少穿但愿满欲平，活得省心，从来不会生这份闲气。

适度清贫也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反过来说，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生富裕忧患始。就世界范围来说，非洲抑郁症发病率最低，他们发愁都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如何吃饱肚子；而人一旦吃饱了肚子，发愁的事情就会多起来，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吃饱撑的"。美国抑郁症发病率就很高，连小布什都在服用氟西汀（百忧解）。据世界卫生组织九十年代公布的自杀率，芬兰、瑞士、比利时、丹麦、瑞典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十位，清一色都高福利国家。最近的调查统计显示，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民第一为阿尔及利亚，第二为墨西哥，也

都符合"适度清贫可以增加人的幸福感"这个规律。

在西方国家呆时间长了，总觉得日子很平淡，周围连可议论的新闻也找不出一条来。而且连吐口痰都要找地方，也谈不到有什么个人自由。即使是衣食无忧，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一种放松，没什么快感，更没有嗨（high）的感觉。时间长了，就觉得日子过得"没劲"，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站着没劲，坐着没劲，躺着也没劲。回想起当年停课闹革命，一天到晚在家里疯玩，那才叫幸福，看到在讲台上威风凛凛的大腕（那时叫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撅着屁股挨斗，那才叫兴奋，是真正的high。毛泽东和其他统治者的区别，就是知道人民群众的痒痒肉在哪儿，应该怎样挠，什么时间挠，挠多长时间。

9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小规模的中学同学聚会，有人提到当年挨斗的一个老师，后来成了校长，一个同学去为子女入学的事情去找他，也不知是钱塞的少还是事情确实不好办，最后没有办成。在同学聚会这个同学大骂一通不说，还提起人家当年被斗的事情，不但没有人忏悔，反而一下子全都兴奋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令人吃惊的是连当时谁踢了一脚、谁打了一拳、谁吐了口水这样的细节大家都还记得。聚会结束的时候还舍不得离去，都感觉已经多少年没这么激情燃烧过了，相约来年再聚。以后中学同学聚会我再也没有去过，主要还不是怕激情燃烧，而是绯闻越来越多，就像人们说的"同学会同学，就是搞破鞋"、"老同学聚会，搞翻一对是一对"。

杂谈二杆子(22):二杆子确有令人怀念之处(下)

金唢呐

我上次说到"美国黑孩子小杰克"的例子，乃是信马由缰地瞎说，没想到最近居然看到一个定量公式：

幸福感＝f × 当前的生存状态 / 过去的生存状态。

幸福是一种个人主观感觉。这种主观感觉与现在的生存状态成正比，与过去的生存状态成反比。f是系数，其大小主要是与他所能得到的外界信息量有关，即与他人的生存状态的"比较"有关，过去中国人处于封闭状态，二杆子不但垄断了信息，又垄断了真理。新闻、文艺、教育和一切社会科学机构都齐心协力地对全民进行的强力灌输西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洋鬼子们都是大大小小的"美国黑孩子小杰克"。因此，造就了我们的幸福感。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有些幸福感还不是虚幻的，社会主义国家还确实有它的优点。

二杆子可以控制国民的思想，剥夺国民的一切自由，包括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甚至迁徙的自由，但同时也限制了犯罪，剥夺了贪污腐败的自由、吸毒嫖娼

的自由，这也正是二杆子令很多人怀念之处。具体说，二杆子社会的"优越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二杆子可以有效地遏制贪污腐败；
2、二杆子可以消灭"社会丑恶现象"如黄赌毒、假冒伪劣；
3、二杆子是维护社会治安最有力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时代没有大规模的贪污腐败、黄赌毒和假冒伪劣，我想与下列因素有关：1、 政治运动；2、计划经济；3、斗私批修。

不管是前苏联也好，毛时代的中国也好，领导干部尽管有很多特权，有所谓"腐化"行为，但确实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大规模的贪污腐败。而且我认为这与道德水准关系不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政客克林顿都有拉链门，区别无非就是革命导师干这种事情可以不让人知道，具体到马克思就是让他的亲密战友"王老五"恩格斯去背黑锅，而克林顿必须面对美国公众，只有老实交代，才是唯一出路。伟大领袖的九深一浅神功，若不是李志绥、卢弘（《炎黄春秋》杂志创办人和前主编，退休后写过《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这些人等人把这些事情捅出来，谁会知道？最关键的是，美国是"百姓动得，总统动不得"，而毛时代是"毛动得、少数高干动得，百姓动不得"，虽然不合理，但除了文革时代，社会风气良好从某种意义上看确实不假。看来不管是什么阶级、什么社会，人们都有同样的冲动，毛时代并非人们有什么了不起的觉悟，主要还是二杆子在发挥着作用，二杆子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控制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我记得学校里一位老教师和我讲起学校 50 年代"三反"运动中的"打老虎"情况，教师之间互相揭发，来回来去都是张老师曾经用过教研室的稿纸，李老师私自灌过教研室的墨水之类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当时他们教研室的一桩大案是某教师贪污墨水。那时侯教师备课不像后来可以不坐班，在家里备课，除了少数大腕以外，都必须在教研室备课。当时大多数人没有自来水笔，都是用沾水笔，而这位教师可能解放前家境宽裕，有一杆自来水笔。据说自来水笔是美国造的，特粗，能装墨水，每次上班来足足吸上一管，回去后找个空瓶子把墨水再挤出去，几个回合下来，全家就不用再花钱买墨水了。为这么点破事，差点没给定个什么分子。

还有就是学校教工食堂的管理员，原来是给定成了"小老虎"，准备判刑的。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三反"运动中规定，凡贪污 1000 元以上者即称为"老虎"。贪污数额达到 1 万元为之"大老虎"，贪污 1 万元以下，1000 元以上者为"小老虎"。"大老虎"要枪毙，"小老虎"，要挨处分。运动以"打老虎"为号召，要采取当年解放军剿匪"搜山"的方式，追寻"大老虎"，全国光是被判刑的老虎就是十几万。这位学校食堂管理员平时很叫人嫉恨，主要原因是利用职权，每次喝面汤的时候都要拿着筷子到伙房的香油瓶子里戳一下，然后筷子在碗里搅来搅去，弄得满屋飘香，激起民愤。运动来了以后被人揭发，平日里那些被香油熏过的群众，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采用我党一贯提倡的无中生有、层层加码的战术，终于给定了老虎。后来判刑的时候，法院发现教工食堂没几个人就餐，食堂那点钱即使教工们不吃不喝，全都让他一个人贪了，也成不了老虎，最后给下放到农村劳动了两年算完事。

现在看来，把"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过一个"扣在老蒋头上乃是 20 世纪最大的黑色幽默。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至今也不知道谁被老蒋错杀了，只晓得通过同学、同乡关系，不行再对付几块现大洋、写份检查，连陈赓、刘少奇、薄一波这些共党要犯，也可以大摇大摆地从监狱里出来，继续带兵与老蒋作对，在战场上兵戈相见。只晓得老蒋连个手头的作战计划也都是共党领袖先看过的二手货，身边一群大大小小的"红色代理"，要说"宁可漏过一千，绝不错杀一个"倒是个不争的事实。

记得李锐还是谁说过，毛泽东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有人不同意，说是应该为秦始皇加斯大林，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两者的区别就是七分秦始皇三分斯大林，还是三分秦始皇七分斯大林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由秦始皇建立起来的，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逐步完善的。但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融入了列宁的革命工艺学、斯大林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漏过一个"、以及他老人家自己独创的群众运动，再加上现代化的武器、交通工具、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把领袖的思想和意识深入到了一切边远的乡村、一切山野角落，深入到了每个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刻在每一个人的骨子上、融化在血液中。毛泽东把二杆子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也就是林副主席说的，达到了顶峰。

二杆子国家的政治运动，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迅速渗透到每个角落，绝对不留死角。连正在作战的军队也照样要过一遍筛子。上甘岭战役前夕，国内开始的"三反"运动，也影响到朝鲜战场的坑道。打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 15 军长秦基伟，差点成了"大老虎"而被枪毙。由于上面布置了"打老虎"的指标，秦基伟在坑道里苦口婆心地让大家发言，经过反复做工作，终于有人开口发言了，而揭发的却正是军长秦基伟。几件事一抖出来，激起了大家的不满，火力就更猛了，连秦基伟过去的警卫员也站起来揭发。就这样，新账旧账一起算，不光秦基伟，军领导一个个都当上了"大老虎"。最后考虑到马上要开战，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来到了十五军，代表上级党委宣布秦基伟、谷景生等军领导既不是"大老虎"，也不是"小老虎"。这就是后来秦基伟说的，打完坑道里的假"老虎"，接着打上甘岭的真"老虎"。

"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确实有强大的震慑作用，运动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人们仍然是提起来肝颤。我记得小时候看女孩子跳猴皮筋，还有这么一段：

猴皮筋、我们跳，
三反五反我知道。
反贪污反浪费，
官僚主义也反对。

唻唻咪嗖嗖第二节！

中华民族历来有贪腐陋习。广义说，东方人除了日本以外都有这毛病，就连西方人眼里的东方人、东方人眼里的西方人——老毛子这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似乎就得靠二杆子来收拾。从 50 年代披露出来的各种材料，中共入城执政不过两年左右时间，这些土八路贪污腐化的情况已经开始变得触目惊心。不可否认，群众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这一发展趋势。

不仅是治理贪污腐败，二杆子也是维护社会治安最有效的武器。二杆子强大的震慑作用、频繁的政治运动（在苏联就是秘密警察），有效地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使人们不敢想入非非。但是，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违法违纪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殃及无辜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并造成了许多人的非正常死亡。而事实上，这场运动没有也不能在权力与金钱之间建立起一道理想的屏障。更重要的是，谁也没可能无休止的去搞这种运动，而一旦没有了政治运动的约束，就跟把监禁多年的淫棍放出来一样，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贪婪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正如今天所看到的，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的中国官员，如此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如此肆无忌惮、贪得无厌。

杂谈二杆子(23):二杆子依赖症

金唢呐

写完上篇刚想发，突然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并不是说没有二杆子就一定会出现贪污腐败、假冒伪劣，社会治安一定恶化，欧洲很多国家和日本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二杆子国民都崇拜二杆子，畏惧二杆子，依赖二杆子。在二杆子面前逆来顺受，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制度。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突然少了二杆子，国民根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也不知自律为何物，各种社会问题会很突出，俄罗斯和中国都是这样。这是不是可以称为二杆子依赖症？

苏联转制后最让俄罗斯人愤怒的不是我们看重的"解体"，老毛子地方有的是，不在乎那些加盟共和国。而且老毛子历来是既狂妄又自卑，从来是俄罗斯人至上，看不起少数民族、崇拜西方。甚至在沙皇时代，有点西欧（如德国、英国）血统的老毛子也比纯种俄罗斯人高贵，官阶升得快，而俄罗斯人又比其他民族高贵。当时按叶利钦的说法，丢掉那些加盟共和国，可以建立一个纯粹的俄罗斯。

最让俄罗斯人愤怒的是转制后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人们出现怀旧情绪，最先被怀念的不是列宁斯大林，而是皮夹克头子捷尔任斯基。在俄罗斯"8•19"事件之后，在民众的欢呼雀跃中，伫立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上的捷尔任斯基铜像被巨大的起重机拔离了纪念碑基座。很显然，对于刚刚与苏联告别的俄罗斯人民来说，他们急于摆脱一切与苏联有关的痕迹，何况捷尔任斯基在任期间制造了许多残酷镇压的暴行，用当今时髦词汇来说，就是犯下了侵犯人权罪。

也许当时积极主张推翻捷尔任斯基雕像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在 13 年之后，在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的建议下，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青铜雕像被莫斯科市政部门重新安放在 13 年前它曾经所在的莫斯科卢比扬卡广场上。俄罗斯人怀念老任，主要是当年在捷尔任斯基的直接领导下，"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苏维埃政权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扫除了社会的丑恶现象，稳定了社会秩序。另外在救助孤儿、重建铁路、恢复经济等方面，"契卡"也功不可没。"铁腕费利克斯"曾经令那些犯罪分子和贪赃枉法的人胆寒，捷尔任斯基是秩序的象征，而转制后的俄罗斯恰恰需要这样的象征。

同样，在普京总统的批准下，克格勃总部里又重新挂起了历任皮夹克领导人的雕像，并得到了舆论的认可，民众希望用克格勃这种最有效的手段对付犯罪。

社会主义国家对付犯罪，可以说是从娃娃抓起。小青年们可能不知道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工读学校"，这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工读学校源于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组建的"高尔基工学团"、"捷尔任斯基公社"，原本带有收容性质，解决内战遗留的孤儿和流浪儿这一社会问题。30 年代初苏联生产的仿徕卡相机就是在工读学校诞生的，相机上面还刻有 FED（捷尔任斯基公社）标志。

工读学校的概念引入中国后，被赋予新的寓意，专门收教具有犯罪倾向、有违法行为、有严重道德问题、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未成年人，光北京就有十好几所，是中国特有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教育形式。在我印象里，文革中初中生打人下手最狠的一个是联动那些高干子弟，再就是这帮工读学校的学生，出手快、下手黑。他们受 17 年教育黑线压迫最深，反抗也最烈，造反欲望强烈，而且特别能战斗，让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穷棒子翻身过程。文革后在"救救他"的呼声中，各地工读学校纷纷复办，专门招收"违法和轻微犯罪"的青少年学生。风行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写得就是工读学校的事儿，还捧红了不少演员。现在受西方的影响，工读学校急剧减少，即使有大多也都改名，学生多是一些迷恋网络的网虫、再不就是双差生。

我们学校有个退休干部，是学校原来的保卫科长，对现在动不动就"依法办事"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完全是因为引入了西方的司法制度、人权人道才造成了今天社会治安的恶化。他举例说，现在家属宿舍三天两头地发生偷自行车的事儿，以前也出现过，从来都是群众一拥而上，把小偷脑袋用衣服包住后一顿暴打，至少是搭上几个肋骨，还有的给打成了终生残废。直打得小偷闻风丧胆，没有谁再敢光顾我们家属院。现在倒好，抓住小偷以后只能交送司法机关，且不说这里还有警匪勾结的问题，即使按照现在的法律，涉案金额在 800 元以下根本不构成刑事案件，偷一辆自行车不够涉案金额，也就是问个口供、按个手印、拍张照片，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出来接着偷。而且现在偷自行车的都是附近郊区的农民，在过去都是属于盲流，早就被遣送回乡了。现在倒好，这些人一天到晚在城市晃悠，这社会治安好的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也比计划经济更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和假冒伪劣。这里面有个"无利不起早"的问题。计划经济年代的企业，绝无任何可能出现三鹿奶粉加三聚氰胺这种事情，道理很简单，冒着判刑甚至杀头的危险这么干，对我有什么好处？从厂长到工人，都是一副"吃他娘、穿他娘"的态度，工厂效益好坏，产品成本高低、是否有竞争力和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利益驱动，谁去干那种事情。还有像贩毒卖淫，需要产供销一条龙，需要同时有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也很难大规模的出现。

再拿假冒产品来说，毛时代虽然商品匮乏，质量低劣，但没有假冒。社会主义国家产品质量都差，但和现在说的质量差不完全是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外观差、品种少、毛病多、功能不全、爱出故障，但用料上却不怎么不含糊，所以做出东西来往往是傻大笨粗。70 年代我在工厂时经常跟车装卸，没少和汽车打交道。就拿卡车来说，当时卡车主要有"解放"和"南京嘎斯"，后者是南京汽车装配厂仿制的苏联嘎斯 51 的

2.5 吨载货车，后来被命名为什么"跃进牌"，可习惯上人们还是称南京嘎斯。解放牌卡车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连工厂都是苏联人援建的，就这么个人人皆知的事情，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说成是自力更生的结果，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同，真是邪了、绝了。

对这些国产卡车的性能，大概芦区的大侠们没有谁比我更清楚。质量是 ZTMD 差（此处理解为"真他妈的差"和"贼他妈的差"都对，俺们东北银都爱说"贼"来加强语气）！首先是油箱密封不严，漏油，只要停车超过 10 分钟，车底下就会留下痕迹。当时，停车场的师傅都这么说，国产车来没来过、什么时候来的，一看地下拉的屎就知道。而且动不动就出毛病，司机经常要钻到车下去修车，我干的活就是在旁边给师傅递扳子钳子，递错了或者慢了还要挨骂。那时候的司机远比现在的司机技术全面，大都会修车，什么时候都是一身机油味。车上要准备全套的修车工具和千斤顶不说，还要准备一块帆布。只要汽车一出毛病，先是打开发动机的盖子，然后将帆布铺开，一个老头钻被窝就到了车底下，个个身手麻利。

最可恼的就是冬天发动机打不着火，必须拿气焊枪喷火去烧，或者往水箱里灌热水，实在不行就得拿摇把子插到汽车前边的孔里，顺时针玩命摇。摇这玩意儿的时候，有时候摇把子会突然反转，有因此关节脱臼甚至骨折的，甚至还有把下巴壳子打碎的。前些年我买车的时候检查配件，问售车小姐这汽车配不配摇把子（正式名称叫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给人家问的直发蒙，一个劲给我鞠躬道歉赔不是，说刚来业务不熟，从来没听说过这玩意儿。

70 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进口了一批二手"日野"卡车，不管天气多冷，一踩油门就走，而且很少出故障，司机们个个也都是干干净净的，停车也不留痕迹，给那些开国产车的羡慕的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但是"解放"和"南京嘎斯"也不是一无是处，它们有个共同的优点，就是 ZTMD 的结实。不管是日本车还是欧洲车，载重量标的是多少就只能拉多少，多拉一点就趴窝。国产车没事儿，把车帮子（司机都叫"高马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加高一点，超载一倍也照样跑。直到现在国产车仍然保持着这个计划经济的特点，在卡车司机的心目中，国产卡车远比进口车受欢迎。甚至连国产的烧柴油的机动三轮车（北方叫"三马"，南方叫什么不知道，好像叫"三脚鸡"）也是这样。三马本来和拖拉机速度差不多，载重量也不大。可老百姓略加改造，拉几吨货在高速公路上跑，时速能达到 100 多公里，敢跟轿车飙车。

扯得太远了，先打住，接着说二杆子。

像最近我们单位那个老左（在趣谈样板戏系列里面提到过）给我说的一番话也很能说明二杆子依赖症的问题。

每年 10 月份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也就是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来例假的日子，岁岁阵痛，今又阵痛，不同的是今年痛经尤其剧烈，扑热息痛、布洛芬根本镇不住，非得打吗啡杜冷丁不可。原因是今年国人眼里最瞧不起的小日本一下占了四人，其中三个有日本国籍，三个中又有两个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英语

都说不利索就把上百万的奖金装进了口袋。上次我说到中国人看不起阿三，老芦好像还很吃惊，其实当今的中国，也就对老美还正眼瞧几眼，对其他国家就像小孙说的，欧洲老、日本小，加拿大澳大利亚没有影响力，根本不配跟中国过招，所以小鬼子获奖很是让天朝吃醋。这次继续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仍然无缘诺贝尔奖（此处特指自然科学奖），说明尽管个别奖项可能评选有误，但好歹诺奖还是个正经玩意儿。比如说尤里卡国际发明奖，具体是什么机构办的我也不知道，但就凭着中国科学家一天到晚从那儿抱奖杯回来，就知道不是个什么正经东西。

这次诺贝尔颁奖名单宣布后，校园里又议论了一阵子。虽然分贝高了些，但内容不过是老调子重弹：实行教授专家治校，老老实实退到蔡元培的老北大时代。正在大家高谈阔论、慷慨激昂之际，我们学校这位搞党史的老左把我拉到一边说：老金啊，你也是多少知道点历史的人，怎么这么糊涂啊。专家治校，党委撤出，减少行政干预，说的轻松。我们怎么办，行政人员怎么办，都喝西北风去？什么，搞再就业工程？就算我们可以不计较个人利益，国家的利益总要考虑吧。知道国民党是怎么垮台的吗？老蒋就是吃了专家治校的大亏。

人家接着给我讲了一通 40 年代末发生的事情。大概意思是学校这块阵地，由于国民党没有占领，所以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没事共产党就鼓动学生上街闹事，政府只要一管，结果肯定就是血案，各种版本的"纪念刘和珍君"之类的不朽名篇就脱颖而出。而且不管教授和校长政治立场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会站在学生一边，当年就愣是把闻一多这种新月派诗人都弄成了进步教授。如果政府不管，社会秩序大乱，国将不国，民怨沸腾，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显示政府无能。所以不管政府如何处理，结局都一样，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你把党委和行政机关撤了试试，肯定是这个结果。共产党是怎么上台的，还会连这个都不懂？得不得诺贝尔奖事小，这国家稳定事大。

党委领导、行政干预这东西你看着不起眼，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失去了才觉得宝贵。89 年的时候不过是稍微放松了一下，结果怎么样？有了它的存在，学生们就不会上街捣乱，教授就不会翘尾巴，院士们就乖乖地俯首帖耳，伏低做小，唯恐马屁拍不到点上。一旦失去了它，学生们就要"反独裁、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教授们就会"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章疯子、傅大炮就会应运而生，拍案而起：这样的 XXX 非走开不可！

其实这些以前我提到过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老毛死后中国要实行"有二杆子，不唯二杆子，重在经济建设"、"绝不承诺放弃二杆子"的策略。这样既可以解决二杆子国家僵化、经济没有活力的问题，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国家稳定，大概在二杆子依赖症国家，也只能这么办了。

又要忙几天去了，过一阵子再来，大家玩好。

杂谈二杆子(24):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

金唢呐

二杆子社会的国民，一般都具有双重人格，就是既要无限热爱又要满腔仇恨，"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既要绝对服从又要时刻准备造反。欲把国民培养成这样品行的二杆子，一是要"野蛮其精神"，二是要"掏空其脑壳"，三是要"打断其脊梁"（篡改自毛主席语录："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三个步骤缺一不可。

二杆子社会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与历代中外统治者对人民的要求都不同。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子民按照孔孟之道的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认认真真做人，规规矩矩唱戏。让全民参与造反活动，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历来都是农民领袖非常头疼的事情。即使是饿殍遍野，人相食，也照样还要费尽心机启发觉悟。由于从孔孟之道里面实在找不出理论根据，很多情况下只好利用孔子从不谈论的"怪力乱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二一》）上做文章。

像秦朝大兴土木，把百姓折腾成了"做奴隶而不成"的地步，陈胜、吴广起义还必须要弄什么"鱼腹丹书"、"篝火狐鸣"之类的名堂才行（鱼腹丹书：陈胜和吴广在薄绸上，用朱砂写下了"陈胜王"三个红字，并把它装在鱼肚子里。刻意让士卒捕到这条鱼；篝火狐鸣：吴广潜伏到营地附近一座荒庙里，半夜里点燃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半夜里大喊"大楚兴、陈胜王"）；黄巾军起义，张角先要创立"太平道"，散布谶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最费劲的还是红巾军起义，先要到处散播民谣："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计算好时间地点人物，找个老石匠凿个一只眼的石头人埋在地下，让民工挖河时，无意中发现有一独眼石人，让民谣得以应验，让众人相信这是冥冥天意。总而言之，要让安分守己的中国百姓造反，从传统文化中是找不到理论根据的。

近代西方的洋玩意儿进入中国以后，情况彻底发生了改变。首先是进化论，然后是马列主义，为革命造反提供了理论依据。进化论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我想再专门弄个系列说明，这里主要说说马列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爱还需要理由吗（广告词）"造反作乱便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毛主席有非常精辟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只要不合理就可以"砸烂"，共产党执政以后怎么办？因为谁都知道，任何社会都有不合理的地方，社会主义社会最不合理。不要紧，我们有二杆子！二杆子保证了我们砸烂领袖想要砸烂的东西，保护领袖想要保护的东西。如果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二杆子，社会将处于不停的革命、造反的动乱状态。

只有马克思，革命仍然无法成功。即使造反成功，也无法建立起一个高度稳定的二

杆子社会来。"革命前途与它的奥秘都隐藏在黑暗中，上帝说，让列宁去吧！于是，一切顿现光明。"（篡改自波普歌颂牛顿诗句）。列宁，只有列宁，才使得革命造反以及后来二杆子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

列宁对国际共运乃至所有暴力革命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他发明了俄共那种特地设计出来颠覆国家政权的极权组织。

1905 年，俄国爆发了自发的人民革命。这场革命失败后，列宁总结了它的历史教训后认为，由于社会生产力和技术的进步，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能力极大地增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的人民革命已经不可能获得胜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决不能通过人民去制造"（Revolution can never be made through the people），只能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即心红似火、志坚如钢的"职业革命家"去制造。包括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兼职教授客串玩票，都很难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为此，列宁组建了俄共那种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严密、高度集权、实行铁的纪律的组织，并在瑞士开办了世上第一所训练"职业革命家"的秘密学校，教会学员们怎样利用社会危机，躲在群众后面去煽动、教唆、组织他们起来用暴力反抗当局，告诉民众不要受什么约束，真正的革命只能也必须是不按规矩出牌的暴力革命。

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的一大贡献是使革命造反理论深入人心。毛写了大量文章唤起民众，内容无非就是就是告诉民众造反有理，革命必须采取暴力手段。他给革命下了一个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光荣革命、工业革命和后来的天鹅绒革命都不能叫革命，不砸烂几千万的狗头、不使对手威风扫地就不能叫革命。二月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流血，但毕竟不够汹涌澎湃，所以即使勉强算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彻底砸烂旧世界，然后"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随心所欲建立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新中国。

列宁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用理论和实践证明，只要革命能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不管丢掉多少国土，失去多少生命，"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刘少奇：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仅仅有一个铁的组织还不够，这只是内因，"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个外因，就是必须有一个可以浑水摸鱼的动乱环境，即所谓大乱求大治。所以文革中毛主席看见动乱所表现出的异常兴奋，"不怕乱，就怕不乱"；还有感谢日本皇军时说的那些话，没有过亲身经历，是绝对说不出来的。就拿苏联革命来说，当时俄国由于政治经济形势比较稳定，所以俄共的革命事业不可避免地处于低潮。在一战爆发前，列宁根本就没有预见到未来会有革命高潮的出现，曾悲观地预言："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发了"。

等到战争爆发后，机会来了。列宁先是主张失败主义，要革命党人不遗余力地破坏

捣乱，导致国家打败仗，从中渔利，由此导致他与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裂。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没有上台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缺乏一个革命领袖，当时那些欧洲社会主义者们和列宁的最大分歧说到底是一个要不要遵守规则，有没有一条道德底线，应不应该为了夺权不择手段。具体争论就是要不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等等。列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去他妈的底线，去他妈的规则"。

所以，信奉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列主义，成了民主社会主义和二杆子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像新加坡的李光耀就号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强硬反共分子，这方面他有深刻的认识："共产主义邪恶吗？我自己就不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力量。事实上，对于他们所要做的事，70%我赞同。"但是为什么他最终拒绝做共产党的同路人呢？这是他认为"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共产主义最终成为一种邪恶制度。......它要靠共产党的独裁和列宁主义的一切残酷无情的手段来实现这种理想。""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但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二杆子社会主义的国家来，仅靠马列主义还不够，还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像黑暗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一样，在中国人民千呼万唤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杂谈二杆子(25):培养二杆子要分三步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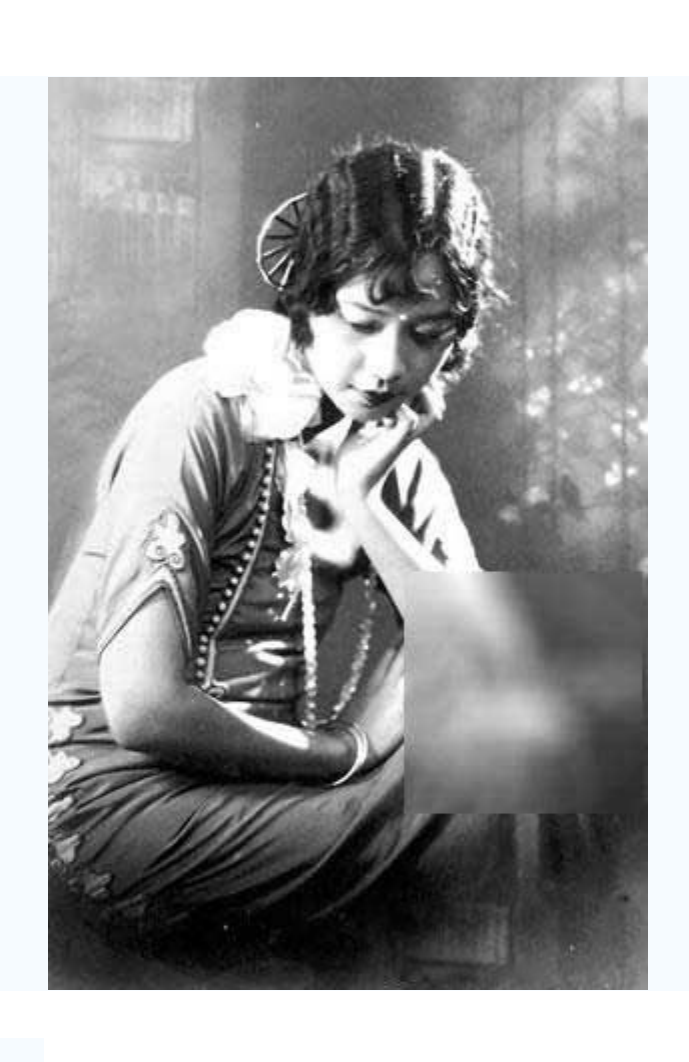
金唢呐

二杆子社会里最具二杆子味的国民我看是江青，最能反映二杆子国民特点的就是江青在法庭上讲过的一句话:"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看看民国时代的蓝萍和 70 年代的江青的照片，就知道我们的精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所说的"野蛮其精神"绝无半点夸张。

二杆子社会的国民特点就是有二杆子气。在北方话中，"二杆子"有点二傻子、二愣子、什么也不懂还穷横的意思，反义词就是书卷气、温良恭俭让。我考证了一下，"二杆子"源于唐朝故事。唐朝的长安"市长"京兆尹权势很大，出巡时有庞大的仪仗队伍。在最前开路的小吏官名叫"喝道伍佰"，他手拿一根长竿赶开路人。后来，"喝道伍佰"增为二人，于是每人就被称为二百五，又因为他们每人手中持一长竿，所以又称他们为二秆子。流传至今，二百五与二秆子都成了莽撞、无礼、粗鲁之人的代名词。二杆子在北方有时也用来骂那些横作威作福、欺男霸女、打架斗殴的痞子。

二杆子看上去虽然都是硬邦邦的，充满阳刚之气，但是没有骨头，没有脊梁，最重要是是没有大脑。也就是我前边说过的，把国民培养成二杆子要分三步走：首先要"野蛮其精神"，二是要"掏空其脑壳"，三是要"打断其脊梁"。这三条毛主席都做到了，而且十分出色。

首先是野蛮其精神，按毛主席本人的话说就是敢想敢干，而且要理直气壮地干，干完以后还不能觉得羞耻，觉得是犯罪。我想受毛泽东思想雨露滋润最直接，号称"我是主席的小学生"的江青女士的照片最能说明问题。江青并不属于传统女性，在上海滩时的蓝萍属于"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 的新女性（摘自歌曲《新的女性》http://www.qishi.com/m/40145.htm ），尽管性子野了一点，民国时期的蓝萍小姐的依然是妩媚动人、风情万种，引无数戏子竞折腰。经过毛主席多年的雨露滋润，到最后变的凶神恶煞、穷凶极恶、杆子味十足的八婆，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主席一条狗"，这个过程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在二杆子社会里国人的进化过程。



蓝苹女士婉约风情

万先生在回忆录里面提到的被江青接见后闹皮肤病的经历我听很多人都说过，不同的是别人起的都是鸡皮疙瘩，随后退去。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作为一名女性，二杆子味儿十足，首倡"文攻武卫"、大叫自己"一条狗"，丝毫没有女性应该有的美好、温柔、善良这些特点。可你说人家不是女性吧，该凸起的地方凸起，该凹陷的地方凹陷，女性该有的物件人家一样不少，而且都六十多岁的人了，那皮肤白嫩的能掐出水来，和某些体育女明星的那种男性化又不一样，反正是才叫人看着不舒服。蒯大富的那种"倾慕"的感觉，完全是实现了二杆子转变的结果。

江阿姨飒爽英姿

过去的皇帝，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生怕别人提当年谋反作乱的事儿，二是怕别人骂自己是秦始皇式的暴君。希望百姓尽快忘记自己当年是"乱贼"，把自己当成圣明的天子，然后"世乱用武，世治宜文"，找个治国贤才主政，仗着打完仗造成的人口锐减，先让大家过上几年小康日子，社会就立刻呈现"君爱民，民拥君"的和谐景象。

与之不同的是，毛主席让全国人民明白，当痞子流氓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像杀人放火、把有钱人捉出来，戴着高帽子游街这种侮辱人格的下三滥勾当，为了夺取政权，干了也就干了，至少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毛主席老人家可不是这样，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反复宣传，"痞子运动"好得很！我们只是痞子的还不够！执政后镇压反革命、打右派、整人更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最丢人的还是我们镇压的太少；当秦始皇也很光荣，只是作为学习榜样，秦始皇实在是没什么能拿出手的东西来，太不够格，差劲得很，差了一百倍。现在常听到有些小青年经常发出"余生也晚"的感叹，后悔的就是没有赶上和毛主席一起搞痞子运动。

我当年第一次听说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断定丫挺的是个红色后代。以后一看资料，"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王朔出生后不久便随他们来到北京郊区的部队大院落户"、"1976 年夏,王朔高中毕业后到山东参军"果然是部队大院出来的红色后代。"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话，不是那种环境出来的孩子是说不出口的，即使说出来也不是那股味儿。黑崽子不行，北京下层的胡同串子也不行，吃非商品粮长大、以后农转非的孩子更不行，只有这种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说出来才对味儿，这是祖上留下的玩意儿，别人冒充不得。大院后代不管表现再怎么叛逆，也是万变不离其宗。

文革时期也是一样，最先提着板带抽打老师的初中生就是那帮干部子弟。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人家那种"手提钢鞭将你打"的姿势绝对英姿飒爽、威风凛凛，和阿 Q 不是一个味儿。那时普通人家的孩子，看到别人打的那么威风，眼馋手痒，可又不敢打，不知道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后来江青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就打嘛！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才纷纷行动起来，争先恐后加入打人的行列。虽然文革期间工读学校的学生下手也狠，可总觉得他们和红色后代比较起来还少了点什么，好像没有联动、西纠的那种气势，缺少了点理直气壮的感觉。

和毛主席比起来，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逊色不少。这还不仅仅是能力上的差别，更是兴趣、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虽然起义、兵变，拉杆子扯旗造反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但和传统封建帝王一样，执政后尽量不谈、起码是不热衷谈这些事情。前几年，在邓小平逝世周年纪念活动，我看电视里邓朴方介绍说，老爷子从来不看什么三大战役的电影和电视剧，说过去打仗死人太多了，太残酷了。六四也是一样，除了当时接见戒严部队以外，并不是总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动不动就和秦始皇较劲。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类人眼里，杀人整人多少还有点"不得已而为之"。

过去的封建君王，最怕人们联想到自己是乱贼。因为没有二杆子做后盾，更怕人们效仿自己当年，扯旗造反。比如另一位农民起义的皇帝朱元璋就要小气得多，怕人提这事儿怕到了骨子里。从这点来说，贵有天下的朱元璋，终其一生，也自认为"乱贼"这种经历是他最不愿示人的疮疤。朱元璋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那种造反的理直气壮，而是日夜为身份焦虑，对凡是有可能指向他出身的这些字词的同音或近义语，都非常敏感。只因"则"字音近"贼"，因一"则"字而诛者多达数十人。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
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
……

记得在国外看电视里有过这样一个的报道。某个专家是专门研究性心理学的，他

采访过很多风尘女子，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挣钱讨生活，一般攒够了钱就要脱离苦海，洗去铅华，隐姓埋名重新做人，就像日本电影《望乡》里的阿崎婆一样，采访她们极其困难。但据他说也有极个别的女子，是由于性欲过剩才干这一行，并不在乎挣钱多少，主要是图痛快。像这样的女子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耻辱，离退休后还常吹嘘自己接客记录，接受调查时大大方方、款款而谈："忆昔青楼楼上饮，坐中多是淫棍。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箫到天明。"（篡改自陈与义《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吹笛到天明。）

杂谈二杆子(26):培养二杆子要分三步走(中)

金唢呐

斯大林、毛泽东和金家父子的二杆子社会主义绝不能等同一般意义上的极权国家，因为除此以外，从没有哪个政权完全彻底地使国民失去自由、财产、思维能力、人格和尊严，做到了让人民自愿或被迫地把一切交给领袖。这不是我瞎说，那个年代流行一句话就是"一切交给党安排"。真正实现了毛主席老人家怎么说，10 亿人民就怎么做。这样做的前提是把颅腔里的灰白质清空，放入垃圾水泥，至今还收拾不干净。这个过程，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换脑筋、洗脑。实际上，洗脑对象主要就是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不需要洗，大老粗又没有什么可洗的，所以搞定了知识分子，就等于搞定了一个民族。

洗脑首先要把国民封闭起来。把国民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然后画上自己需要的图画。封闭一点，愚昧一点；封闭得多，愚昧得多；彻底封闭，就可以成为地道的二杆子。至于国人的愚昧程度，老芦近七八年来干的都是这活，人家是这方面的专家，比我有发言权，我只能干点拾缺补遗的活，给诸位举几个例子。证实一下我们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倒退了一百五十年。

就说说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认为英国的战斗力不高，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他还认为喜食嗜吃牛羊肉的洋人如果不靠中国进口的大黄、茶叶辅食的话，会消化不良而死。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林则徐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在一份拟交英女王的文书中，他再次强调："大黄、茶叶、湖丝等类，皆中国宝贵之产。外国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制敌计策是只要禁止茶叶和大黄出口，就可以活活憋死洋鬼子。

再看看一百五十年以后的情况。1978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 2008 年出版）。这就是 1978 年中国改

革开放总设计师，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精英。

现在常看到这样的报道，说毛时代的中国人怎么不尿洋鬼子，不卑不亢；现在的中国人又如何崇洋媚外，有失国格人格。真实情况其实正好相反，70 年代无论哪个城市（北京好一些），只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鬼子走在街上，后面就会跟着长长的队伍，很像游行队伍，当时我就干过这事，只要是洋妞就一定随众人尾随，常常是从东街跟到西街。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有政治威胁压着，这游行队伍的长度还可以多少控制一些。以后政治稍有松动，这游行队伍就成了一支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大军。据官方报道称，最高记录是 1978 年，外国一个旅游团在兰州被 10 万人围观。

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是一样。不光是不懂经济，不懂科技，闹出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非咄咄怪事？"、"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这样的千古笑话；而且玩了一辈子政治，也丝毫不懂现代西方政治是何物。比如尼克松水门事件曝光后，毛主席做"一针见血"状指出：尼克松下台，是有人想整他。所以难怪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一帮小兄弟，照着死里坑中国。诸位很多都是在美国讨生活，你们可以体会到越南人是怎么看咱中国人的，我的感觉是既鄙视又仇恨。

这还是"学贯中西"、眼界开阔，一生手不释卷、全国人民公认的大学问家。至于花和尚出身许世友，就更搞笑，记得他当年冲着医学博士李志绥大喊大叫，问主席去世时为什么没看到"24 个伽马"？为什么尸体有黑斑。当时能够领导中国的，就是这么一帮人。

本来颅腔里的这些垃圾和水泥块已经够老芦忙活一辈子的了，更可怕的还不是我们的状态，而是我们的思维方法。就像"克里木参军去到边哨，临行时种下了一棵葡萄"一样，毛主席临行时留给我们的种种思维方法，"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长长蔓儿在心头缠绕"保证我们在面对世界各种信息的今天，每当出现一个以上信息时，我们一定会选择错误的信息，并导出错误的结论。可以保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旧货未除，又添新货"，所以老芦的疗愚永远不会有尽头。

就说最近美国大选，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关心谁上台，似乎并不夸张，起码在某些阶层是这样。我曾经问过一个我的山西同事，他对死亡几百人（据说实为上千人）的山西临汾垮坝事件居然一无所知，只是影影绰绰知道好像有这么回事。而对老麦和小奥的年龄、籍贯、出生地、政治面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兴趣爱好等如数家珍，填一份老麦和小奥履历表绝对不用查资料，我周围相当一部分中年男子们已经开始了"我与奥巴比童年"活动。最有趣的是，不同的派别都从奥巴马当选看到了希望。革命派认为，这是马丁路德金斗争的结果，不信诸位到网上看看，中文网站怀念老马的文章铺天盖地。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没有老马洒热血，哪有小奥上选台。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三亿人口，不斗行吗？"，全然不顾人家只是违反马列毛的非暴力运动。而民主派看到的则是奥巴马的当选体现了民主自由的力量。一个被肯尼亚的留学生父亲所生、被单身母亲（按中国过去的标准就是破鞋，因为两次结婚都有婚前性行为）拉扯大、中间的名字叫"侯赛因"、靠在社区服务起家的黑人，竟在预选和大选中连续击败了美国两党最有资历的政治家，当选为美国总统，什么时候中国人手里也能有自己的选票，选举自己的总统！"自由照耀世界之神"什么时候

能光顾中国。而在爱国青年们眼里，美国总统不过是咱河南人的大叔子（奥巴马弟弟现在深圳卖烧烤，娶了个河南媳妇，深圳市委统战部的任务艰巨啊）。以后让咱河南媳妇多学学《红楼梦》的贾家，"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拿下奥巴马，指日可待。最有意思的是我们一个同事，当年两口子留洋的时候带着去的，在美国上了小学和中学，两口子以后作为特聘学者回国定居，孩子留在了美国继续上大学。这两天两口子兴奋的跟又生了个孩子似的，逢人便说，我原以为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需要三代以上，现在看来根本不用！看他们慷慨激昂的劲头，让人很容易想起列宁那句口号：立刻占领白（冬）宫。我还亲眼看见一个留美回来的学者，给学生大讲特讲左翼和右翼政治观点的区别，而且理论联系实际，美国的左翼和右翼分别相当中国的那些群体。出国七八年居然连左翼和右翼是民主政治的概念，而专制政体下是不存在这两个派别都不知道，实在是令人称奇。

关于我党是怎样对国民进行洗脑的，这一直是国内的重大研究课题。高华、笑蜀和谢泳等人都有专著，前几天有人把高华的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贴了上来，我也把笑蜀和谢泳的文章附在后面，供参考。我想在这儿强调的是，这个洗脑过程有些是强迫的，也有些是主动申请的。

在二杆子国家里，绝对没有异端学说的存在。不管任何思想，迟早都必须而且也能够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宗教征服战争打得那么惨烈，不过是杀戮和驱赶，但不能改变人们的信奉。到头来，中东还是拜真主，欧洲还是信耶稣。真正做到了这一点的，只有社会主义的二杆子。最有趣的是，这种改造和转化工作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抵抗。胡适给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写序时，看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写的检查后说："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我党的很多革命理论确实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它对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世界观等具有强大的改造转化功能。闻一多没受过我党的任何肉体上的威胁和折磨，接受了点革命理论后他就主动表示："我受了几十年的欧美教育，无法摆脱，结果是落伍了，现在一旦觉悟，就要从头做起。"以后再加上毛在与老蒋争斗过程的成功，入城后中共官兵所展示的纪律严明，清正廉洁，追求理想，不怕牺牲的种种表现，毛泽东、周恩来一干人的个人魅力，更是让当代知识分子震惊和折服。早在 1949 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前后，一些大牌知识分子便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向新政权深刻地检讨自己以往的过错，表示对新政权和新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为了换取新政权的赏识，他们"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包括自己的思想信仰和尊严，客观上还为严密控制知识分子的国家行为和体制推波助澜，唯恐二杆子不硬。

记得老芦当年和某日本网友辩论，为该网友否认"日军轰炸中国大城市"所恼，写了一篇关于"智力软骨病"的文章。老芦在文中指出：

这"智力软骨病"是什么意思？很简单，缺乏精神上智力上的脊梁骨，毫无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被人家的洗脑轻而易举地俘虏，一枪不放就乖乖地把自己的脑袋交出去，听任那"不设防的城市"被人家轻易地完全彻底占领。过去在国

内如此，现在在国外也如此，所不同的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改了效忠对象而已。过去我觉得在美华人这个问题特别突出，现在看来在日华人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我看跟身处何方关系不大，主要跟是否"华人"有关，似乎我们有着这样的优秀传统。只不过区别就是过去的统治者只要求对政权忠诚，不要求改变什么信仰。在毛泽东眼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其实他老人家是对的。五十年代给知识分子洗脑，我党采取的方式有些强迫性的，包括办各种各样的学习班，进革命大学如华北大革命去接受教育，参加土改工作队等等，如果还不能奏效就采取互相检举揭发、人人过关，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等等手段。但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这样，我们的知识分子往往拉出一副"谁不给我洗脑我跟谁玩命"的架势来，政府常常落后于群众。

就拿新中国 1951 年秋～1952 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称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来说，这是公认我党拿下知识分子的关键战役，其创意是来自知识分子本身而不是政府，是"我要改造"，而不是"要我改造"，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是积极主动地投身于这场运动，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对知识分子来说与生命同等重要的权利，而自觉自愿地皈依共产党政权要他们接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国家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是知识分子自己发动的。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当时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马寅初的信最后转给了毛泽东。最初北大教授们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希望毛主席到北大去讲一次，但毛主席不去。毛泽东在马寅初给周恩来的那封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像毛泽东这个级别的谋略大师完全知道"上赶着不是买卖"的道理，确实是这样，不去是对的，去则掉价。

9 月 29 日周恩来在学者们的一再呼吁下向京津几千名大学教师和学生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后来毛主席接过这一话题，他老人家从来对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是求之不得的。在 1951 年 10 月第一届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公开表态，称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日，《人民日报》也在首要位置发表题为《在高等教育机关认真实行思想改造和学习运动》的评论，把"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独立的生活资源，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钱伟长曾主动表态，作为知识分子，我们的基本态度很清楚，第一条是跟共产党走；第二条是接受思想改造。

本来在民国时期就已功成名就的全国高层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投身于这场运动，无保留地坦白交待以往大大小小的罪过，深挖这些罪过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争先恐后地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完全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研究、工作与生活。很多著名知识分子还现身说法，以引起其他知识分子内心的震动和共鸣。比如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费孝通先生在五零年初就写下并出版了《大学的改造》，这样有名的对大学充满着奴役和整肃色彩的书。当时还有一本书，名叫《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专门记述了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及要人怎样学习、改造以及转变的过程。而因其深刻、文字生动，因其作者都是大牌，既有号召力，亦有威慑力，所以很快就出版并供全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洗脑参考文献。

我现在看现代史人物，首先带上"洪洞县里没好人"这样的有色眼睛，如果发现了什么人还有点闪光的地方，就如同中了六合彩一样意外高兴，若相信中土尽是高风亮节之士、动辄拍案而起之类的神话，现在早就崩溃了。这也是传统社会和二杆子社会的一个区别，阮大铖之所以被人称为"裤子裆里阮"，是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裤子裆里硬"，毛时代还有谁硬啊？谁能举出个例子（活人）让我看看。郭沫若没有被人骂"裤子裆里弱"并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实在找不出"裤子裆里强"。

五十年代初，举世滔滔，只有陈寅恪等极个别人士，不识时务地坚守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阵地，至少在学术上保留对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选择权。其实也就是几年的事儿，后来很快也就彻底拿下。从此以后，整个国家民族就再也没有独立思考和批判体制的声音，甚至连私下发牢骚都很少。

有人把反右运动称为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搏"，其实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党国体制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衷心地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他们要表达的只是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第二种忠诚，响应号召提意见，只是因为摸不透毛主席的意图，上了"引蛇出洞"的当，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完全是两回事。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右派在 80 年代得到平反后满怀激情地歌颂党的英明，有些比其他人还要积极地捍卫 50 年代所形成的党国体制和"社会主义"理念。

八九年六四以后，我们学校作为重点单位组织爱党爱国教育报告会，效果最好的还不是找什么老红军、老革命，而是找历次运动中被母亲错打并且痛打、反复打、照着死里打而死里逃生的孩子。报告人只要把"连我这种被整得家破人亡的人还爱党爱国，你们还什么闹什么"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基本上就算是把听众彻底拿下了。而且这些人里面，确实有些（当然是少数）被错打的孩子，比母亲宠爱的孩子还爱母亲。像全国政协委员喻权域，就是"在 57 年被开除党籍，工资降了一半，月工资 32 块拿了 21 年"的老右派。那段时间，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特别是读马列著作"，终于在 1978 年恢复工作后，为党做出了各种巨大贡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发明了《美国人权状况报告》，二是在 2007 年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并明确说明，就是要专门收拾像袁伟时这样的文化汉奸。

2007 年 3 月，喻权域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现在中国好多人签名要建什么反右博物馆，我跟你说，我当了 21 年右派，我就不同意。你去看看，美国有没

有 3K 党博物馆，有没有麦卡锡主义博物馆?”，“我们什么都学美国，就是不学美国人怎么看自己的历史，美国人把自己历史上的丑事都掩盖了。”也不知这位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是怎么当的，他老人家连起码的授受关系还没有弄明白：麦卡锡博物馆应该相当于毛主席纪念堂才对。

从延安时期开始，针对知识分子的洗脑也就是“思想改造”，被比作“脱裤子，割尾巴”，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怕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杨绛《洗澡》）。其实我看脱裤子以后应该说割前边的东西更合适一些：把“割尾巴”中间那个字改成“鸡”，这样改动后仍然合辙押韵，而且符合主席语言特点。话虽然粗了一些，但这种形容更贴切。首先人类没有尾巴，早退化掉了，或者就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经过“去势”这样的处理后，知识分子就成了阉人、废人。去势之后的知识分子除了和太监一样跪在地上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问候主子吉祥以外就不会说别的话，不信可以对比一下郭沫若解放前后的文章和诗词。搞自然科学的也是一样，凡是和毛泽东思想一沾上边，马上就丧失思考能力，和什么科学发现、发明、创造都不再发生任何联系，真是灵验极了。

和太监的不同之处是太监那“宝贝”割下后还可自己收藏起来，待出宫为民或终年之后还可以“完璧归赵”，还一个全身，也体现朝廷的一种最终关怀。而我党以前没有这项政策，现在人道主义影响下也开始实行了。所以，很多人一旦退休或出国后，想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认真思考些问题，然后痛痛快快说几句大实话，我看谢韬、高文谦、杨继绳都是这么干的，按这些老干部、知识分子自己的说法就是所谓“两头真”，实际上也就是“还一个全身”。杨继绳身在国内，在《墓碑》一书中居然连“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的句子也敢写。当然，这次只是说不会、不能思考的问题，这里面还包括不敢说的问题。不过，有些人即使身在国外，也仍然会得出大饥荒没有饿死过人的结论来。

我想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阉人都是因生活所迫，由父母强迫按在了台子上，让“小刀张儿”给劁掉的。也有些是自己要求这么干的，还有些是半推半就。我在国外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是采访一个刚做完去势手术的变性人，他（她）告诉记者说，自己从来对男欢女爱的事情就不感兴趣，手术前胯裆里总是有一堆东西晃来晃去，很麻烦，很苦恼；手术完以后，轻轻松松做人的感觉，真爽！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讲，动粗还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就打断脊梁的手段和花样而言，中国历来都是远远领先世界的。就斯大林、毛主席和金家父子而言，也是“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我想用比较的方式介绍一下，看看能不能比出个高低来。

杂谈二杆子(27):培养二杆子要分三步走(下)

金唢呐

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打断国民，尤其是绅士、知识分子的脊梁骨，

不如此，就无法建立起一个二杆子国家来。存在独立人格、自由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根本无法真正实现对国民的控制和使用。

打断脊梁骨的方法无非有以下几种：
1、肉体折磨，直至处决
2、服从党的利益
3、以家属要挟
4、侮辱人格

第一条包括"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体罚、严刑拷打、直至处决。这在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面说的不少了，古今中外都差不多，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第 2—4 条，则完全是具有二杆子特色的整人方法，在中国，则是集朱元璋、斯大林和群众运动之大成。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被领袖处决或被逼自杀之前，都是高呼"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离开人世的。

实例一：傅雷之死。1966 年 9 月 3 日傅雷夫妇在遭受红卫兵的搜家和侮辱后双双自缢身亡。傅雷留下的遗书中写道："......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是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该自动推出历史舞台了！"
实例二：翦伯赞之死。翦伯赞是著名的党员史学家，1968 年 12 月 19 日在遭受野蛮逼供后，翦伯赞与其夫人一起服用大量"速可眠"离开人世。翦伯赞死后，人们从他穿着的中山装左右口袋里，搜出两张字条，其中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则写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实例三：邓拓之死。邓拓早年参加革命，是中共党内负盛名的才子。他对妻儿的遗书中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苏联也不例外，莫斯科的三次大审判中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下对阁下的仰慕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让斯大林在包厢里过足了瘾。

按道理，人要死了，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宣泄自己的愤懑之情的，尽管苏联秘密警察很残暴，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景观，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三条，一是认为自己有罪该死；二是怕连累家属；三是肉体、精力、精神受到无情践踏和摧毁，痛苦得生不如死，自尊、信心丧失殆尽，精神失常。

当年托洛茨基说过一句话："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在苏共和中共，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非常具体，就是斯大林和毛主席。记得庐山会议彭德怀和毛主席对着干，最后毛主席理屈词穷，就要光棍，给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搁下一句话，意思是：如果

解放军听彭的，那我就走，上井冈山。后来又说，那我就去找红军（此处指苏联红军）。最后老彭和批判老彭的人都知道谁是对的，但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彭德怀不但要受到全党批判，自己也心甘情愿地认错，并表示要到三线去改造自己。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斯大林收拾列宁战友的时候。莫洛托夫代表组织去找季诺维也夫谈话："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株连九族历来是封建社会收拾异己的手段。只不过斯大林和毛主席又玩出了新的花样。

斯大林收拾列宁战友的时候，先是不动声色，靠组织表决击败托洛茨基，把他驱逐出境。后又与布哈林结盟，将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逐出权力中心。等到搞起集体化来，他又收拾了布哈林。最后他乾脆利用基洛夫被刺案，把已然去职的季、加、布等统统下在狱中百般拷打，逼他们承认自己是外国奸细。

一开始这些人还很"坚强"，斯大林马上将他们的家属全部抓起来，并专门修改了苏联刑法，规定处决"反革命"不受年龄限制，这就是说可以枪毙布哈林等人尚未成年的孩子。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就被逮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上述三人终于屈服了。布哈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斯大林最后当面给予他们这个保证，并欺骗他们说只要他们一认罪，他立刻就下特赦令，放他们回家去过平民生涯。

等到交易达成，斯大林便命令秘密警察停止用刑，以大鱼大肉侍候那些"老革命"，直到他们的外表再也看不出受过刑的痕迹来。接着，便在莫斯科举行公开审判。那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法庭没出示任何证据，被告们却争先恐后地抢着认罪，并痛骂像自己这样的败类不配活在人间，申请政府枪毙自己，以平民愤，大快人心。斯大林藏在一个秘密包厢里，心满意足、津津有味地欣赏当初的竞争对手们丑态百出。等到审判结束，他就应"罪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立刻下令处决了所有的"罪犯"，而且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的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是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部分被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活过了斯大林时代。

当年中国的右派萧乾在文革中自杀未成而勉强活下来，妻子转告他说，人们对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未有任何愤激之词表示不解。萧乾的解释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啊。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

即使没有后代的彭德怀、周恩来之辈，毛主席照样有办法收拾。和斯大林相比，毛主席的做法有下列几点不同：
1、毛主席更注重从精神上征服对手而不是肉体上消灭对手；2、斯大林采取的办法是杀鸡给猴看，而毛主席的做法是将退毛鸡给猴看；3、斯大林依靠专业化队

伍，而毛主席却把这活计更多的交给了群众，认为革命家的任务不过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而且毛主席反复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鼓励群众的过火行为，一生中最瞧不起的就是叶公好龙。对待滥杀滥砍的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历来都是毛主席和其他中共领袖的区别。

就说土改吧，斯大林搞土改是使用了军队来消灭敢于反抗的地主武装，但允许地主逃亡。细想想这也对，土改的目的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一旦地主离开了土地，还叫地主么？而毛主席则有两点不同，一是精神折磨、思想批判重于肉体消灭，二是土地国有分三步走，先是承诺把土地分给农民，煽动起农民斗争地主和大干社会主义的高涨革命热情，然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最后把土地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终于实现了杨继绳先生所说的，"自从出了毛皇帝，风调雨顺也饥荒"。

早在 20 年代，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乡绅最怕农会给他们戴高帽游街，因为一游街"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旦失去了颜面，从此不能做人，便可从精神上彻底摧垮对手。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此改变一个社会。为什么 49 年前后知识分子会主动申请思想改造，其实真正让他们胆寒的，"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千百万经过洗脑的群众、千百万毫无道德法律约束的群众。他们害怕的不是子弹，况且老蒋根本不敢大开杀戒。40 年代末面对旨在颠覆政权（即推翻黑暗统治）的学生运动，掐着指头算来算去，不过就是闻一多、李公朴这么几个人，连后来四五、六四的零头也比不上。

毛主席的办法，就是把乡绅交给群众，并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让他们威风扫地，从此再也抬不起头来，从根本上剥夺他们的话语权。而广大农民，不仅仅从地主那里获得了土地（尽管很快就被收回了），更重要的是从斗地主的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而根据我在下乡时所接触到的地主，他们别说什么报仇雪恨，连生存的欲望都快没有了，身体的各个部位，从大脑、腺体到肌肉，完全萎缩了一样，完全是一副猥琐可怜的模样。

群众运动给我刺激最深的还是彭德怀和王光美。我以前对于彭德怀的印象来自于我在文革中在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彭德怀的漫画和照片。漫画我已经找不到了，只记得画面上有个土匪模样的家伙，光着上身，露出胸毛，噘着大嘴抡圆了膀子在那儿甩土豆，嘴上唾沫星子乱溅，底下是一行字：你有你的原子弹、氢弹，我有我的山药蛋。还有就是文革期间老彭挨斗时的照片，当时很多红卫兵小报上都登过，我把它搜了出来附在下面。彭德怀给我的印象是相貌丑陋、猥琐卑鄙、无耻下贱，完全就是个地痞流氓的模样，当时就觉得恶心，觉得中国人的颜面都让这些丑类给糟蹋尽了。恨不能生双翅飞到批斗现场，即使不能踢上两脚打上几拳，吐口唾沫也算出了这口气。

老毛死后，彭德怀平反，各种版本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彭德怀"也先后问世。以后看到彭总穿元帅服的照片，虽然嘴巴突出了些，气质土了些，但也是一副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元帅相。就是这个彭德怀，是我党以"硬"著称的钢铁元帅，一

路腥风血雨杀过来，"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功劳"。老毛一句"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固然有拉拢下属为我所用的成分，但确实也说出了彭总的特点。以后出征朝鲜，即使两栖作战专家麦克阿瑟也没有让老彭放在眼里；在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彭德怀与毛泽东对骂"操娘"："在延安你操了我 40 天的娘，现在我操你 20 天的娘还不行吗?"；在李志绥的回忆录里，又是唯一敢见君不跪、私闯大殿、咆哮龙庭的铮铮硬汉。这叫人想不通，老彭什么没见过，死都死过多少回了，还会屈服文革小将那点小儿科的玩意儿，怎么就能给整成了这般模样？

当年老毛就是和当年在农村收拾地主富农一样，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小将。最早是五大红卫兵领袖之一韩爱晶在北京地质学院开会揪斗彭德怀。会上，年近七旬的彭德怀被拳打脚踢，"打翻在地"七次。后来，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并有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亲自出席的情况下，又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举行了号称十万人的批斗大会。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张闻天等人。彭德怀重伤未愈，又添新伤，他的衣裤被撕打破了，两脚上一只脚穿着棉鞋，一只脚穿着草鞋，胸前挂着大黑牌，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弯腰九十度。批斗之后，他们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五花大绑，插着长长的箭标，押在人群中"示众"。刚走不远，彭、张二位老人就倒在地上了。彭德怀在地上喃喃地说："让我休息一下......我想喝口水，一口水，一口水......"没人给彭德怀一口水喝，招来的是暴徒们恶狠狠的叫骂，并吐去了一口口唾沫......接着，彭、张被人抬起来，扔进了游斗的大卡车，向市中心开去。当卡车经过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大街时，一左一右两个彪形大汉押住了他，强按下他的头。其他的被游斗者都有头发，是被人揪着头发按下头的，只有彭德怀剔着光头，没有头发可揪，而被一左一右的两个彪形大汉抠住了眼睛往下按。这种景象，其他钢铁元帅看了后会有什么感觉？所以林彪宁可出逃敌国蒙古，宁可机毁人亡也不愿意落在毛主席手里。

在纪登奎（文革后期的副总理）、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等所写的文章里都提到这样一个情节：

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
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的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在纪登奎这样一个晚辈面前如此恸哭失态的。

关于周恩来为什么失声痛哭，人们有多种推测。我认为比较靠谱的就是林彪死了，而毛主席"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下一个对象就应该轮到周恩来。周恩来知道毛的厉害，自从毛主席遵义会议上台后，终生不当第二把手，先是张闻天博古，后有刘少奇林彪，现在中间突然没有了缓冲带，如何是好？好在"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以后有老邓复出，成为实际上的二把手，才让周松了口气。

周恩来怕毛主席恐怕是公认的事实。周恩来怕什么？我想不是死亡，这些老共产党员都是腥风血雨闯过来的，这些见的多了；总理没有后代，也不存在子女遭殃的问题。他害怕的首先是在历史上的身败名裂，凭着毛主席的常用手段，"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完全可以把周恩来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把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所有的失误，一股脑都扣在周恩来身上，大概这些对毛主席来说毫无难度。周恩来也深知，在专制国家历史怎么写跟人民没什么关系，完全是温顺的小姑娘，任领袖打扮。老老实实听话，你可以做你的好总理，流芳百世；不听话你就是历次错误路线的总代表，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人相食"的罪魁祸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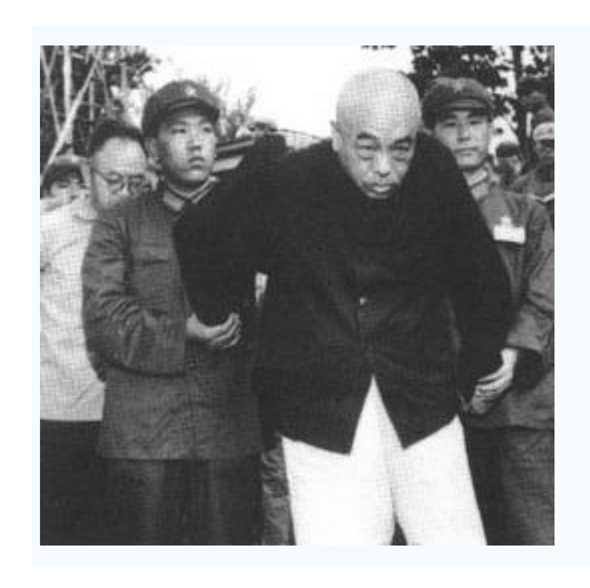
再一个可能就是周恩来害怕面对毫无道德法律约束的群众运动。而且周恐怕比彭德怀之类更害怕群众运动。俗话说孔雀比乌鸦更珍惜羽毛，若放一瓶浓硫酸在阿兰的龙和钟楼怪人跟前试试，肯定是前者先吓得筛糠。我想，毛主席如果收拾周恩来的话，一定不会"那样文质彬彬，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绝不会犯老蒋的错误，让周恩来像当年的陈公博、楮民谊受审一样显出什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高雅通脱来。因为毛主席深知人性的弱点，完全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就外貌而言，周恩来的身上完美地融合了南方人的敏感细腻与北方人的豪爽粗狂。明明是俊的可以演坤角（周恩来在求学时一直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而且还演过戏，扮过坤角）却还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在延安还号称美髯公，确实是千百年出一个的人才。有欧洲教育背景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在 1955 年在北京拜见周恩来后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是野蛮人。"其实不管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只要剃了阴阳头，坐上喷气式（就是把人头往下按，胳膊向后向上拉直，脸面向革命群众），脸上再打个黑叉，都是一球样。

王光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虽然现在也不觉得王光美有多漂亮（只是个人印象，因为觉得她和刘主席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门牙稍大，并少许前突。俗语曰：对象对象，越对越像），可看看无论是什么人写的红太阳回忆录里，只要提到中南海舞池，一定要把王光美大写特写一番，说气质如何高贵优雅，魅力如何四射，连上海滩明星江青居然也吃王光美的醋，可见确实了得。以后央视小开赵忠祥也为七十多岁王光美的"典雅华贵"气质所折服，近距离采访王光美以后，终于明白了"一位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应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赵忠祥《岁月随想》），可见确实气质不俗。可文革中王光美挨斗的照片看的不少，她给我的印象是其丑无比，是演《丑女无敌》中林无敌的不二人选。我记得 70 年代初我们那儿有位大哥别人给介绍了个对象，见面后告诉介绍人说，那女的"丑的跟王光美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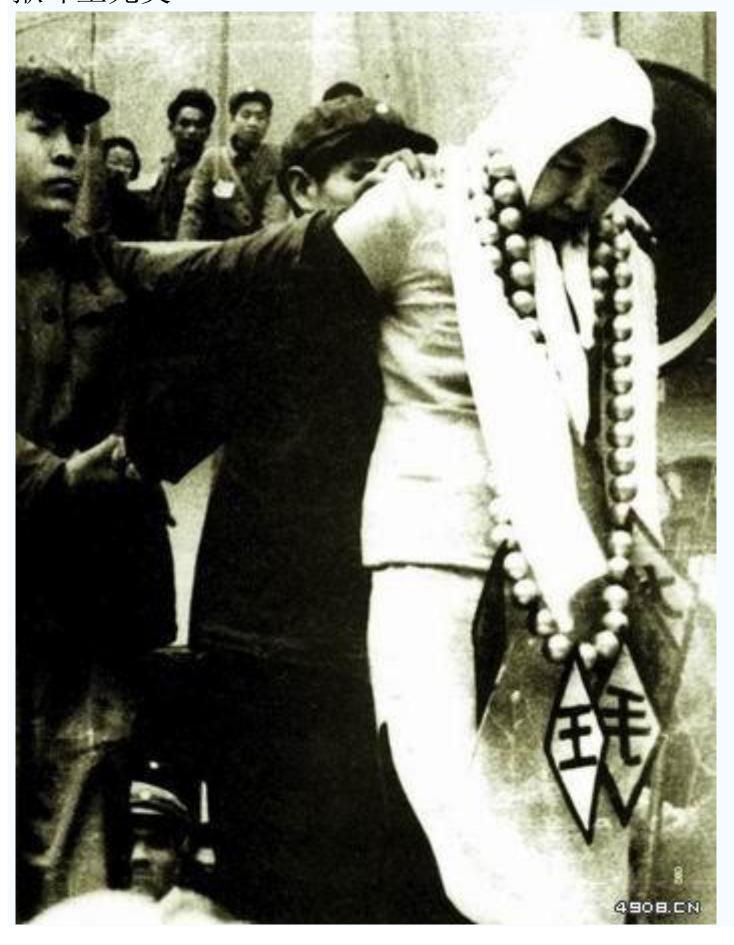
在毛主席的语录里，出现最多的大概就是"人民"或是"群众"。而且我看过不少回忆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从不同侧面提到过毛主席和群众的感情。人民群众受苦受难流血牺牲老人家还不怎么在意，但每出现"压制群众"的情况，老人家都表现出无比的愤怒。我觉得毛主席并不是在演戏，这是真实感情的流露，他老人家确实和中国的人民群众有着极深厚的感情。在毛主席看来，二杆子安身立命靠的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民智未开的群众。他老人家认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语录）。有了他们，就没有什么攻不破的堡垒，啃不掉的骨头，打不断的脊梁。

揪斗彭德怀





揪斗王光美



又得麻烦自治区主席了，没办法，代理服务器使起来就是不如直接上网顺手，奇慢无比不说，有些东西还打不开。不过不贴也无所谓，贴上无非是给小青年增加点感性认识。一定注意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贴贴试试，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干，拜托拜托。"（注）。谢谢！

注：此话参考周恩来逝世前写给张玉凤的便条：

玉凤同志：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杂谈二杆子(2😎: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上)

金唢呐

二杆子系列在芦区推出后，沧浪之水网友提出是"公有制消除了知识分子形成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而后又依仗强大的武力和铺天盖地的人民运动方式，彻底泯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前河边网友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希望我从公有制角度说明一下二杆子的发生机制。沧浪网友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想补充的是，二杆子社会这种公有制不仅仅是剥夺了公民的财产，而且同时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观念。

过去的中国农村很多人都没有财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实际上这些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受政府或者雇主的控制，如未庄的阿 Q 就是一例。"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这在文革时期，是典型的盲流，是农村民兵、城市联防和车站派出所重点收拾对象。

传统社会里边远一点的农村，连皇帝是谁都不知道。"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真的有可能存在。因为过去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后来秦晖先生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毛主席清楚地知道，"不破不立"，不打破过去"国权不下县"的社会结构，就根本无法实现对广大农民的真正控制，"全国一盘棋"、"北京喜讯到边寨"

就只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他理想的农村生活是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段话：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后来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自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 70 年代通过的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确认："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政社合一"在毛时代的概念就是公社以下的各级生产组织同时可以实施专政功能，凡是不顺从高指标和军事化管理的人均可作为"阶级敌人"对待。

如果单从剥夺地主财产的角度看，对于 40 年代末枪杆子在握的中共政权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仅仅收回土地，并不能真正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还不能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是以县令为终端的，而且清朝以前的县官还实行回避制度，县官大都是两眼一抹黑的"外来干部"，师爷还要县官自己花钱雇，他们实施政务和确保治安（具体说就是派丁纳粮断案三件事）只能依赖本地的乡绅。也就是在县以下的乡里通过"有官衔无俸禄"，或"无官衔无俸禄"等方式，在村庄内部寻找代理人，国家权力以间接的形式进入乡村，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生活。乡村救济、秩序维持、司法调解、乡村治安都靠乡绅和宗族，而乡绅又是从草根族群的德望人缘中产生的长老，与国家官僚体制无关。

由于乡村的有效管理主要靠的是乡绅和宗族，所以一个县即使只有一个县官，处理日常工作也是绰绰有余。这就出现了古代许多县令同时是诗人骚客，像陶渊明就是彭泽的县令，这就是后人称他为"陶彭泽"的缘由。彭泽县还不是小县，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彭泽、湖口县全境，都昌县及安徽属宿松、望江、东至一部，以"彭蠡泽（今鄱阳湖）在西"而得名。《归去来兮》的序言说明了他做县令的缘由：家贫，人口多，负担重；自己别无长处，缺乏其它谋生赚钱手段；叔叔推荐。还有一条没说的，就是没事儿爱喝两口。上任以后也没见"陶彭泽"干什么事儿，一天到晚就是饮酒作诗采菊花，连出去迎接浔阳郡送来红头文件还一肚子牢骚。

由于很多县令在任上无事可做，所以有闲暇经常自费外出游历。那时交通工具也不发达，没什么北京—上海朝发夕至，人家照样一走就是大半个中国。按说这县里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征收赋税、摊派徭役都是些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的事儿，动辄"十丁抽一丁"，就拿秦朝来说，根据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筑长城假定五十万，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现在哪个县的公务员不得上万，而且县以下还有一堆公社大队干部，我记得过去农村大队干部去县里开会时都是说开"五级干部会议"，这五级干部就是县、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县里还有所谓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不说，且宪特齐备，必要时候还要麻烦当地驻军。即使这样，碰到"收粮、征地、刮宫、引产"不顺利的时候，还要黑白两道齐上，黑势力马仔的也成了不

可或缺的力量。农村的工作确实非常复杂，我记得当年有一个部队专业干部就感慨说，原来总是说县团级，今天才知道管理一个县比带十个团的大头兵都难。

孔孟之道以及传统的礼法家训、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风水如何转，今年到谁家，普通民众依旧过自己的小日子，满足于"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和官府的政治生活保持着距离，对国事不屑一顾，觉得"帝力与我何有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古代农民造反的原因我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众多，只要出现天灾和战乱，或者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所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只好揭竿而起，通过砍砍杀杀减少一部分吃饭的脑袋来解决问题，然后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所以不管是哪个新皇帝，登基后的头几年一定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只要没有战乱和天灾，相对于游牧民族的骁勇强悍，农耕社会的生活既稳定又有规律。《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人"逐水草迁从，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而农耕人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再加上治理有序的乡里制度，使乡村社会形成了互相隔绝与孤立的状态。即使是杀人如麻、制造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张献忠，实际上对传统社会的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冲击。

不少地主或多或少都要做点善事，他为了自己在当地的生存必须做善事，也需要做善事。一来是图个善有善报，二来也为自己在当地赚个人缘，以往传统社会农村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当地的乡绅干的。如遇灾年，还要开仓济赈，遇时疫流行则要施舍药物。过去的人都很在乎脸面，很在乎穷人的评价和口碑。很多地主在当地都被人称作是"大善人"。土改开始时，穷人和富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仇恨，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回忆说，当年斗地主的时候，孙家是贫农，孙大午母亲白天从地主家扛回粮食，晚上却又亲自把粮食扛回地主家。年幼的孙大午对此不解，他母亲解释说："人家富，是人家挣的；我们穷，是我们不好好的过。"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那几个大地主平遥的乔家、灵石的王家、万荣的李家都差不多，乔家每天在家门口栓三头牛，谁家要用就牵去，傍晚送还就是了。李家更是远近闻名的李善人。到了分土地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没有肆意"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所以才将这些山西的古迹保存了下来。四川地主刘文采，实际上也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在当地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当年土改时的工作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启发觉悟，揭开这些大善人的真实面目。

杂谈二杆子(29):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下)

金唢呐

我并不是说过去这种县令—胥吏—乡绅的社会结构就都合理。因为"国权不下县"不光是国家基本上"不管县以下的事"，还意味着朝廷很少为"县以下"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福利保障、承担社会责任、履行服务义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责权都是一致的）。若要在全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显然要改变这种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隔绝孤立状态。民国期间，国民党标榜的"党治"，其中就包括在部分省份建立了县党部和区分部，但国民党没有做到"支部建在生产队"，县党部和区分部往往需要与乡绅

合作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乡绅的权威没有受太大的影响。现在日本和台湾的农协，也还多少有点这个意思。说起来国民党确实不能算一个现代政党，它的很多做法都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相似，过去统治者多很在意对士绅阶层的培育和保护，即使异族如满人入关，也不敢去动江南的缙绅门第。

还有就是乡绅与官府勾结，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问题。这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记载。我认为乡绅中肯定存在这种现象，一定会有勾结官府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的劣绅。但就发生率来说，恐怕要远远低于后来的大队支部书记。从常理上讲，村民信任的大多是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因为士绅阶层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像毛时代树立的几个支部书记典型，大寨陈永贵，遵化王国藩，陕西王保京，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邱庄禹作敏，南街村村委会主任，几乎不是本人就是儿子，最后都查出一堆的问题。记得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山西日报曾有过一文《虎头山下一只虎》说的是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有一次去看电影，昔阳县人民银行的一个司机，挡住了他的路，回去叫了一帮人把那司机活活打死的事。这只是他们作恶的一部分，该文还揭露出好多陈家的恶史。而在全国成千上万个地主里面揪出的几个典型：四十年代的黄世仁，五十年代的南霸天周扒皮，六十年代的刘文彩，后来证明无一不是虚构的。

就拿鲁迅小说《阿 Q 正传》来说，这是公认的"深刻地揭露了、有力地鞭挞了、无情地嘲笑了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赵老太爷和钱老太爷"。如果说这些人代表了封建保守势力我倒是承认，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觉悟，没有什么民主自由革命的新思想，不懂马列主义，没听说过物竞天择适之，更不会"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未庄村民（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但就个人人品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他们完全凭借个人实力，掌握着未庄的话语权。不管政治是如何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不管城里如何变幻大王旗，赵老太爷和钱老太爷们都在代行政府职责，让未庄村民悠闲地坐着"长凳"，晒太阳，捉虱子，吃放着半寸长葱叶的油煎大头鱼，维持未庄的安定和谐局面。在传统社会里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就是依赖赵老太爷和钱老太爷这样的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这些人很在意自己的名声，一般也不胡来，就说《阿 Q 正传》中阿 Q 挨打，好像赵钱两家都没什么错。

阿 Q 被王胡打是因为两人赤着膊比捉虱子，阿 Q 比王胡卫生条件稍好一些，捉到的虱子数量和个头都不及王胡，所以自己前去挑战去找打；和小 D 对打，是阿 Q 认为小 D 是"畜生"而小 D 最多让步到"虫豸"，最后两人互揪辫根。无论和王胡还是小 D，都是没什么由头的闲汉斗殴。

而赵老太爷打阿 Q 则不然，是因为阿 Q 调戏小孤孀吴妈在先（典型的性骚扰），这一竹杠完全是为无权无势的弱女子伸张正义，而且量刑适中，不过就是大竹杠"打在指节上，这可很有一些痛。"。挨"假洋鬼子"哭丧棒的打是因为阿 Q 骂人在先，而且是污蔑剪辫子的革命行动。即使抛去政治因素不说，这么骂人放在哪儿也得挨揍。不信胡锦涛将来参加峰会时对着奥巴马说一句"秃儿。驴……"试试，哪怕马上指着近旁的麻生太郎分辩说"我说他！"，真洋鬼子（尤其是美国黑鬼子）也照样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倒是现在，像赵老太爷这样的有钱人家已经不太多见了，和小孤孀吴妈困觉大概轮不上阿 Q，赵家的公子们自己都不一定够用。那个反对取消户籍制度的温铁军曾提出建议，"乡政府改乡公所，村镇并列自治"、"乡以下实行村自治"；中国农村需要自治，需要建立非政府的社区组织像农会、农业合作社以及扶贫济困的民间慈善组织等，已经是共识。可现在没那么容易了，农村早已经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基础，相当比例的乡绅都是靠坑蒙拐骗起家的暴发户，有的干脆是黑势力。现在村民直选试点，不少都是打得天翻地覆，作弊贿选还算客气，弄不好黑势力马仔还要登场，有些村支书本人就是黑势力的老大。

实现毛主席提出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就是把县令、胥吏、乡绅统统变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人民勤务员"（实为"领袖勤务员"）。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把原有的乡绅批倒斗臭，把赵老太爷钱老太爷们交给阿 Q 们，先把钱家人都剃成秃儿驴，再问问赵家到底是谁不配姓赵，然后抡圆了大竹杠、哭丧棒，拍！拍拍！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让他们威信扫地，再踏上一只脚，世代不得翻身。

像国民党建立县党部和区分部的做法显然不合毛主席的口味，毛主席不管打仗还是搞建设、科研，向来喜欢人海战术，主张九个指头对一个指头。土改的具体做法就是抽调方方面面的人员，组成各种各样的土改工作队轮流到农村搞土改。不信诸位可以到农村问问，哪个村都是来过好几拨的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队队员包括部队干部战士、青年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大学教授各色人不等，这些外来户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可以挨家挨户做工作，而且和当地村民无亲缘关系，下的去手，战斗力强，可以照死里整这些地富，使得农村传统的自治力量彻底崩溃。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就这么干还不行，最后采取张家庄的农民去斗李家村的地主，李家村的农民来收拾张家庄的富农，连最激进的左派经济学家郎咸平对这样的土改也看不下去，他认为这种土改是中国变成人吃人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土地改革将地主阶层一扫而空，我绝不否认恶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阶层，也就是以前的乡绅，在中国文化中是中华礼教的维护者。"、"地主阶级不分好坏地全部清除，其结果却使得广大农民不知何为礼教。"

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土改终于搞起来了，全国上下做到了无一村漏网、无一户漏网、无一人漏网，传统社会的"国权不下县"彻底作古，建立了以意识形态挂帅、中央集权、行政命令、等级官僚制为特征的一种国家制度。就像张鸣先生指出的：土地革命将农村的权力结构翻了过来，将所有原来的富人统统打翻在地，成为农村中新的"贱民"阶层，原来农村的"能人"只有最没有文化的那一部分进入了权力中心，成为新时代的主宰，经济能力和文化资源的缺失使得乡村权力架构对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依赖加大，而国家政权正好借此建立健全了一套全能式的绑在国家战车上的基层政权体系，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的一切。

说了半天，我的意思是不要光看到土改死了多少人，如何剥夺了公民的财产，而且还要看到毛式土改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是把旧世界打了个落花流水。

现在农村又不一样了。改革开放初期，公社大队书记们一片骂声，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其实就是一句话，农民们都自己种地，还要我们干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 实际上就是怕再出现“国权不下县”，自己被架空。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又乐了，毛主席留下党政组织是介入经济领域的基本工具，地方政府又将企业和土地资源的调配纳入行政管理范围，党、政、企三者结成了具有共同利益的官商结合集团，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大家走到一起来了，毛时代的政治精英由此转变成为今天的经济能人。现在官僚集团内部也没有了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之分，不管出台什么政策，都绝不能少了喂养尺蠖这一条。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其他集团阶层的利益。为了让尺蠖们吃的更足实一点，客观上也出台了不少促进生产力发展、利国利民的政策和措施，本质上是各阶层跟着尺蠖一起受益。

杂谈二杆子(30):山高谁为峰?(上)

金唢呐

有网友提出让我比较一下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我觉得干这活超出了我的能力，我的印象是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很难分出个优劣来。斯大林、金家父子和咱们的毛主席，都是收拾人、忽悠人、控制人的高手。朝鲜太小，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金家父子在吹牛撒谎方面无疑有特殊的天赋。就斯大林和毛主席来说，都是横亘在人类“二杆子”历史上的两座高山，令后人难以超越。两人有各自的特点，前者明朗，后者暧昧；前者残忍，后者慈祥；前者死板，后者灵活，前者简单快捷，后者复杂浪漫，前者枯燥乏味，后者妙趣横生。

斯大林个性的突出特点就是他那粗暴残忍。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他满腹狐疑，几乎到了变态的程度。赫鲁晓夫的报告曾引用“列宁遗嘱”对斯大林的评价：“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杀起人来，连自己的亲戚也不放过。斯大林两个妻子的至少十名亲属被他下令枪决或被关进集中营，年轻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也因为不堪忍受丈夫的暴虐而神秘自杀（另一说法是斯大林杀的，或说是他指使人杀的）。三个儿女没一个有好下场的。老大二战中被德国军队捉去，德军提出要互换战俘，被斯大林拒绝，最后死在一所德国的俘虏营中。小儿子是苏联空军部队的军官，后来变成了酒鬼，在屡次汹酒犯事之后被流放，直到客死他乡。斯大林的女儿生活糜烂，也曾被斯大林劳改，1967 年逃到美国。斯大林有八个孙子孙女，斯大林也只见过其中三个，对天伦之乐、儿女情长之类的事情毫无兴趣。

但是斯大林有卓绝的才干，精力旺盛，思路敏捷，智慧超群，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性格。若人的尊严、人的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计的话，斯大林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治国天才，完全无愧于当时被称为“苏联人民天才的父亲”。

记得民间历史学家赵无眠曾经作了一个中国王朝大排名，对排名本身我虽然没什么兴趣，但他把历史研究引入了“定量”计算的轨道（现在大陆评职称都是采取这个办

法，如省级杂志论文第一作者3分，国家级杂志6分.....，第二作者乘0.7系数，满50分可晋升教授，100分可做博导）。具体说，就是定出12个具体指标，然后打分，满分为128分。按赵无眠计算公式算出来的结果是清朝最高（估计赵无眠回国定要被"掌掴"无疑），以后依次是：清（124），汉（87），唐（80），宋（74），明（64），元（58），隋（45），秦（29）晋（15）。

赵无眠定的这12个指标分别是：疆域、国祚、军事、皇帝、摄政、治世、变乱、纲纪、宫廷、效能、人口、民生、民族、文化、影响、结局，尽管概念重叠的一塌糊涂，而且有些指标不知道给分标准是什么的，但按照人家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毕竟还算不太离谱。若用这个公式计算一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肯定能排世界第一。就"疆域"而言，斯大林的当政中，俄国获得了波兰东部，波罗的海，北科维纳，比萨赞比亚，夺回了萨哈林半岛南部；若论"影响"，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重新支配东欧，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以后又通过朝鲜战争影响了东亚，使社会主义阵营人数在世界上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超过西方阵营。

而毛泽东则完全不同，对此，老芦曾有这样三条总结：
论谋反作乱、抢班夺权，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论正经治国，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白痴；
论卖国，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卖国贼。

这第一条未见有太大的争论，第二条有人不同意。若按照赵氏公式计算一下就知道此话不谬，毛主席大概能拿分的主要就是人口一项，这恐怕还是托了新式接生法、疫苗、抗生素问世的福。这里面我不大同意老芦的是"卖国"这个词。卖国大多数情况都是强敌当前，割地赔款、买静求安。像清末慈禧老太太就是这么干的。虽然租借出了台湾、香港、澳门列岛，但毕竟还保住了大陆主体，成为二战前除日本和同盟国泰国以外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而且后来这些地方都先后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还有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阿拉斯加，国务卿斯沃德（William H. Seward）1867年从俄国人手里以720万美元（合2分钱/英亩）的超级便宜的价格买下了阿拉斯加，即使如此，当时美国多数人都认为Seward不识货，让老毛子坑了，赔大发了，在美国国内对于Seward是一片冷嘲热讽，把阿拉斯加称为斯沃德冰盒子，称购买阿拉斯加的行为是"斯沃德蠢行"，后来发现了金矿，美国全国上下又都盛赞斯沃德识货，是N年出一个的战略家，还是个砍价高手。此事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今天做过些英语"阅读与理解"练习题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Seward's ice box"、"Seward Folly"的。即使这样，老毛子再怎么赔，也还有实实在在的720万美元的进账。

不管上述哪种情况，只要是"卖"，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得有点进账才对。就拿藏南旺达地区那九万平方公里土地来说，谁能告诉我中国获得了什么利益？阿三出了什么价钱？自从60年代初的自卫反击战以后，阿三就陆续"进入"藏南地区（记得当年日本篡改教科书就是把侵略改成了进入，中国政府和人民明察秋毫，强烈抗议），现在已经多达几百万，这是个连中国政府都承认的事实。只是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只能用"后勤保障困难，被迫放弃"来搪塞民众。慈禧太后、老袁、老蒋那些年代后勤保障难道就顺畅？怎么人家就没有丢掉这片国土啊？

所以我想，把老芦这句话若改成这样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论慷慨大方，他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送地、送钱娘娘。况且毛主席“南人北相”、“男人女相”，毛主席是男人魁梧身材，却女人长相，说话有几分娘娘腔，“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比喻成大慈大悲的送地、送钱娘娘可能更形象一些。佛教中，菩萨娘娘本身是男是女也还含糊。原来我一直以为观音菩萨是一位美丽端庄，大慈大悲，神通广大，普救一切众生的佛教女神。后来听行家说，观音菩萨实际上是一位男神，一开始我还怀疑，后来我也相信了，因为看到有些塑像都是上身裸露，穿着半透明的袈裟自腰间下垂，并未见到女性特征。以后又上网查了一下，说男说女的都有，而且说的都有道理。

斯大林这点与毛主席完全不同。斯大林时刻考虑的是如何为俄罗斯获取最大利益。在苏联国力还不强的时候，斯大林想尽办法与西方国家建立缓和的国家关系，尽可能从中获取资金和技术发展国家实力，力避冲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出头”、“不抗旗”，一副无辜无害的样子。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 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 2/3 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当国力增强有足够实力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对外侵略扩张，获得实际利益。常常是胡萝卜加大棒，是欺诈和暗算的行家里手。我印象中，除了与希特勒的外交中还互有胜负以外，无论是对付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蒋介石的国府还是毛主席的新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小兄弟，他都能应付自如，尽情的敲打欺骗，获取大片实际利益，都是大赢家。

毛主席一生并没有搞出什么原创性的理论，毛选里所有的理论要么就是来自马列，要么就是来自线装书。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官方认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版权。具体表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马克思没有预见到，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所以出了修正主义。而毛主席由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不过现在谁再跟毛左们提这档子事儿，这等于是臊人家：中国早就把赫鲁晓夫甩得没影了。要按照毛泽东在世时“变修”的概念，现在 13 亿中国人民个个都是修正主义分子。

但毛主席在控制人和改造人方面，确实是不世出的天才。这还不仅仅是造反夺权成功和稳稳做了二三十年龙椅宝座的问题。历史上农民起义成功的也有几起，干得都比老毛麻利，而且坐上龙椅后还可以世代相传，不像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那样，上来就把先帝的骨肉投入大狱，但谁也没有像毛主席一样创造出那么多流芳百世的经典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兼采众家之长，取其精髓，自成一体，在二杆子方法学和美学等方面的杰出贡献，确确实实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和斯大林这样的天才相比，论成就，老毛连斯大林的万分之一都不如，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即使没有牛顿，三大定律一样早晚要被发现。但是没有贝多芬、达芬奇，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欣赏到“命运交响曲”和“蒙娜丽莎”。斯大林式的人物早晚还会（至少是可能）出现，但毛主席却是千古绝唱，是上帝送给中国和世界的礼物。

杂谈二杆子(31):山高谁为峰?(中)

金唢呐

记得老芦曾问过，为什么西方人对斯大林和毛主席的态度不一样？对前者远比对后者更厌恶。我觉得如果我是个局外人（既非毛子也非华人），也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干的都是控制人的活计，但两人采用的方法截然不同，给人感觉斯大林浑身都是血腥味，而我们的毛主席永远都是那么温暖慈祥。虽然都是搞农业集体化，而且中国的人民公社饿死的人要超过苏联的集体农庄，但你可以控告斯大林犯下了"反人类罪"，而这么说毛主席就毫无道理。毛主席不仅没有"反人类"，而且完全是"顺人类"，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

在当今大陆，"如何请猫吃辣椒"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一段毛主席讲话，政界和商界的学术讲座中都特别爱引用这段，我本人就听过无数次。国内很多 MBA 的教科书或参考书里也把它收了进去，题目往往是"如何开拓市场"、"如何创造需求"，我想它确实能够说明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区别，"反人类"和"顺人类"的区别，下面就把这段摘录下来：

五十年代末的上海，毛主席召集刘少奇、周恩来讨论怎样收拾工商界（其实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农民），老毛还是采用惯用手法，先是云山雾罩的说个典故、讲个笑话，这次毛主席说的是如何让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巴，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毛主席摆了摆手："每件事都应该自觉自愿。"
周恩来回答说："我先让猫饿上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肉片里，如果猫在非常饿的情况下，会囫囵吞枣地把辣椒吃下去。"毛主席也不赞成这种手法。
那么，毛主席的策略是什么呢？他笑着说："这很容易，可以把辣椒捣烂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么做而兴奋不已。"

这段对话，可立见各人玩二杆子的特点。少奇同志的做法，完全是斯大林的做法，简单快捷高效，目的明确，几分钟就可以搞掂，而且没什么后遗症，但方法粗暴野蛮，令人厌恶。看来少奇苏联进修没有白去，处理问题很有点斯大林的味道。

而好总理的做法充满了人情味，和他的做人原则吻合，而且终生践行着这一处事原则：在刘少奇的处理意见上批"此人该杀"，然后私下安慰王光美；拱手将袍泽贺龙交给组织，在形势变化后又在追悼会上抱头痛哭。至于没事给右派送小米，给反革命送红枣更是拿手好戏。曾经有一位老知识分子对我说，周总理和其他人的最大不同就是有人情味，即使是整人，也看得出来他老人家是迫不得已的，不情愿的，所以我们理解和同情好总理。

我觉得这是否和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也有些关系。老芦曾经把英国人和法

国人放在一起做过比较，结论是法国人缺乏政治智慧。如果说是处理内政我完全同意，法国人确实不行。但法国是个最具有外交智慧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法国就打得都不怎么样，但最后都是趾高气昂的战胜国，该捞到手的什么也没落下。处理与美国、欧洲、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也不错，手段很高超，谁也不得罪；跟中国的关系最绝：一方面时时处处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自居，另一方面给台湾出售武器又卖得最多，赚得盆满钵满。又立牌坊又当婊子，什么也不耽误。对比日本人到处扔钱还挨骂，真是有天壤之别。

上述"猫吃辣椒"中最具艺术价值的，可以流芳千古的还是毛主席的做法："让猫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么做而兴奋不已！"。据国内营销大师们说，毛主席让猫吃辣椒的办法发人深思，猫本身并不吃辣椒，对辣椒这一产品没有需求，但是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充分利用猫的本能来创造需求，不仅让猫吃了辣椒，而且还高兴地要去买辣椒自己吃。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下这样做的远期效果：还可以让猫"舔屁成瘾"，一日不舔，如隔三秋。而要戒掉"舔屁瘾"，恐怕比戒毒还难。长期吸食毒品（此处指吗啡、海洛因之类的麻醉性毒品，而非可卡因、冰毒之类的兴奋性毒品）会让人产生躯体和精神上的依赖性，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成瘾"。成瘾后一旦脱离毒品就会产生出现戒断症状，轻者哈欠、流涕、流泪、出汗，重者剧痛、晕厥、休克。这玩意看着可怕，其实好对付，一般来说，戒毒者通过 10 天左右的治疗即可脱毒。可怕的是对毒品的精神依赖（俗称心瘾）往往长期存在。心瘾是导致复吸毒品的根本原因，也是世界医药学术界正在破解的难题。俗话说，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想毒。为什么会"终身想毒"，就是毒品可以给人带来强烈的快感，按照医学界的说法，如果把性事的快感当作一，那么吸毒产生的快感就是十。依我看，"舔屁"的快感应该是一百。而且吸毒只是一人痛快，对周围没什么感染，更没什么遗传。而"舔屁"可通过口传身授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会后继乏人。

斯大林的做法虽然粗暴野蛮、代价惨重，但目的明确，成效显著。20 年代末斯大林就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在 10～15 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当时俄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折腾，本来就落后于西方的俄国更加贫弱。要实现高速的工业化，首先需要大量的钱。这些钱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俄罗斯国库固有的吗？也不是。对几乎一无所有的俄国来说，建设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只能拿地里打出的粮食和原材料去淘换。但俄罗斯农民都是倔杠子，绝不会轻易交出粮食。他们曾嘲笑亲自下乡收粮的斯大林："你要给俺们跳个舞，俺们兴许给你点粮食"。斯大林当然不会去跳舞，而是采用少奇同志说的"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巴，然后用筷子捅下去。"的强硬办法。

为了使苏联成为工业强国，斯大林用武力强迫国民接受这种变态工业化给他们带来的负担。为了让工人超负荷上班，迟到三小时就要坐牢；为了让农民交出粮食，不惜动用最血腥的手段。"该杀的杀，该抓的抓"，用武力强迫农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用刺刀征粮出口，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更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

量增长。在工业突飞猛进，烟囱越来越多的同时，日用品和食物却依然极度匮乏，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仅乌克兰就饿死了至少三百万人，以至乌克兰在 90 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但在付出了巨大而残酷的人道代价后，粮食终于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并以源源不断地出口来换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甚至俄国的艺术品和沙皇的珍宝也被拿来从西方富豪手中换钱。从各种渠道弄来的钱大都被用于大量进口机器和引进技术。在 1932 年，英美两国全部出口机器设备的一半都被苏联人买去，因为西方经济危机，大量失业的国外技术人才被招募到苏联。同年，有外国专家 1810 人，技术人员 10655 人到苏联工作，支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强力的鞭策下，斯大林所要求的高速度得到了实现。按照后人的说法就是："斯大林的经济改革，俄国各个阶层包括斯大林的家庭都是受害者，除了俄国的强国梦。"但不管怎么说，到 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在一战前产值仅相当于德国的 17.2%、并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旧俄基础上，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据称已奇迹般地跃居欧洲第一，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端的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再看看中国的情况。毛主席在建国后退居二线，国家的日常工作统统交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去处理。57 年以后出山一次，整出个反右和大跃进，65 年以后又出山一次，搞了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拿这大跃进来说，虽然结果是小高炉炼出一堆牛屎铁，外加三四千万"非正常死亡"，但没有一个人是枪毙的，甚至很少是被强迫的。相反，全国人民就像主席形容的"屁股上抹着火辣辣辣椒的猫"一样，"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么做而兴奋不已"，毛主席说的一点也不错："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连小孩子都去砸锅炼钢。

三四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毛主席自己不但没有像斯大林一样背负"反人类罪"受到谴责，反而还留下了三年不吃红烧肉、与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千古美名，并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斯大林用粮食换了机器，毛主席换了些什么呢？我不太清楚，不过至少是让中国过了一回强国瘾，在世界人民面前爽了一把。请看下面的一段官方报道：

当时中国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丰收高产的浮夸风盛行，不明真相的东欧人以为中国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而他们正面临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就想中国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支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希望彭德怀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要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七十公斤。

彭德怀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我们的老百姓要是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这后来成了彭德怀百口莫辩的"罪名"：在国外攻击污蔑中国大好形势。

没有毛主席，中国和世界确实会缺少色彩，失去很多乐趣。毛主席离开我们以后，少了许多"爽"和"嗨"的感觉，以至人们只能靠残存的回忆、拍点不伦不类的激情岁月片填补精神上的空白。57 年毛主席出山不到一年，就留下一堆令中外着迷的花絮：放高产卫星，炮制麦子上能站人的照片、农村办大学，以后和赫鲁晓夫争论"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还留下了那首著名的"鸟儿问答"。最经典的还是操心全国人民粮食太多吃不完怎么办，下面就是毛主席视察河北徐水县时和公社领导和群众的一段对话：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 31 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毛泽东高兴地问。"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几乎是一昼夜，徐水就办起了 101 所大学。

"屁股上抹着火辣辣红辣椒的猫"们创造的奇迹远不止这些：

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合理密植"的结果就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是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

"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味，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

若说发明创造都是没有知识文化的农民大老粗搞得也不对，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四割法"。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只猪在一天之内增膘九点五公斤，后来成了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

当然，也不可能都是"小高炉"、"牛屎铁"、"四割法"之类的玩意儿，起码当时修的水库有些现在还在用，但就比例而言，几乎可忽略不计。斯大林也并不是一味采取"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巴，然后用筷子捅下去。"的强硬办法，苏联人也有"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的革命热情，星期六义务劳动、共青团无私奉献之类的活动也没少干，像靠近中苏边界的远东共青城（共青城原先是中国的一部分，在 1858 年《瑷珲条约》中被割让给俄国），就是由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于 1932 年按照工业中心的规划组织共青团员保尔.柯察金们建造起来的（还有一说劳改犯也功不可没），尽管成绩斐然，但过程十分乏味。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共青团义务劳动，就是修铁路和冬妮娅相遇的那一段，只有悲凉与壮美，根本看不到中国大跃进的沸腾场面。凡是从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对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系列作品，像《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和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半公开出版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多少都看过一些，里面建设题材、工农业生产题材的也不少，看看老毛子工人的所谓劳动热情，硬邦邦冷冰冰的，和我们不在一个水平，根本没有"屁股上抹着火辣辣红辣椒的猫"那种感觉。无论多么夸张的苏联小说，也看不出这种气魄来："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我有个朋友就是徐水县的，告诉我说尽管他们县后来饿死不少人，但大家一提毛主席还是激动不已，还自发建起了主席纪念堂，特别纪念这段事儿。当地老百姓认为，一个国家的领袖，能和我们这些普通农民一起讨论吃饭问题，是我们徐水县人民莫大的光荣和幸福。至于饿死人的事儿嘛，"人总是要死的"，再说了，大跃进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是下面的干部欺骗了毛主席，如果说毛主席要让我们农民饿肚子，恐怕没有人会相信。毛主席是想让我们农民一天吃五顿饭啊，那种场面经历过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左愤们常说，斯大林为了实现强国梦，死亡两千万值得；那么，毛主席给中国和世界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我看死亡几千万更值得。至于炼钢多几吨少几吨的，又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再说，毛主席所做的不过就是抹了点辣椒，这可是跟斯大林用武力抢粮食的"反人类"做法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这种往猫屁眼里塞辣椒的 idea，也就是毛主席这样的天才能够想出来。

杂谈二杆子(32):山高谁为峰?(下)

金唢呐

像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领袖，没有不整人的，即使只是毛主席那样往猫屁股抹辣椒，恐怕也得让人把猫按住才行。但同样是收拾人，方法却各有巧妙不同。斯大林简单野蛮、枯燥乏味，而伟大领袖的手法复杂浪漫、妙趣横生；斯大林讲究专业化、职业化，而毛主席主张运动群众；斯大林的那一套难度系数大，而毛主席的运作更具观赏性；斯大林看重结果，而毛主席更重视过程。

说斯大林的方法简单野蛮、枯燥乏味，是指老毛子来回来去就是这么两下子：流放、

坐牢、枪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关管杀。依我看，尽管斯大林嗜血成性，残暴无度，滥杀了很多平民和布尔什维克的好干部，但整体效果却相当不错。就拿我前边说的搞集体农庄，农民不给粮食，杀人后把粮食抢到手换了机器，最后愣是把现代化工业体系给建立起来了。还有像 1939 年 11 月开打的苏芬战争，一个强大的帝国连个全国只有 17 架飞机的农业国都啃不下来，芬兰军队用轻武器和火焰瓶（火焰瓶的浑名"莫洛托夫鸡尾酒"就是这时得来的）硬是创下了死亡率 30 比 1 的辉煌战绩。这样的战果当然让斯大林大为震怒，于是斯大林把总司令换掉，一批高级军官人头纷纷落地。以后马上有了起色，算是把芬兰打服，芬兰终于在 3 月份接受了比开战之初更苛刻的条件，结束了这场历时三个半月的战争。

还有斯大林动不动就把人抓去劳改，实际上和毛主席的斗地主完全是两回事。尽管斯大林的方法非常原始，但效果非常好，成千上万的劳改犯是支撑斯大林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很多基本建设都是劳改经济的成果。斯大林时期著名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第聂伯河水电站等工程当时都被宣传为理想主义"义务劳动"的样板，然而如今人们都知道：那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的巨大劳改营。还有远东共青城、新西伯利亚等等一系列新兴的城市，军功章上有青年团员保尔柯察金们的一半，也有被劳改犯的一半。

就说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原名是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全长 227 公里，内有 37 公里人工水道。运河主要利用关押的地富反坏右（大部分是农业集体化的"富农分子"）只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建成的。当时斯大林指示："运河必须又快又省地建成！"快，修成二百二十六里的运河和七座船闸，只给二十个月（1931 年 9 月—1933 年 4 月）；省，"一分钱外汇都没有，一切用人力！"修筑期间死亡的劳改犯人达 10 万人之多。残酷归残酷，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知道运河的战略意义和商业重要性，就知道斯大林确实是了不起的战略家。苏联当时是一个工业基础落后的国家，斯大林急于求成的冲动，违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这种选择除了牺牲人的生命、尊严和福祉以外，没什么错误。后来索尔仁尼琴说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粗制滥造，我看了半天，也就是浅了点，走大船有些勉强，别的没什么大毛病。

中国右派、反革命劳改的也不少，北大荒、团泊洼出来的我都接触过，苦倒是没少受，但几十万人干了 20 年也没弄出个什么名堂，气的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左直发牢骚，这些右派们二十年在那儿到底干了点什么。

毛主席的方法，一是跟老毛的个人趣味和能力有关，再就是与我们这个民族愚昧和奴性有关。我们民族的这两个特点，都已经让老芦写绝了，我实在是说不出什么了。我想说明的，还跟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有关。比如说，土改中杀掉的地主虽然有一些，但大量的还是留下来，做反面教员，让农民隔三岔五地收拾，批斗羞辱，让群众开心。像我插队的农村，有四五家地富，大队青年人们没事儿就叫过去，打几拳踹几脚，问几个侮辱性的问题，大家哈哈一笑，最后吐口唾沫，一声滚蛋。就这样，毛主席还总告诫我们"人还在，心不死"、"还乡团回来了"，我当时就纳闷儿老人家什么意思，就这几个七十多岁的棺材瓤子，即使心不死又能怎么样。后来才知道，伟大领袖完全是为百姓着想，农民有了出气筒和参照系，幸福感油然而生，而且生活还有个乐子。对中国人而言，效果比拉去修运河好得多。

我们隔壁有个研究室，经常用小白鼠做动物实验。每当他们购进一批动物，就有家属院的一退休长者拿着一个笼子来要小白鼠，说是拿回去喂猫。因为经常来，觉得空手不合适，还经常带点小礼品什么的，我们也跟着沾光。每当老者带小白鼠回去后，一定要把家里的老猫放在一个开阔地带，等周围人上的差不多了才把小鼠拿出来。那老猫是个"人来疯"，好像很明白主人的用意，并不马上把小鼠咬死，而是要先拿出"猫猫虎虎"的本领来，将老鼠戏弄一番：一扑一掀一剪，看着对方抱头鼠窜再赶上前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再松开脚让对手稍事喘息，以后再重复前面的程序。这样几个回合下来，弄得小鼠欲生不得、欲死不能，在那儿苟延残喘，旁边传来阵阵喝彩和会意的笑声。而且老猫只是玩，乐在其中，并不是像传统老猫一样将老鼠生吞活剥下肚，最后结果往往是小鼠气绝身亡后被主人收尸。现在国内的猫们不管黑猫白猫，除了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猫，大都不抓老鼠。用猫控制鼠害主要是靠令老鼠心惊胆颤的喵喵声。家养的宠物只吃熟食，而且有的还挑牌子，隔三差五的还要到肯德基麦当劳招呼一顿，跟人一样，完全变修了。

中国的阶级敌人虽然也有被枪毙的，但数量要比苏联少得多，很多人说是"迫害致死"、"自杀"，实际上是给玩死的。斯大林则不然，当年著名的列宁遗嘱中提到了 6 位苏共领导人，最后除斯大林外，另外 5 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审判中被处决（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审判，后在墨西哥被斧劈）。

斯大林、毛主席和金家父子，都玩"株连九族"这一套，但方法也截然不同。斯大林和金家父子的方法都是古代君王那一套，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

在苏德战争中的危急岁月，斯大林不惜用最血腥的手段对付丧失斗志的士兵，"我要告诉他们，战死，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处死逃跑的士兵不说，更可怕的是流放他们的家属，然后在给他们加上"叛国"的罪名，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忍受死亡、饥饿和耻辱，这些看上去野蛮的事情，却是战场是最实用的方法。这些手段在 1942 年时就发挥了及其明显的效果，41 年苏军被俘三百多万，而斯大林《军事条令》公布后，42 年被俘投降的苏军不到 41 年的十分之一，大部分损失的苏军都是在拼死抵抗后牺牲了。"我真的搞不懂斯大林的士兵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放弃根本无望的战斗，保全自己的生命吗？"（德军日记）"就这样的冲锋，一拨又一拨，不知停歇，不知疲倦，痛苦。"

收拾家属光是流放也就算了，还有更狠的。前苏联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 16 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老毛子真是野蛮，连这种办法都用得出来，为让高级干部服软就操人家的黄花闺女，而且还记录在档案里，怪不得西方人这么厌恶老毛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党统战对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讲起过一个关于特务头子徐远举在重庆审讯女共产党员江竹筠的故事。在江竹筠拒绝回答徐的问题后，徐便他命令手下的人扒去江的衣服，但江竹筠并没被吓倒，而是大声斥责：

你们以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扒光我的衣服羞辱我就能使我害怕吗？让我告诉你们，别忘了你们是女人生下来的。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女儿和姐妹难道不是女人吗？你们如此羞辱我，也就是羞辱了地球上所有的女人，羞辱了你们自己的母亲！要是你们连自己的母亲姐妹都不顾，那就让人扒光我吧！

这时，在一旁观察的沈醉轻轻地碰了一下徐的脚，"你能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对付她？"这时徐示意手下住手，一场审讯宣告结束。

这就是中美合作所"严刑拷打"的水平，不知道老蒋还拿什么资本跟毛主席斗，怪不得斯大林最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

再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株连家属的，和斯大林明显不是一个路数。

西路军一朝覆没，毛主席就对在延安的张国焘下手，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结果，在红四方面军干部面前批斗张国焘。毛企图把张国焘赶出政治局，只是因为莫斯科不同意而没有得逞。用张国焘后来的话说：他"受尽了折磨"，是"毛泽东在后面掌舵"。下面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提到的一件事。

一次，张国焘看见儿子在学校演戏时被派演"托派"张慕陶，"扮成奇形怪状的汉奸样子......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捉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著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進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著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我认为张国焘说谎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类似的情况很多黑五类的家属文革中都遇到过。我想那些造反派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但和毛主席所为完全相同，即使现在很多 80、90 后小青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少也和毛主席"冥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真是和我们心连心，也就是老芦所说，是我们的民族魂。反观老蒋，就觉得知道老蒋的东西越多，越觉得国民党非输不可。就像我们教科书中常说的，国民党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

（未完待续）

请假 10 天，诸位玩好。